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四十週年
于斌樞機主教百歲誕辰紀念

學術系列活動

21世紀

大學追求卓越策略研討會

「校史論壇」



指導單位：教育部

贊助單位：教育部、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

會議時間：2001年12月6日（週四）

會議地點：輔仁大學濟時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目錄

議程表

論文

01 | 台北輔仁大學復校簡述／龔士榮

05 | 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2）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綜述／林智源

19 | 陳垣與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邵台新

31 | The 1924 Peking Letters of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regarding Plans to Establish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康士林（譯稿見 p99）

52 | 北平輔仁大學校務檔案管窺／習賢德

附錄

87 | 我國大學校院校史室管理現況－以輔仁大學校史室為例／吳瑞珠

94 | 輔仁創辦于一九二五？！／校史室

95 | 天主教輔仁大學的歷史與今日願景之整合／校史室

98 | 輔仁大學 1950—1952 院系調整原則小檔案／校史室

99 | 艾德豐斯·布蘭史泰特一九二四年北京信件：關於設立天主教大學於北京之計畫／康士林【譯者：張琰】

與會學者



議 程 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報 到
09：00~09：20	開 幕
09：20~10：40	華人校長論壇 議題：(1)大學的功能、定位、特色與目標 (2)產學合作與募款機制 (3)大學整合與合作 (4)提昇國際競爭力
10：40~11：00	茶 敘
11：00~12：10	第一場次（第六會議室） 主持人：陳福濱教授 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 論文一：台北輔仁大學復校簡述 龔士榮神父 輔仁大學終身講座教授 論文二：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2）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綜述 林智源教授 北京校友會校史編撰小組召集人
12：10~13：10	午 餐
13：10~14：30	第二場次（第六會議室） 主持人：戴晉新教授 輔仁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論文一：陳垣與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 邵台新教授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論文二：The 1924 Peking Letters of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regarding Plans to Establish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康士林教授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論文三：北平輔仁大學校務檔案管窺 習賢德教授 輔仁大學影傳系教授
14：30~14：50	閉 幕

台北輔仁大學復校簡述

輔仁大學終身講座教授

龔士榮

輔仁大學在台灣能夠復校，北平輔大在台校友的功勞，是不能磨滅的，這是在于故校長一再所說過的。

早在一九四六年（民卅五）年，校友吳祖萍、邢連鐸、郝履成等二十餘人，發起組織輔仁大學校友會，在台中大肚舉行成立。¹ 一九四七年後，來台校友日增，連繫重心移至台北，每年舉行大會一次，登記校友多至四百餘人。²

一九四八年，北平輔仁大學校務長雷冕神父（Rev. Rudolf Rahman, SVD），總務徐思本神父（Rev. Hunsberg, SVD）因鑒於國共內戰吃緊，特來考察，計劃將輔大遷移來台，先創設輔仁中學，農學院和醫學院等，³ 校友會聞訊熱烈召開歡迎會，協助兩位聘請董事，尋覓校址，政府也允撥圓山附近土地作建校之用。⁴ 旋因時局迅速劇變，雷徐兩位不得已放棄原來計劃，並把所購的中山北路四條通作辦事處的房舍，轉讓給主徒會神父，即現今長安東路一段天主堂的所在地。

⁵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校友會在館前街紙業公司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校友踴躍參加，並以復校為中心工作；教育部長張其昀在會中致詞，對此有「本人敬代表教育部，寄以深切同情」等語。⁶ 校友等得此鼓勵乃積極進行，致函在羅馬的輔大前教務長胡魯士神父（Rev. H. Kroes）⁷ 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Rt. Rev. John Shütte, SVD）⁸ 教廷傳信部雅靜安樞機主教（Card. Agagianian）⁹ 更上書教

¹ 靳春華，〈在台輔仁校友會成立經過〉，《輔仁》第一期，頁 25。

² 《輔仁》第三期，頁 10。

³ 同註 2。

⁴ 同註 2。

⁵ 《主徒會會史》，38 年期。

⁶ 同註 1，參《中國一周》，第 389 期。

⁷ 《輔仁》第一期，頁 58-59；《輔仁》第二期，頁 13。

⁸ 同註 7，頁 10-11。

⁹ 同註 7，頁 10、12。

宗¹⁰等，並各得其正面的回應。

一九四八年一月廿四日，胡魯士神父，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田耕莘樞機，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廿六日，舒德總會長，¹¹ 尤其一九五九年二月廿四日，¹² 雅靜安樞機等相繼來台視察，校友們均面陳復校的必要；最後于總主教返台，¹³ 校友知其將有羅馬之行，力請于總主教務必轉達此間校友、一般民眾及政府對輔仁在台復校的殷望。¹⁴ 于總主教抵羅馬後，即就台北希望復校事報告雅部長；不意雅部長非但沒有難色，立時問于總主教為復校事，當做些什麼？當如何做？¹⁵ 于總主教允以書面答覆。第二天計劃書完成，¹⁶ 內容略謂為設立一座現代的大學，該有十個學院，這當然不能在一二年內成功，而是逐年完成的理想。有關人事經費，也不是某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能勝任，擬請在中國傳教的各大修會通力合作，各負起設立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學院，則人力物力應可解決。¹⁷ 雅部長看完報告後，十分滿意，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函請于總主教負責聯絡各修會，並去美國籌募開辦經費，¹⁸ 是年十月廿三日，即由傳信部雅部長簽署任命于總主教為尚無寸土片瓦的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¹⁹ 同日晉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除蒙祝福外，同時賜助美金十萬元作為倡導。²⁰ 據雅部長表示，在此非常時期，才用此非常手段，²¹ 這位校長以後可請將成立的董事會予以追認，再請教育部核備。

于校長在被任命前，已奉雅部長之命，飛往美國，勸募開辦經費，以美金一百萬元為初期目標；他先訪問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Card. Spellman）樞機，不意史樞機稱北平輔仁尚欠紐約教區十萬元美金，請先還清舊債後再談其它，²² 不得要領；于校長乃轉赴波士頓訪庫興樞機（Card. Cushing），庫氏以歷年為教會負債纍纍，只能捐助十萬元，以表心意；其他教區，都以經濟情況欠佳為由，對此不感興趣，故于總主教第一次赴美募款，可說是鎩羽而歸；²³ 回羅馬向雅樞機報告，

¹⁰ 《輔仁》第一期，頁 58。

¹¹ 《輔仁》第二期，頁 30、40。

¹² 《輔仁》第二期，頁 41。

¹³ 《輔仁》第二期，頁 41；《輔仁》第三期，頁 10。

¹⁴ 《輔仁》第二期，頁 39。

¹⁵ 《輔仁》第三期，頁 10。

¹⁶ 《輔仁》第二期，頁 19-20。

¹⁷ 同註 16。

¹⁸ 同註 16，頁 15。

¹⁹ 見任命令影本。

²⁰ 《輔仁》第三期，頁 6。

²¹ 同註 20。

²² 參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九十年（2001），頁 217。

²³ 《輔仁》第三期，頁 6。

雅樞機不為所動，且在任命于氏為校長後，請再赴美訪庫興樞機；庫樞機認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既有此決定，乃允捐助九十萬元，但須二年時間始可繳清。²⁴

于校長另一任務是商請各修會前來合作，先後接觸過七個修會，²⁵ 其中或以人力財力不足，或因在大陸損失慘重，或因台灣局勢未定等等予以婉拒。只有原負責北平輔大的聖言會應允參加，但無力單獨負責。耶穌會方面，台灣的耶穌會士初抱負面的反應，後因羅馬總部已答應教廷協辦，始予同意。這樣獲得了三方面的合作：中國神職界負責文學院藝術學院；聖言會方面，負責理學院和外語各系，作成立外語學院的準備；耶穌會方面負責法工兩學院，後以商學院代工學院。人事經費既定，于校長乃於一九六〇年四月二日，以輔仁大學復校籌備人名義，向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轉教育部申請在台復校。四月廿五日，台省府教育廳通知奉教育部台(四九)高字第四六一二號令，略以用原校名在台復校，其資產設備均未遷台，復校係屬新創，必須依照規定程序辦理立案手續，並准先行籌備創校。

一九六〇年四月廿九日，董事會名單共十五人及董事會組織章程及推選田耕莘樞機為董事長呈報教育部。

一九六一年元月卅一日，購就台北市吉林路三七-三九號兩棟三層半樓房，作復校籌備處，又於四月廿八日補報修訂之復校計劃並申請准設文學院哲學研究所。是年七月廿日教育部以(五〇)高九二六三號令准予備案；九月八日又以(五〇)高字第一二〇四二號令對有關開辦研究所案准予備查。於是於九月廿日，在吉林路辦事處舉行哲學研究所開學典禮，計收錄研究生八人。²⁶ 時于校長即決定以真善美聖為校訓，筆者詢以何以不用「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原校訓，于公答以真善美聖來表達仁的內涵，更清楚更具體，並非廢除原校訓；所以在他親撰的校歌歌詞中，二者均列，便可以看出。

至於校地問題，二修會當初選定高雄縣大貝湖附近烏山頭一片山坡地，計五十餘甲，後因聘請教師不易，乃改在北部設校；各縣市聞風獻地，于校長各處奔波，前往視察，或以手續煩瑣，或以附加條件問題，一時不易解決；為避免費時曠日計，董事會乃於第二次會議中決定改由購買台北縣新莊鎮營盤里土地三十甲零六分為建校基地；手續完成後，即展開文學院大樓，外語大樓、理學院家政營

²⁴ 《輔仁》第三期，頁 6。

²⁵ 《輔仁》第二期，頁 7。計有道明會、方濟會、奧斯定會、耶穌會、遣使會、聖言會、本篤會等。

²⁶ 同註 20，頁 19。

【4】校史論壇

養系大樓，法學院大樓暨學生宿舍等工程發包；董事會並於一九六三年呈報教育部增設理法兩學院及大學部共十個系組，教育部於六月十五日以台(五二)高字第七三三五號令核准，六月十八日頒發輔仁大學校印。是年六月廿九日哲學研究所第一屆畢業典禮，假台北市靜修女子中學禮堂舉行；八月十四日教育部又以台(五二)高字第一〇五五五號令核准參加大專院校聯合招生委員會，招收註冊新生四六四名；因教室有待完成，延至十月廿一日，始在新校舍正式上課。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第一屆畢業生四百二十九名，另碩士班畢業生五名，畢業典禮假台北市中山堂舉行；中美堂於一九七〇年落成後始在校內舉行。以後逐年增加院系及研究所，現有文、藝、醫、理工、外語、民生、法、管理及神學等九個學院，七個博士班研究所，三十五個碩士班研究所，四十四個學系。進修部分校內及台北市兩處，計有十四個學系；另研究中心八個，圖書館三個，廣播電台乙座，附設神學院有二個學系，碩士博士研究所各一。此外並設有校史室暨中國天主教文物館等，已具規模，現尚擬增設傳播學院等，以完成于故校長十個以上學院的心願。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加強師資陣營，提高學術水準，同時注意全人教育，不但給學子以冰冷的知識，並帶領學生追求可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真理—生命的真理，這是台北輔仁的理想。

請各位先生多多指教，謝謝各位。

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2）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綜述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校史研究組

林智源

一九一二年，中國天主教知名人士馬良（字相伯），英華（字斂之）聯名上書羅馬教廷，請求在中國創辦大學，當時未能實現。一九一三年英斂之在北京香山靜宜園創辦輔仁社，主要為培養各省教會中青年子弟，傳授中國文化知識，課程有中文、歷史、書法（即習字）等，招收學員數十人。輔仁二字乃取《論語·顏淵》“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

一九二五年，羅馬教廷委派美國聖本篤會在北京創辦公教大學，學校沿襲英斂之在香山所辦的輔仁社之名，聘英斂之任社長，先成立國學專修科，作為升入大學的預科，是為輔仁大學的前身，一九二七年更名為北京輔仁大學。

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二年先後擔任校領導的有：

陳垣 一九二六年一月廿八日受聘為北京公教大學輔仁社社長，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受聘為北京公教大學副校長、北京輔仁大學副校長，一九二九年六月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直至一九五二年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

奧圖爾（G.B.O TOOLE）美國人，一九二五年一月至一九二九年五月任北京公教大學、北京輔仁大學校長，一九二九年六月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任北京輔仁大學校務長。

穆爾菲（J Murphy）美國人，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任校務長。

韓克禮（HanKeli）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代校務長。

雷冕（Rahamann）德國人，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任校務長。

芮歌尼（Rigney）美國人，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任校務長。

英千里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六年任秘書長。

張重一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任秘書長。

劉復 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一年八月任教務長。

胡魯士 (Kroes) 荷蘭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教務長。

丰浮露 (Feifel) 德國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任教務長。

葛爾慈 (Goertz) 德國人，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任教務長。

趙光賢 }
林傳鼎 }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任教務長。
徐侍峰 }

高福德 一九二九年 至 年任訓導長

伏開鵬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任訓育主任、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任訓導長。

曾聘任為校董的知名人士，著名學者有：張繼、馬良、傅增湘、于斌、陸徵祥、張相文、陳大齊、沈尹默、胡適、翁文灝、于斌等四十三人。

北京輔仁大學從一九二七年建校時的國文、史學、英文、哲學（當年未招生）四個學系到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已發展到四個學院、十五個學系、三個專修科、六個研究所（文學院的中文學系、史學系、西語學系、社會學系、經濟學系，理學院的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教育學院的教育學系、哲學系、心理學系、家政學系、美術學系，農學院的農學系，文史學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所、物理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生物學研究所，美術、貿易、保險專修科）。先後有八百餘位學有專長的學者專家在校任教，其中外國籍專家學者約佔三〇%。有一萬二千餘學生在此學習。在校生從一九二七年建校時的一百四十餘人發展到一九四八年的三千餘人。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共二十二屆本科畢業生四千七百三十六人，各研究所畢業碩士研究生七二人。為國家社會培育了大批高質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專家學者和實用型高級管理人才，不少校友雖然年事已高，迄今仍然活躍在各自的專業崗位上，為國家社會繼續作出貢獻。

北京輔大在上世紀四〇年代已建成了從幼稚園、小學、中學（男部、女部）、大學、研究院所一整套完整、系統的教育體系，在教學上都各有所長，各具特色，可圈可點。

北京輔大作為中國高教史上的短暫一頁，其二七年的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是高教史上的一筆珍貴遺產。歲月流逝，時不待我，我們將以只爭朝夕的精

神，把這份珍貴遺產繼承下來，流傳下去，永不泯滅。

北京輔仁大學的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表現在：

（一）在中國政府立案，實行“中國化”的辦學方針，教育與宗教分離

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京公教大學更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六月一七日，學校呈文中國政府教育部請求認可，文中稱：“本校自成立以來，悉准 大部成規，並無宗教課程，所收各生皆經試驗為準，教內教外珍域無分，一切規程實與部章無所違背，自當援照 大部外人捐資設立學校條例，請求許可，至副校長一席，開辦以來即聘請中國知名學者擔任與 大部規定亦屬相符。”七月，教育部派員視察後認為：該校的雙重目標為 1.引介西方學術及科學的最現代化發展；2.保存並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建議政府准予登記立案。十一月三日，教育部批字五二六號文批復：“查該校由美國公教團體集資設立，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為宗旨，尚無不合，全校重要職務及重要學科均由本國人擔任，外人僅居輔助地位，亦與本部條例相符，應即准予試辦。”一九二九年六月，陳垣就任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遵照國民政府教育部“私立學校條例”的規定，又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一九三一年九月分別呈請並辦理了校董會和大學及中學的批准立案手續。

輔大建校伊始，即實行教學與宗教的分離，宗教不作為必修課程，司鐸書院不在大學註冊範圍之內，校園生活中提倡信仰自由，這些措施，突顯出學校的教育職能，這也是教育部批准立案的基本條件。當然，輔大作為教會學校，宗教的傳播任務並未停止，但教徒與非教徒師生在相互交往和共同生活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相互切磋學問，相互尊重，營造了濃厚的學術氛圍，構成了團結奮進而持久的凝聚力。

（二）從國學起步，重視國學的教育與研究和中國文化的傳播

一九二五年創辦的北京公教大學沿用輔仁社和一九一三年的香山輔仁社一脈相承，首先設立的是國學專修科，主要講授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英文等課。一九二七年更名北京輔仁大學後招生的三個學系為國文學系、史學系、英文學系。在以後擴展的各院系中，國學（中文、歷史）佔有突出地位，這和學校的主持人有極其重要的關係，輔仁社的第一任領導人是英斂之，一九二六年一月英斂之病逝，臨終將社務託付給陳垣，這對輔仁國學的發展意義深遠。

陳垣校長在輔仁的地位是不同一般的，從行政上講，他是繼馬、英之後的學校實際創辦人之一，資歷最深；從學術上講，他當時已經以宗教史、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卓越成就蜚聲海內外。作為校長和學者，這兩個角色是相互影響的。陳校長的民族主義立場使他對推進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在輔仁的有關章程中要求學生，“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特長，發揚廣大，以增長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則利用科學，救其弊，補其偏，務使習國學而毋故步自封，讀西籍而毋食歐不化，不托空言，斯裨實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圖者也。”據鄭天挺回憶，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在北大上學時就聽陳垣講過“現代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東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到中國，奪回北京。”輔仁成立後，陳校長的這種決心更為迫切。翁獨健回憶說：“半個世紀以前，一九二八年，當時我是大學一年級學生，在課堂上聽到陳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說過這樣的話：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他奪回北京”。學術文化的研究在這裡已經超出學術本來的意義，而是體現民族競爭和文化競爭的大事情。正因如此，他全心全意致力於輔仁的事業，特別是在他得心應手的國學領域中，建立了流傳久遠的事業。

陳校長當政期間，雖然有外國人擔任校務長，但國學方面的一切應該是出自中國學者的策劃。推進一個大學的學術研究，牽涉到多方面的因素。輔仁在一九三三年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培養研究生。首先開辦的是史學部，這對於提高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水平在制度上是重要的一步。當然，諸事之中人的因素第一。輔仁在國學方面的進步首先在於陳校長聘請和維持了一班優秀的研究人才，特別在國文、歷史兩系，匯聚了一批學術名人。

（三）融匯中西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一九二七年中國政府教育部批復輔大准予試辦的根據即認為新建立的輔大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為宗旨。輔大建立後，確也以融匯中西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

最早建立的三個學系之一的英文學系（西洋語言文學系、外語學系）師資雄厚，課程嚴謹，承擔了全校各院系外語基礎必修科的教學，很好的解決了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語言工具。西語學系歷年招收的學生達一千四百五十四人，在全校各院系中雄居第一，畢業的學生也是最多的。

在輔大各院系任教的外籍教師（教授、副教授、講師）約佔教師總數的三〇

%，他（她）們主要來自美、德兩國，都是各專業當時世界科學前沿的專家學者，帶來了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有些研究漢學的專家學者，也來輔大進修或在文史二系任教。他（她）們的到來，融匯了中西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輔大一九三七年開始編印年刊至一九五〇年共十四年，其中記載的外籍教師情況如下（一九五〇年刊無教師資料）：

年份	教師總數	其中：外籍	佔總數%
1937	100	25	25
1938	85	24	28
1939	100	28	28
1940	122	33	27
1941	127	27	21
1942	133	49	37
1943	159	58	36
1944	11	6	55
1945	26	14	54
1946	65	34	52
1947	119	49	41
1948	90	39	43
1949	83	14	17

說明：一九四四年為校院領導人數，一九四五年為校院系領導人數，均無教師資料。

在對外交往，有些教授受學校委派去國外大學進修或講學。不少畢業同學在取得學士、碩士學位後更選擇了留學之路，以期能進一步提高、深造，在事業上取得更大成績。僅據上世紀八〇年代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恢復後海外校友提供的估計數，北京輔大畢業生在大陸以外地區工作服務的校友有近千人。他（她）們有的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活躍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上，為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繁榮富強，繼續發揮余熱，也為宏揚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而更多的教師和同學在國外學成後，毅然回國參加祖國的經濟建設，一生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鬥。

（四）強大的師資隊伍

輔大建校伊始，就把聘請高質量的中外學者專家來校任教作為校政建設的首要任務。不惜重金延聘國內外一流學者擔任院系領導，在教學方面匯聚了學術上一流的專家教授，不少系的教學特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由於校務長為德國人，學校不受日偽管轄，是國民政府承認的在淪陷區唯一一所大學。不少大學未及離平的知名教授，轉入輔大任教，這也是輔大師資隊伍的鼎盛時期。

曾經擔任各學院院長的有：

沈兼士（一八八六～一九四七）語言文字學家，曾任代理校長、文學院院長兼文科研究所主任、國文學系教授。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在輔大任教長達十八年。一九二五年前，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等職。

余嘉錫（一八八四～一九五五）曾任文學院院長、國文學系主任、教授。他講授的課程很多，主要有目錄學、古籍校讀法、《世說新語》研究、經學通論、漢魏六朝文等。任代理文學院院長的有董洗凡。

嚴池（Jaensch）理學院院長兼數理學系主任，一九二九年建立理學院後至一九四八年底擔任院長。

張懷 教育學院院長兼教育學系主任，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院長長達十七年，比利時魯汶大學教育學科博士，講授教育學概論、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學等課。來輔大之前曾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任代理教育學院院長的有徐金泉、徐侍峰。

曾擔任各學系系主任的有：

張星煒、柴德賡（史學系），顧隨、尚璋（中文學系），英千里、桑德厚（Sandhaas）（西語學系），雷冕（Rahamann）（社會經濟學系），張重一，趙錫禹（經濟學系），雷冕、關維廉（W. E. Hogan）李景漢（社會學系），李士嘉（Richartz）、劉景芳（數學系），歐思德（Oster）（物理學系）、卜樂天（Brill）、邢其毅、張錦（化學系），張漢民（生物學系），張懷、楊成章、歐陽湘（教育學系），丰浮露（Feifel）（哲學系），葛爾慈（Geortz）林傳鼎（心理學系），傅雪齋（美術學系），吳彬雅（Urbania）（家政學系），馬德武（Mathews）（農學系）。

在輔大任教的名教授為數眾多，僅擇少量列後：如文史二系的羅常培、魏建功、唐蘭、孫人和、陸宗達、孫楷第、劉盼遂、儲皖峰、朱希祖、周作人、台靜農、沈從文、啟功、馬少波、周祖謨、容肇祖、余遜、朱師轍、張鴻翔、方豪、范文瀾、梁起雄、趙光賢等；社經二系的楊承祚、陸崇璋、左宗綸戴世光、陶大鏞、鄔滄萍、劉子明、魏重慶等；數理化三系的褚聖麟、薩本鐵、張子高、高崇

熙、袁翰青、張青蓮、曾昭倫、薩本棟、王仁輔、徐獻瑜、陳光熙、余忻文、顧功敘、洪晶、吳存亞等。

具有院士銜的教授有：陳垣（史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一九四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一九五五）；余嘉錫（中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一九四八）；方豪（史學），中央研究院院士；范文瀾（史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一九五五）；魏建功（中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一九五五）。

生物、西語、教育、哲學、心理、美術、家政、農學各系的名師以及各院系的外籍名師為數尚多，不一一列舉了。

（五）寬、深、厚的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講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法

建校以來，始終堅持並發展這一辦學方針，培養出大批具有高深專業知識的人才。如一九三五年《輔仁大學文學院社會經濟學系課程說明》中，關於“本系課程要旨”一節明確指出：“為應我國現勢之需要，造就有充分社會學與經濟學知識之人才，課程之設備，於明理致用二端雙方並重。講授方面，不但注意於基本知識之灌輸，現代科學方法之訓練，尤其著重於啟發學生自動研究之能力，使學生修業期滿之後，無論應世或作更高深之研究，皆有相當之準備”其他各院系關於辦學目的，大都有類似闡述。

由於辦學目的明確，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學系。現將具代表性的經濟、教育、物理、化學、心理五系情況作一簡介。

經濟學系：前身是一九二九年設置的社會經濟學系，一九三六年新任校務長雷冕（Rahamann）兼任系主任至一九四三年分設社會學系和經濟學系，分系後雷冕仍兼任社會學系主任。經濟學系重視理論聯繫實際和調查研究，針對各時期社會上用人需要，在課程設置上力求適應實際工作中的應用，並注意與國際接軌。使學生修業期滿後，具有一專多能的實際工作能力，或為向高深理論的研究打下基礎，培養出當時社會上實際需要的人才。1.強化基礎知識教育，為學習專業知識打好基礎。如所設大學代數課，除講授微積分外，特別講授各種商業數學的應用。專業必修課《經濟學大綱》，講授基本觀念，使學生對經濟學科的範圍、內容與研究方法有一定的了解，為學習經濟學原理和其他經濟學課程打下基礎；2.主要專業課實行雙語教學。經濟學系所開出的專業課，大部分教材用書均為英文

版本。如經濟學原理為 F. S. Deibler (美) 所著 Principles of Economics，會計學為 R. B. Kester (美) 所著 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s，統計學為 Chaddock 所著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tatistics，財政學為 H. L. Lutz 所著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貨幣及銀行學為 Frederick A. Bradford 所著 Money and Banking，經濟思想史為 Haney 所著 History of Economics Thought 等等。這些教材都是當時美國大學裡經濟學和會計學專業本科生常用的教材。會計學的作業也是按美國企業的業務情況，用英文編寫的成套習題，並要求學生用英文記帳、作報表。在普通課程中如數學、世界史和比較政府等課程也是用英文課本或用英語講授，使學生畢業後不僅可以適應國內經濟工作的需要，並能適應外企單位有關的工作；3. 要求學生接觸社會，重視社會經濟調查。為實現辦學目的，要求學生重視理論聯繫實際，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力求培養出各個時期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做得成績比較突出的，有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兩年畢業生開展工商企業和手工業調查，然後寫出畢業論文的事例。當時任系主任的趙錫禹先生作為指導教師，提出組織應屆畢業生對北京市十多個行業進行調查，得到師生的響應和支持，如一九四七年應屆畢業生中有三十多人參加了這項調查，兩人分成一組（共十餘組），自願結合，自選行業，調查選題經系主任批准後，利用半年多時間，分別下廠、下店、並到同業公會、新聞單位等處廣泛調查，取得大量的一手材料，經過分析研究，寫出調查報告。這些調查報告真實地反映了被調查行業（尤其是傳統手工業）的歷史興衰和瀕臨破產的情況，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教育學系：在多年辦學實踐中的體驗與認識 1. 培養目標的綜合性。學生既要懂教育理論，又可以擔任中小學行政管理人員和某些課程的任課教師，因此建立了“輔系制”，學生可以選修中文、外語、數學、經濟、心理等系課程做為輔系，畢業後可勝任各該科中學教師工作；2. 寬、深的教育專業理論基礎。寬，指教育學理論，包括教育學、教育史、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初等、中等、師範等教育的各個領域。深，指教育學理論的主課有一定的深度，如教育學包括了教育學概論、教育哲學、近代教育思想等，心理學則有心理學概論、教育心理學、發展心理學、應用心理學、心理實驗等，教育行政管理則包括教育視導、教育統計、教育測驗等；3. 厚實的外語基礎。英語是重點學科，一、二年級必修課，第二外語的選修課有德、法、日等語種，許多專業課用英語授課；4. 重視實踐和實驗課程。教育實習、見習包括附中、附小，是大三、大四的重點課程，實驗課程有心理實驗、教育統計學實驗、教育測驗等；5. 注重教育研究和寫作能力的培養。一年級有讀

書指導，要求學生一學期讀一本專著，寫出心得報告，二、三年級有研習指導，結合教育行政、教育法課寫出報告，四年級的畢業論文，是科研與寫作能力和專業水平的綜合表現，如一九四四屆畢業生在林傳鼎教授指導下的論文是經過心理測驗後得出結果。

物理學系：課程全部使用英語教材，作筆記、習題和寫畢業論文均須用英文，因而學生受到良好的專業英語訓練，另一特點是實驗課多，動手和見識也多，對學生的獨立工作和提高很有幫助。學校的大型階梯教室，可容三百人聽講，講台後有物理、化學兩個演示實驗準備室，講台上水電具備，能上下活動的黑板後有通訊櫥，教授上課時將所需的演示設或藥品推進大教室，邊講邊演示，學生被這些在當時最先進的設備和實驗所吸引。物理系附設的機電加工車間，人稱之為“物理工廠”，由系主任親自管理，他對實驗物理的教學和科研十分重要，理科必修的《大學物理》課程每週有兩個下午做實驗，為讓學生有充分機會親自實踐，每二人即分配一套儀器，實驗用的大批儀器都是由這個“物理工廠”按當時美國最好的儀器樣式製造出來的，其他實驗室還有不少精品儀器，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如光學的光譜儀，當時高校獨一無二的液化空氣機，能進行高真空或充氣儀器的製造。

化學系：要求學生基礎扎實，實驗動手能力強，外語好。1.基礎扎實，實驗要求嚴。基礎學科的課程不斷加寬加厚，實驗課程多，教學的高質量得益於高水平的師資；2.教學中全部使用英語，為適應當時世界科技發展，二、三年級開第二外語（德語）必修課；3.實驗設備先進完善，達到當時國際水平。

心理學系的師資和專業圖書實驗儀器在當時屬於國內一流，教學上以德國實驗心理學派思想為主導，理論與實際並重，把英文、德文列為必修課，能讀國外心理學名著，要求學生熟練掌握統計、測量、實驗等實際操作，畢業學生人數不多質量很高，是我國和國際心理學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上世紀四〇年代社會學系舉辦的社會服務部和生物學系研製成功的預防傷寒病疫苗等均對當時社會做出了貢獻，也是理論聯繫實際的範例。

（六）嚴格的教學管理和嚴謹的求實學風

輔大一整套嚴格的教學、註冊等管理制度是在不斷探索、補充、修改而逐步完善的，現分別保存於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和北京市檔案館的輔大完整檔案，充

分印證了這一看法。

輔大各院系所開主要課程，均延聘專家名流講授，許多教授學識淵博，不沿用別人編寫的教材，而是根據自己多年研究成果自編講義，講授的內容不僅豐富，而且具有很高的水平和獨到的價值。如國文學系有的同學回憶說：“輔仁大學國文系，其開課之認真，分數之嚴格，不但可說是全北平最嚴格，並且可以說是全國最嚴格者”。在開課方面如果沒有專門人才，即使是必修科目，也是寧缺勿濫，如易經一科，因為沒有合格師資，始終沒有開課。又如經濟學系教師在授課中，結合當時國內外財政、金融、會計等工作中的弊端，教育學生作一名經濟管理人員必須為人正派，具有廉潔奉公、遵紀守法、堅持原則的職業道德品質和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趙錫禹先生講會計時，批評當時財務會計人員普遍存在的不良習慣，是只滿足於把“數”（款額）管好，對於“數”後面的“事”則不聞不問（只管“數”，不管“事”）。他指出，財會管理人員對於財務收支項目的全面工作不了解，則不能發揮財務管理的職能。他根據西方會計學教育的發展，強調會計學的教學和教學方法不應僅側重於技術和技能方面，而且要為管理服務，會計主管人員要肩負“監督員”（Controller）的重要職責。經濟學系所設統計學、會計學等課程的習題作業要求和學生畢業後在實際工作崗位的要求一樣，必須嚴格按照計算、記帳的規則登帳、作表，不允許有任何塗改。即使計算方法和得數是正確的，也不給分數或嚴格扣分。為保證和提高教學質量，十分重視對教學接班人的培養，對於畢業留校作助教的學生，都嚴格要求隨班聽教授講課，協助教授批改學生作業，要求助教先操作一遍，再由教授詳細批改並給予必要的講解指導後，才允許助教去指導和批改。

輔大在課程設置，學分制、選修課制、轉院系制、畢業實習制、論文答辯制、學銜學位制等一整套系列的教學管理制度為學校營造了良好的求實學風。據一九五〇年“學生成績報告表”規定：學生每學年所得成績分與其應得學分總數至少應為三與二之比始得升級，本科學生除至少修畢一百二十學分以外並須得有一百七十一成績分始得畢業；學生每學期所得學分不足應得學分之半數者認為學業劣等得令其退學。本科學制四年，經批准亦允許休學延長學習時間，在完成本專業必修課學分外，可選修其他院系課程，也計算學分，為轉學轉系提供了條件，也為畢業後擇業擴展了門路，輔大極為重視通才教育，培養跨專業的一專多能複合型人才，各院系一、二年級的國文、英文、體育均為公共必修課，不及格不准升級。這樣，讀國文者英語甚好，讀英語者中文亦佳，特別在陳垣校長重視國學教

育的指導思想下，輔大各院系的中文水平都很高，陳垣校長親自為大一同學授課，他對西語專業的同學說：“四年讀下來，勤奮者，略得真諦，怠惰者，則極易變得橫豎不通（意指橫寫的外語和豎寫的漢語）”。輔仁培養出的學生，有得不僅本專業水平過硬，而且精通第二專業如文藝、美術、音樂、書法、體育等，更有不少同學技藝超群，成了這方面的國家頂尖人物。

（七）面向中外的學術出版事業

輔大的學術出版事業主要有三項，《輔仁學志》、《華裔學志》和《輔仁大學叢書》以及學術著作單行本。

輔大成立的第二年就創辦了《輔仁學志》。發刊詞中，申明了具有新潮的刊物宗旨：隨著世界形勢的變遷，中外學術的交流，學者必須發掘利用新材料，開闢新領域，採用新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新的成就。

雜誌的編委會由陳垣領銜，編輯秘書是儲皖峰、雷冕（Rev. Rudolf Rahamann, 一九〇二～一九八五）、英千里、胡魯士、沈兼士、張懷、余嘉錫、張星烺、張重一和丰浮露，他們都是編委會成員。編輯在二十多年中也有變動，但維持了基本的格局。《學志》每年出一卷兩期，並隨時增刊專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出版了《輔仁學志》第一卷第一期。一直出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〇年從未間斷。成為這個時期國內大學堅持連續出版質量較高的學術專刊。學志刊載文章皆本校教師及校外著名學者的著作，有陳垣、沈兼士、余嘉錫、張星烺、劉復、倫明、柯昌泗、魏建功、周叔迦、王重民、孫楷第、岑仲勉、馮承鈞、容肇祖、唐蘭、單士元、朱師轍、柴德賡、趙光賢、周祖謨、牟傳楷等著名學者的研究論文。這些論文學術價值甚高，有獨到見解，今天對研究文史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輔大的另一著名刊物是以英、法、德文面向國外出版發行的《華裔學志》，專門刊登研究中國古籍的文章。《華裔學志》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八日在西德波恩附近的聖奧古斯丁舉辦了創刊五十週年紀念活動。

《華裔學志》最早的主編人鮑潤生（Francis Xavier Biallas, 一八七八-一九三六）是以研究屈原文學著作而獲萊比錫大學博士的聖言會德籍神父。一九三三年他到輔仁大學後，一面任教於社會學系，一面積極開展漢學研究工作。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北京是歐洲漢學家的黃金之地，尤其是在初創的輔仁大學，這裡的文科人才濟濟，中西學術交流空氣活躍。鮑潤生看準了這一點，遂決定將原有的輔

仁大學校刊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Peking*) 停辦而改辦學術刊物，取名為《*Monumenta Serica*》(原意為絲域的史蹟)，專載漢學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不登一般性的文章。刊物的中文名字《華裔學志》是陳垣校長選定的。“華裔”二字現在一般理解為在外國的中國人後代，但陳垣校長當時選的“裔”字是指遠方的人民。《華裔學志》就是中國與遠方人民間文化關係的學術研究刊物。刊物初創時的編輯有歐洲漢學家孟斯達特 (A. Mostaert) 鋼和泰 (Von Stael Holstein)、艾克 (G. Ecke)、謝禮士 (E. Schierlitz) 和中國學者陳垣、沈兼士、張星烺、英千里。鮑在一年後去世，乃由雷冕任主編。以後又有著名的漢學家福克斯 (Walter Fuchs)、衛德明 (Helmut Wilhelm)、謝盛德 (Koster Hermann) 等多人參加編輯。

《華裔學志》一九三五年出版後，每卷約五百頁左右，是面向西方的專業性很強的刊物，中外學者發表的文章都是西方漢學界比較有興趣的問題，同時也是距離現實相當遙遠的所謂“純學術研究”，和當時歐洲漢學流連於中國古代文明的風格是一致的。到一九四八年底，《華裔學志》共出刊一三卷，刊載中外學者的論文一〇四篇，短文一〇二篇，書評一九三篇。其中除了西方人的作品外，也翻譯中國學者如陳垣、沈兼士、費孝通的文章。這些文章內容深湛，考證扎實，論述的科學性、系統性強，顯示了這一時期華北漢學家學術成果的精粹。除當代人的研究文章之外，《學志》還把中國文化中的精品，如杜甫詩等譯成德文。《華裔學志》真正起到了溝通中外文化的作用，它刊出的主要文獻也成為世界上漢學研究的寶貴財富。《華裔學志》至今仍保持原訂宗旨，所刊均為漢學研究，包括文學、藝術、語言、歷史、哲學、宗教等，內容以古代為主。編輯者都是國外的漢學家。《華裔學志》不僅成為德國各大學和歐洲漢學家的重要學術刊物，也是國際漢學學術的研究中心之一。

本校教師專著，獨立成冊，單獨出版的，有的已收入到《輔仁大學叢書》內，如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張星烺《中西交通史資料匯編》，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等，都是教師們研究的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

還出版一些學術著作的單行本，陳垣的《勵耕書屋鈔本名理探》、《舊五代史舊本發覆》、《吳漁山先生年譜》等。

此外，還出版有民俗雜誌，專載民俗學研究成果。學生出版的刊物，較重要的有《輔仁文苑》、《文苑叢書》、《輔仁生活月刊》、《輔仁生活》、《新輔仁》等。

輔仁從國學教育、國學研究到成果的出版，形成了一個合理的體系，它的持續的努力奠定了輔仁在國學領域的地位。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至五〇年代初曾在北京輔大就學的一萬二千餘學子和近五千位畢業生，人生經歷雖然各有不同，但是無論人在何處，都對國家、民族、社會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他（她）們中，有十位院士：中國科學院的蔣麗金（化學）、刑其毅（化學）、劉若庄（化學）、金建中（物理）；中國工程科學院的李東英（化學）；中央研究院的郝履成（化學）；美國科學院的鄧昌黎（物理）；加拿大皇家學院的葉嘉瑩（中文）；第三世界科學院的荊其誠（心理）、董紹俊（化學）。許多校友成為科技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體育界、外交界、政界的知名專家學者或領導人。如科技界的張禮、彭勤奮、張聞選、范繫、魏凌、張金銓、吳超元、王駿等；教育界的劉達、郝德元、張厚、張振東、龔士榮、郭預衡、甲凱、鄭必堅、歐陽中石、榮之穎等；文化藝術界的尚乾、李德倫、朱家潛、史樹青、齊良遲、侯榕生、張秀亞、周海嬰、李淑君等；體育界的黃中、李鳳樓等；外交界的孟英、陳叔亮等；政界的王光英、王光美、張珍、彭濤等；知名人士吳祖坪、王紹楨等。他（她）們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國際交流起到了開拓作用。而更多的校友是在踏踏實實地服務於各條戰線，默默無聞地渡過一生，平凡中見不平凡，把青春奉獻給國家、民族、社會，更為可敬可佩。

北京輔大的校友，對培育他（她）們成長的母校懷有深厚感情，特別是當年教育他（她）們的眾多學貫中西的中外學者、專家和陳垣校長的人品才華，對他（她）們一生的為人處事，影響殊深。在逝去的歲月裡，在不同的人生旅途中，大家牢記並實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精神，對青年時代所經受的時局動盪、民族屈辱的歷史社會環境下，還能受到當時十分難得的良好高等教育，深感自豪和慶幸。

今天，我們回顧北京輔大上世紀二十七年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的時候，世界已經進入了嶄新的廿一世紀，台灣輔仁大學也已迎來了復校四十週年，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後繼有人，我們祝願源源不斷的輔人，將為今後世界的和平發展繁榮富強帶來更為傑出的成績和貢獻。

參考書目：

- 1.《北平私立輔仁大學檔案》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保存
- 2.《北京師範大學校史》一九〇二～一九八二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四

附 錄：

- 1.輔仁大學簡史（一九二五～一九五二）
- 2.《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八
- 3.《陳垣年譜配圖長編》 沈陽 遼海出版社 二〇〇〇
- 4.《輔仁校友通訊》 一～廿三期 北京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 一九八四
～二〇〇一
- 5.《輔仁大學年刊》（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〇年）

陳垣與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邵台新

一、前言

輔仁大學為教廷所設的天主教大學。陳垣於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起擔任輔仁社的副校長，民國十八年擔任依照大學法立案後的第一任校長，直至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止，他都擔任校長。¹ 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許多名校皆往南遷，留在北平的學校也被日人管制，剩下少數的學校如輔仁、燕京，借重外國的力量，得以延續原本的教育工作。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年）爆發之後，燕京大學立即被日本憲警侵佔，學校停辦。輔仁大學由於德國與日本的特殊關係，得以繼續開辦至抗戰勝利，而且是北方淪陷區唯一不掛日本國旗，不用日本課本，不以日語為必修課的學校，也是國民政府唯一承認學歷的淪陷區高等學府。²

陳垣校長在抗戰這段時間，一方面要抵制偽政權誘招，不出任偽職；一方面又擔心抗日被捕的教職員生的安危；加以生活物質的缺乏，學校經費短絀，真是備受煎熬。

抗戰八年期間，正是輔仁大學極其特殊而有意義的階段，校長的理念與學校的組織形態，維持學校的運作度過極艱辛的年代。因此，選擇「陳垣與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作為討論的題目，可以突顯陳垣校長與輔仁大學在此時代的意義。

二、輔仁大學的創設

輔仁大學是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八月的全美本篤會大會中決議，委派本篤會賓夕凡尼亞州（pennsylvania）聖文森會院（Saint Vincet Archabbey）的院

¹ 輔大編輯委員會，《輔大五十年》，輔大出版社，民國 68 年，台北，頁 6，頁 7，頁 14。

² 高時良主編，《中國教會學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208。

長司泰萊 (Aurelius Stehle) 負責籌設。³ 一九二四年 (民國十三年) 六月, 教宗庇護十一世發佈北京天主教大學為教廷大學, 任命司泰萊院長為校監 (chancellor) 並授權人事與課程內容的安排。⁴ 一九二五年 (民國十四年), 司泰萊派任美國本篤會會士, 俄亥俄州西頓大學 (Seton University) 教授奧圖爾博士 (Rev. George Barry O'toole) 為未來的大學校長, 並且前往中國籌辦各項事宜。⁵

一九二五年 (民國十四年), 先成立國學專修科, 招收大學預科生, 並將學校取名「輔仁社」, 委派英斂之作社長, 此為輔仁大學的前身。⁶ 一九二六年 (民國十五年) 英斂之逝世, 臨終委託陳垣, 繼續籌辦大學。⁷

一九二七年 (民國十六年), 依照當時教育部的規定, 制定了「董事會章程」, 並在六月舉行第一次董事會, 會議上推選陳垣為校長, 奧圖爾為校務長, 學校改「公教大學」為「輔仁大學」, 全名為「私立北平輔仁大學」。⁸ 會議後呈報教育部立案, 不久, 教育部批准試辦。此時輔仁大學招收大學本科系的史學系、國文系、英文系三系的學生, 於九月廿七日開學。⁹

一九二九年 (民國十八年), 按照當時教育部的條例, 大學必須有三個以上的學院, 因此在六月添設理學院、教育學院, 並將原有的文科各系合成文學院。¹⁰

一九二九年依照教育部新公布的「私立學校條例」, 重新聘請董事, 並且在七月召開新的校董會, 會中共推張繼為董事長。在廿七位董事 (含董事長) 之中, 直接為教會人士者為:¹¹

剛恒毅 羅馬教宗駐華代表 義大利人
孫德楨 蠡縣區主教

³ 同註 1, 頁 4~5。

⁴ 施麗蘭, <美國本篤會史德樂神父與教廷在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的創立 (1924~33)>, 《第七屆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中國教理講授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民國 90 年 9 月, 頁 175。

文中「史德樂」神父 (Aurelius Stehle) 於《輔大五十年》譯為「司泰萊」。文中第 32 註 31 用「Protocol N.2244-24 這文件及以後教宗給校監的敕令, 註明學校是教廷的」。

⁵ 北京師範大學校編寫組編, 《輔仁大學簡史 (1925~1952 年)》,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2 年, 頁 219。

⁶ 同上

⁷ 同上, 頁 230。

⁸ 同上, 頁 222。

⁹ 同上, 頁 223。

¹⁰ 同上, 頁 224。

¹¹ 同上, 頁 225~226。

陳國砥	汾陽區主教	
朱開敏	海門區主教	
陰若山	台州區主教	
張智良	東蒙古區主教	
程有猷	宣化區主教	
伊德風	北平本篤會院長	美國人
奧圖爾	本校校務長	美國人
鮑尼腓	本校事務長	美國人
高福德	本校訓育主任	美國人

由此可見教會在學校的實際影響力很大。根據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所制定的學校組織大綱規定，校長總管校務，代表全校負責國內的一切關係；校務長除協助校長管理校務，則代表全校負責對國外一切關係。¹² 校務長的職務相當重要，凡是學校的公文，在校長簽名之後，也須經旁列校長之側的校務長簽名，而且校務長也是修會在輔仁大學內最重要的代表。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本篤會有三十名以上的會士與六名修女，而聖文生總修院有十一名人士，投入輔仁大學培育青年。¹³ 這些外籍教會的人員，也是當時輔仁大學的特色。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由於美國經濟不景氣，輔仁大學的基金貶值，以及向美國募款困難，影響學校的維持與發展。因此教廷將輔仁大學交由德國聖言會（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接辦，並由聖言會在山東區會長舒德祿神父（Fr.Theodore Schu,SVD）與鮑潤生神父（Fr.X Biallas,SVD）於六月前來辦理移交，七月任命穆爾菲（Fr.X Murphy,SVD）為校務長。¹⁴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本篤會的修女離校，轉往河南開封傳教，輔仁女中由聖神婢女傳教會（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修女接管。民國二十五年，德籍雷冕博士（Rev.Rudolf Rahman）接任前一年逝世的穆爾菲為校務長。¹⁵

¹² 北京師範大學校編寫組編，《輔仁大學簡史（1925~1952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頁222。

¹³ 高時良主編，《中國教會學校史》，頁178。

¹⁴ 輔大編輯委員會，《輔大五十年》，頁9。

¹⁵ 同上，頁11。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件後，北平淪陷。輔仁大學由於德日兩國親善的緣故，得以繼續開辦。

三、抗戰時期的陳垣校長

民國二十六年抵抗日軍的二十九軍於七月底撤出北平，日本特務機構就扶持臨時統治機構，在八月一日由清朝遺老江朝宗組織「北平市地方維持會」，並出任維持會會長，十日又任北平市市長，聘請大批日本顧問。¹⁶ 十二月十四日統治華北地區的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中南海登場，用「中華民國」年號，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並以曾任北京政府內務部總長與財政部總長的王克敏出任委員長；在其行政委員會下設立行政、治安、教育、救災各部。¹⁷ 偽臨時政府受到日本的正式承認，並大量聘用日人當顧問。北平陷入日人指使的漢奸集團統治。

在北平淪陷初期，許多藝術界的巨匠與文化界的大儒，紛紛拒絕與敵偽同流合污。例如國畫大師張大千拒絕出任「日本藝術畫院院長」，陳垣拒絕厚祿出任「東亞文化協議會」副會長之職。¹⁸ 其中在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日偽政權命令全城懸掛日偽國旗，慶祝日軍攻佔徐州，而陳垣校長大義凜然，表示寧願“捨身而取義”，絕不能執行。¹⁹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訓育主任伏開鵬因遣送學生南下，遭日本憲兵逮捕；教務主任胡魯士也因學生南下問題被捕。²⁰ 民國二十九年，伏開鵬又因組織學生參加三青團被捕；民國三十年秘書長英千里被捕；民國三十三年代理文學院長董洗凡、教育學院院長張懷、英千里等師生三十餘人被押至憲兵隊及偽監獄。²¹ 在此教師不斷被捕的情況之下，陳垣所受的煎熬，在寫給方豪的信中提到：「…伏開鵬司鐸被捕已一星期，至為焦慮…」，²² 何況後來陸續多人被捕，學校遭到日人

¹⁶ 曹子西主編，《北京通史》第九卷，中國書店出版，頁 80。

¹⁷ 同上，頁 81。

¹⁸ 同上，頁 90。

¹⁹ 同上

²⁰ 北京師範大學校編寫組編，《輔仁大學簡史（1925～1952 年）》，頁 238。

²¹ 同上，頁 239。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政治類 650，「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抗戰期間應受褒揚名冊」，其中教師三十三人，學生三人。

²²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298。1939 年 8 月 9 日函，憂慮伏開鵬被捕，因此伏開鵬被捕應在民國廿八年，而不是《北京通史》所載民國廿七年八月。

嫉恨。

抗戰勝利之後，陳垣校長以公函致送北平市教育局局長，公文中：

「案查自抗戰軍興以來，本校處敵偽嫉視壓迫之下，惟持有不屈不撓精神，努力奮鬥以完成建國儲才之使命。二十七年五月，本校因拒絕慶祝徐州陷落，附屬中學曾遭封閉，二十八年八月訓育主任伏開鵬因遣送學生南下而遭縲紲，於是敵人遂指本校為抗日大學……竊念本校在八年長期抗戰之中，全校同人備受艱辛，所以委曲求全者，無非為保存淪陷區教育之一線。……又自歐戰勃發後，本校經費奇絀，曾向各方捐募，偽組織極願每月有所補助，囑為呈請，經本校婉詞拒絕，不得已僅接受地方公益獎券餘款兩次，以資接濟。此為本校八年間，委曲求全之實在情形……」²³

寫出八年之中輔仁大學在敵人環伺下的艱難，以及經濟方面的困境。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全校師生和返校的校友在大操場開運動會，由陳垣校長首先致詞，他說了一個故事，名之為「孔子開運動會」，是引用《禮記·射義》的話。意思是說孔子有一次舉行射箭的運動會，在射箭前，命令學生子路宣布，凡是敗軍之將、投降仕敵、亡國的大夫、任職敵偽、貪財好利者皆不能進入會場；射箭比賽後，孔子又命學生宣布，在場有幼壯孝弟，年老好禮，不隨波逐流，一直都能修身者，皆可留下；最後又說：凡好學不倦，好禮不變，八、九十歲仍能正直不亂者，可以真的坐在賓客之位。²⁴陳垣用這一段故事諷刺降敵出仕偽政府者，可見他的嫉恨漢奸之心。

在八年之中，陳垣專心教書與著書。他採用的教材《日知錄》與《鮎埼亭集》充滿了民族主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

四、陳垣抗戰時期的學術著作

抗戰期間，陳垣藉由著作抒發心境，不但改變以往著重考據的風格，且於著作之中多所評議，隱喻其抗日的思想。

²³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政治類 650，私立輔仁大學公函仁字第三四八一號，公函中的公文沒有標點，為作者所加。

²⁴ 北京師範大學校編寫組編，《輔仁大學簡史（1925～1952年）》，頁 240～241。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廿三日，陳垣寫給陳樂素的信中：「近欲為一文，名〈明季滇黔之佛教〉未知能否？」²⁵ 此時已醞釀其著名的抗戰「宗教三書」—〈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鑑胡注表微〉，而此三書表達了陳垣抗戰時期的思想。

〈明季滇黔佛教考〉

全書於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撰成，分成六卷。陳寅恪為〈明季滇黔之佛教考〉所作之序指出：

「抑寅恪讀是書竟，別有感焉。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總不能無所關涉，即就先生是書所述者之……今日追述當時政治的變遷，以考其人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²⁶

其中「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或許正是陳垣著作的本意。

陳垣在民國四十六年為〈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寫的「重印後記」表明：

「此書作於抗日戰爭前，所言雖係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遺民逃禪之眾，及僧徒拓殖本領，其實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遺民之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跡而已。」²⁷

其中所要表彰的遺民「愛國精神」、「民族氣節」，正是抗戰期間所須秉持者。

在〈明季滇黔佛教考〉的〈遺民之逃禪〉一節的末尾，引述范蔚宗的話：

「漢世百餘年間，亂而不亡，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而補充為「然則明之亡而終不亡，豈非諸君子心力之為乎！」

正是反映己身之意，在抗戰期間要為「建國儲才」。²⁸

在〈明季滇黔佛教考〉的〈遺民之僧侶〉之中，陳垣提出：

「…故能否保持遺民資格，應以有無出任為斷…」

並且在這節的議論之中，對於降臣，尤其投降而出仕者，不能諒解，所以對一般人所同情的李陵，並不贊同；而五代的馮道歷經各朝任官，被其評為「滅廉

²⁵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頁 646。

²⁶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陳援菴先生全集》專著九，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頁 179。

²⁷ 同上，頁 176~177。

²⁸ 同上，頁 442。

恥而不顧」。²⁹

陳垣的學生柴德賡認為這本書是陳垣在自己的著作之中開始大量發表議論，抒發自己的愛國感情。³⁰

北師大陳其泰教授認為，陳垣從這部著作開始，大量正面發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意義的議論，體現了時代精神，由以往嚴密考證的作風，走向更高的層次。

31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陳垣所謂新道教，是指金朝與元朝之時的全真、大道、太一三教，三教的教祖皆生於北宋，而創教於宋朝南渡之後，皆義不仕金朝。³² 陳垣特別提出全真教的王重陽本來是士流，其弟子又皆為讀書種子，所以能夠結納士類，而士類也就樂就之，以致全真教遂為遺老之會集之處。³³

陳垣認為全真教徒隱居求志，獨善其身，不臣不仕，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³⁴ 他以馮道與丘處機為例，馮道為人刻苦儉約，和光同塵，頗與全真教徒相合，所不同者，馮道出仕而求富貴，丘處機不仕而不求富貴。馮道為四朝之臣，對於喪君亡國未嘗介意，是孔子所謂德之賊，那能與全真之徒相比？

35

這本六萬餘言的著作，陳垣藉此表達在異族統治之下不出仕之意。

<通鑑胡注表微>

陳垣在民國三十二年開始寫這本書，胡三省字身之，生於南宋末年，卒於元朝，宋朝亡後，胡三省隱居而注《通鑑》，除了校刊糾繆之外，表達亡國之痛，並倡導民族氣節。陳垣對胡三省《資治通鑑注》的內容，極其感慨，而有共鳴之感，在《通鑑

²⁹ 同上，頁 433~434。

³⁰ 柴德賡，〈陳垣先生的學識〉，《勵耕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三聯書店，1982 年，頁 44。

³¹ 陳其泰，〈陳垣先生學術思想的昇華—《明季滇黔佛教考》的成就〉，《紀念陳垣校長誕生 110 週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年，頁 46~65。

³²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陳援菴先生全集》專著 8，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頁 2661。

³³ 同上，卷一全真篇上，士流結納第四，頁 2678。

³⁴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陳援菴先生全集》專著 8，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頁 2676。

³⁵ 同上，頁 2678。

胡注表微>的引文：

「……一日讀後晉紀開運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晉宋為然，嗚呼痛哉！』又曰：『亡國之恥，言之者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敘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讀後不禁淒然者久之。」³⁶

陳垣引發亡國之痛，而有淒然之感。

陳垣對胡三省在注中仍稱宋朝為「我宋」或「我朝」的民族意識，極其贊同，並且在〈夷夏篇〉中：

「夷夏者，諸夷而夏之觀念，在今語為民族意識……當國家承平統一時，此種意識不顯也，當國土被侵陵或分割時，則此種意識特著。」

³⁷

這種「民族意識」深植陳垣的心中，他在〈通鑑胡注表微〉之中，曾經多次提到，而且感慨很深。他在引言中提到胡三省：

「身之生民族意識顯著之世，故能瞭解而發揮之，非其世，讀其書，不知其意味之深長也。」³⁸

其中頗有自己處於淪陷區，因而能知其意味之意。胡三省對知識份子於亡國後出仕，持保留的態度，而陳垣在〈出處篇〉的引言：

「出處之於人大矣，迫於飢寒，怵於威力，炫於樂利，皆以失其所守也，故身之注通鑑於出處之節，三致意焉。」³⁹

陳垣對於知識份子氣節的表現，認為在帝制時代擔任重要職務而能盡節而死，此為臣節的最高表現，其次為執節不仕者，其他出仕而保祿位，則為賣國之徒。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陳垣完成〈通鑑胡注表微〉，前後發表於《輔仁學志》第 13 卷第 1.2 期合期與第 14 卷第 1.2 期合期。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通鑑胡注表微〉發表感想：

「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

³⁶ 陳垣，〈通鑑胡注表微〉，《陳援菴先生全集》專注 8，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頁 2781，為民國 34 年所寫「小 31」。

³⁷ 陳垣，〈通鑑胡注表微〉，《陳援菴先生全集》專注 8，頁 3091。

³⁸ 陳垣，〈通鑑胡注表微〉，頁 3091。

³⁹ 同上，頁 3050。

的心情，慨嘆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

可見這本書對他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北師大教授吳懷祺認為〈通鑑胡注表微〉全面反映陳垣的史學思想，治史成就和學風特徵。⁴⁰ 白壽彝則認為本書為陳垣所有著作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⁴¹

五、抗戰時期輔仁大學的調整

（一）日籍教師的聘任

輔仁大學在這段艱困的時期，也作了一些調整。在教職員聘用方面，據「廿六年度教員履歷一覽表」，其中尚無日籍教員，⁴² 至二十七年九月則有日籍細井次郎前來任職。⁴³ 民國三十年，日籍教員除細井之外，尚有二十九年三月任職的美惠子與三十年九月前來的渡邊善次。⁴⁴ 民國三十一年度的日籍教師增加酒井梯、川添達人、直江廣治、上田辰之助等人，連同前述三人，一共七人；其中細井次郎擔任三十一年成立的日文系主任之職與教務長首席秘書。⁴⁵ 教務長首席秘書在學校的公文上簽名，表示校長、校務長過目的公文，也需教務長首席秘書看過。民國三十三年，日籍教員多達十一人，他們的課程多與日文有關，而薪資所得相當高，其中細井次郎有日本文學演習（4小時）、教育學概論（6小時）與近代教育思想（4小時），又兼行政職務，以致俸給有2445元；另外兩位教授則為1760與1810元；副教授四位分別為1460，1410，1395，1410；講師則為1379，1350，1323，972，972元，⁴⁶ 他們的薪資相當高。

民國三十三年所聘的學校董事會董事，名單中有五四運動時期，為學生所唾棄的親日份子曹汝霖，可知此或為不得已的保護學校方法。⁴⁷ 抗戰結束後，董事名單中，即無曹汝霖。

⁴⁰ 吳懷祺，〈《通鑑胡注表微》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價值〉，《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週年學術論文集》，頁134~135。

⁴¹ 劉乃和，《勵耕承學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2，白壽彝所寫的序文。

⁴²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57，「廿六年度中外教職員履歷一覽表」。

⁴³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58，「廿七年度中外教職員履歷一覽表」。

⁴⁴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61，「三十年度學校教員一覽表」。

⁴⁵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61，「日籍及其他外籍教員一覽表」。

⁴⁶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63，「三十三年度日籍及其他外籍教職員一覽表」。

⁴⁷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總類5，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十日擬稿。

(二) 德籍教員的聘任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在輔仁大學教員履歷表所列的德籍教員有十名，其中兼有行政職務者有七人，列名於後：

雷冕 教務主任
李士嘉 數學組組長及物理學組組長
卜樂天 化學系主任
嚴池 理學院院長暨數學系主任
豐浮露 哲學心理系主任暨哲學組組長
葛爾慈 哲學心理系心理學組組長
謝禮士 圖書館主任

以及司徒資、艾克、吳保黎等三人。⁴⁸

民國廿七年的「職員履歷一覽表」中有德籍十二人，與抗戰前的民國廿六年相比，少去司徒資，而增加會計課課長商樹勤與庶務課課長克禮和。⁴⁹ 民國廿九年的職員一覽表顯示約有廿五名德籍人士在輔仁大學服務，⁵⁰ 民國三十年的教員一覽表之中，有三十二位德籍人士，其中於抗戰之後，民國廿六年任職者一位，廿七年任職者五位，廿八年任職者六位，廿九年任職者九位，三十年任職者二位，顯示抗戰期間任用的德籍教員比例頗高，其中雷冕、吳彬雅、嚴池、李士嘉、歐思德、卜樂天、葛爾慈等兼行政職務。⁵¹

民國三十一年度的德籍教員有三十二人，其中廿七人不支薪。⁵² 不支薪者多為聖言會修士與聖神婢女傳教會的修女。

民國三十三年度，有德籍教職員五十二人，其中有教職者三十八人，至於其他國籍的學者，計有日本十二人，愛爾蘭一人，瑞士一人，義大利一人，法國一人，而愛爾蘭與法國教師僅教授英文與法文。⁵³

抗戰期間，輔仁大學在教廷與聖言會的協助下，可以任用大批德籍人士，以維護學校。與輔仁大學同在北平的教會學校燕京大學，在蘆溝橋事變後，利用美

⁴⁸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 57，「廿六年度中外教職員履歷一覽表」。

⁴⁹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 58，「廿七年度中外教職員履歷一覽表」。

⁵⁰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 60，「廿九年度職員一覽表」。

⁵¹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 61，「三十年度學校教員一覽表」。

⁵²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 61，「日籍及其他外籍教員一覽表」。

⁵³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人事類 63，「三十三年度日籍及其他外籍教職員一覽表」。

國關係，勉強維持一時。然而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於事件發生後數小時，北平的日本軍憲即馳赴燕京大學，佔據校園，驅逐師生，並將美籍教職員送往集中營。⁵⁴民國三十年底以後，北平猶能不被日本管理或封閉的大學，僅存輔仁大學，但是校園中已無美籍教員。

（三）招收學生

輔仁大學在抗戰時期仍然增加學系與招收女生，所以學生增加的速度頗快。從下列資料可以顯示學生數目的成長：

民國十八年	原有學生 44 人	考收新生 70 人	退學與休學 19 人
民國十九年	原有學生 88 人	考收新生 201 人	退學與休學 27 人
民國二十年	本科生 679 人	專修科生 12 人	
民國廿六年	學生 810 人（註冊 583 人）		
民國三十一年	男學生 1368 人		
	女學生 899 人	共計 2267 人	
民國三十三年	文學院 1097 人		
	理學院 363 人		
	教育學院 345 人		
	理科研究所 49 人	共計 1854 人	⁵⁵

這些抗戰時期增加的學生，許多是為了取得國民政府承認的學歷而來。民國三十一年學生學費為 80 元，雜費為 10 元；⁵⁶ 而民國三十二年四月所作的學生生活調查表，平均每個學生每月支出 50.1 元。⁵⁷ 在當時輔仁的學雜費比起一些偽校不收費而言是偏高，但是師資與課程優良，仍具吸引力。學生是學校發展的動力，而輔仁大學在抗戰時期的學生數目相當穩定而成長。

六、結論

以往關於輔仁大學於抗戰時期的著作很少，因為淪陷地區的教育資料保存較

⁵⁴ 梅貽寶，《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聯經出版社，民國 71 年，頁 72。

⁵⁵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總類 2，「本校關於學校概況情形向上級單位的報告」。

⁵⁶ 私立輔仁大學檔案，總類 16，「關於開發株式會社、警察分局，教育總署對學校的調查表及學校的覆函稿」。

⁵⁷ 同上

少，加以學校的檔案資料取得不便，難見相關的完整著作。近年來，各著名學校紛紛著手於校史的研究，召開校史的討論會，以學術的觀點著手著述，保存學校的歷史。輔仁大學這次舉辦的「校史論壇」正符合這股潮流，而且由兩岸的校友共同努力，尤其具有特色。這次藉由「校史論壇」提出「陳垣與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是想推崇當時學校的教育工作者的貢獻，彰顯輔仁大學的特質，而陳垣校長與北平輔仁大學本來就是一體，他在抗戰時期堅持愛國教育的理念以輔仁大學抗拒日偽政權的作為是一致的。

The 1924 Peking Letters of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regarding
Plans to Establish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by

Nicholas Koss, O.S.B.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Peking by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s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in the mid-1920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O.S.B. (1877-1930) at the request of the Vatican. Last year, the history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was published b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under the title of *Mission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The First*. Chapter Six of this history, “Mission to China (1918-1930)” describes the founding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Chapter Seven, “Depression and Judgment,” presents the circumstances that forced the Benedictines to hand the University over to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in 1933.

In 1924, Archabbot Aurelius appointed fifty-four year-old Fr.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former Prior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to go to Peking to investigate establishing a university. Fr. Ildephonse and another Benedictine, Fr. Placidus Rattenberger, O.S.B., arrived in Peking on July 8, 1924 and immediately began the monumental task of ascertaining the possibility of setting up a Catholic University. Shortly thereafter, Fr. Ildephonse began writing letters back to St. Vincent. Many of these letters were to Archabbot Aurelius both informing him of the situation in Peking and also asking for his instructions as to how to proceed. On average, Fr. Ildephonse wrote a letter to St. Vincent Archabbey every two weeks. The Archives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contains nine letters written by Fr. Ildephonse for the year 1924¹.

These letters are mainly written to 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O.S.B., Archabbot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Mission to America* describes at length Archabbot Aurelius’ tenure as Archabbot and his role in directing the founding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he folder for the letters of Fr. Ildephonse are also carbon copies of five letters written by Archabbot Aurelius to Fr. Ildephonse in 1924. These letters of Archabbot Aurelius will be referred to only to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 of Fr. Ildephonse’s letters. A detailed study remains to be done on Archabbot Aurelius’ many letters related to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n interesting fac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bbot Aurelius and Fr.

Ildephonse is that as a young priest Fr. Aurelius was under Fr. Ildephonse when he served as Prior to Archabbot Leander. With Fr. Aurelius' election in 1918 as "abbot coadjutor," however, Fr. Ildephonse, who was seven years older than Archabbot Aurelius, then had the former Fr. Aurelius as his superior.

Other letters by Fr. Ildephonse for 1924 were written to the Prior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to his Benedictine priest-confreres, to the Mercy Sisters of St. Xavier Academy, and Fr. Barry O'Toole. The prior at a Benedictine abbey is appointed by the abbot and assists the abbot in running the abbey. St. Xavier Academy, run by the Pittsburgh Sisters of Mercy, was a private Catholic high school for girls very near to St. Vincent Archabbey. Fr. Barry O'Toole, a diocesan priest who was teaching at St. Vincent Archabbey and who was the first, on a trip to Peking, to suggest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s as a possible choice to operate a university there, was soon to be appointed the first Rector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and was at this time finishing the writing of a book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24 letters of Fr. Ildephonse provided Archabbot Aurelius with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before his visit to Peking in February of 1925. In this paper, therefore, I will study these letters to see what they contain in this regard,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se issues: whether a college (i.e., high school) or university should be set up first, where the students would come from, the courses to be taught, the site, finances and the role of Chinese Catholic laymen. These letters also contain fascinating comments 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and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remarks related to how Fr. Ildephonse as a Benedictine monk handled the situation of being sent at the age of fifty-four to work in a culture entirely new to him. These passages, however, will be the subject of another study.

The letters in the Archives of St. Vincent written by Fr. Ildephonse do not include all of the letters he wrote from Peking as can be seen in the mention of letters in the extant letters that are not in the folder. For example, in his letter of August 20, 1924, Fr. Ildephonse refers to his letter of August 1, which is not found in the Archives. Then, in a letter date October 18, 1924 from Archabbot Aurelius to Fr. Ildephonse, there is reference to Fr. Ildephonse's letter of September 19, 1924, but this letter, too, is not in the Archives.

The time it took for a letter from Peking to reach St. Vincent Archabbey was usually a month or six weeks. Archabbot Aurelius, in his letter of September 17, 1924, notes that Fr. Ildephonse's letter of July 31 only arrived on September 16. Later, the Prior of St. Vincent would also mark on letters from Fr. Ildephonse the date of arrival. Thus, on Fr. Ildephonse's letter of October 11, 1925, there is the notation "Re'd Nov. 6, '25." Needless to say, the amount of time necessary to exchange letters at times created

problems for Fr. Ildephonse who at times needed immediate answers from the Archabbot. In some of these cases, cablegrams were used to expedite communication. Some of these cablegrams too have been preserved in Fr. Ildephonse's folders of letters. Fin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German, not English, was Fr. Ildephonse's first language. St. Vincent Archabbey was founded from Bavaria in 1846. Archabbot Aurelius was the first Archabbot of St. Vincent not to have been born in Germany. Some of the letters of Fr. Ildephonse, especially to his confreres, are written in German, though the great majority are in English.

Fathe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arrived in Peking on Tuesday, July 8, 1924. On July 17, they wrote a joint-letter to Archabbot Aurelius. The letter is "a brief exposition of the prevalent conditions and impressions bearing upon our enterprise, received from authoritative sources." The "enterprise" is establishing a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authoritative sources" are Archbishop Celso Constantini, the first Apostolic Delegate to China, who had arrived in Peking in 1923; Bishop Stanislaus F. Jarlin, C.M., retired vicar apostolic of northern China; and Bishop Jarline's coadjutor, Bishop Fabrique.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Latin with the French ecclesiastics as can be seen from a subsequent letter (July 20, 1924) where Fr. Ildephonse writes, ". . . none of these men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at Peitang] speak English. . . . Then too we soon noticed that Ciceronian style was not in vogue, and the rules of Englemann [the author of a Latin grammar] were infringed upon with impunity; but this we must concede that some of these Fathers in fact most of them have quite a fluency in the use of the Latin tongue." Latin was probably used in the interviews with Archbishop Constantini too, for in later years Fr. Ildephonse becomes the Archbishop's instructor in conversational English.

The letter of July 17 indicates that the journey of F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to Peking is exploratory in nature when at the end it is mentioned that "the Apostolic Delegate is very anxious that the Benedictines should accept this honor and preference [of establishing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Apparently, no final decisions have as yet been made by the Benedictines in this regard. This letter is thus the first, on-site report to the Archabbot to provide him and the St. Vincent Chapter with material to be used in making the final decision.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this letter, describing their first "interview" with Archbishop Constantini, which was made on Wednesday, July 9 according to a subsequent letter (July 20, 1924), F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write that the Apostolic Delegate "laid stress on the difficul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task. He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charity and harmony in all our dealings." The Benedictines then note, in a kind of an asid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advice" was seen during their subsequent visits with the bishop and others. Concluding their description of this first visit to Archbishop

Constantini, they write, “Especially did he impress upon us to consult the Bishop frequently, accept suggestions freely, promise nothing, and only after mature deliberations to draw our conclusions.”

What this second paragraph does is to present indirectly the very complicated canonical situation at work with the Benedictines arriving in China. The Benedictines are an exempt religious order within the structure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s such, they ordinarily operate within a diocese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Bishop but the work they do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Bishop, except that episcopal permission is needed for parochial activity. This “exempt” status is taken most seriously by Benedictine abbots. But, both exempt religious orders and Bishops, in various ways, are subject to the Holy Father. The Benedictines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arrived in China at the request of the Holy Father, who apparently was responding to petitions from Chinese Catholic intellectuals. It was not Bishop Jarlin who initiated the request for the Benedictines to go to Peking, yet he would have known very clearly that it was the “wish” of the Holy Father. Therefore, when Archbishop Constantini was telling F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the necessity of charity and harmony in all our dealings,” it was said in light of this complex canonical situation.

A COLLEGE (I.E., HIGH SCHOOL) FIRST?

In the third paragraph of the letter of July 17, F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describe their first meeting with the “Bishop.” Since Bishop Jarlin has already retired, I take “Bishop” here to refer to Bishop Fabrique, the Coadjutor.

The Bishop refers to the word “University”, as mentioned in our document, most emphatically. He expresses himself positively aga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ege [high school] as such, but is willing to concede a two years preparatory course for the university. This preparatory course he calls a “Gymnasium Major course”. His reasons for opposing the erection of merely a college [high school]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already colleges in Peking. 2; (sic) A mree [sic; pencil corrected to “mere”] college will not attract the Chinese students. 3. The document from Rome demands the erection of a University.

With this paragraph comes a controversial issue related to establishing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and one that will often be discussed in later letters of Father Ildephonse: whether or not the Benedictines can set up a “college” prior to establishing a

university. Here the meaning of “college” as used in this and subsequent letters, is similar to that of “high school” in the American sense of the word. In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to start a university and not a college what the Bishop does not mention but which is reported by Fr. Ildephonse in a much later letter is that the Bishop himself is planning such a school. But certainly it is the Bishop’s right to set up whatever schools he wants in his jurisdiction.

There is no record that I have found yet of what instructions Fr. Ildephonse was given before leaving St. Vincent, but his letter of July 20 in which he describes their first meeting with Archbishop Constantini suggests that it was to begin with a college [high school]: “Naturally the purpose of our coming was discussed, as he [Archbishop Constantini] spoke of naught else but a university, the erection of which was entrusted to us by the Holy See, some misgivings crept into our souls as our ideal was not higher than the rearing of a college.” It should also be remembered that at this time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s did not operate any universities, but only high schools and colleges. Moreover, the tradition that was begun at St. Vincent and continued at other monasteries of the American Cassinese Congregation was to establish first a high school and then a college, college meaning here a four-year post-secondary liberal arts program. By this time at St. Vincent, besides a college (in the American sense) and seminary, there was also a high school that educated both Benedictine aspirants and regular “secular” students.

Besides being the ordinary way that American Benedictines went about establishing schools, a second reason for the desire to begin with a college would be that it could also be used for training Benedictine candidates, as was done at St. Vincent where regular students and Benedictine candidates attended classes together. The fourth paragraph of the letter of July 17 thus begins: “In an interview, July 14, the Apostolic Delegate was asked directly by Father Ildephonse, whether it would be permitted to erect an academic course for such boys and young men who might become candidates for the Order.” As subsequent letters will show, Fr. Ildephonse’s interest in this point stems from his realization that if the Benedictines are eventually to be successful in running a university,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Chinese Benedictines to help run it.

The fifth paragraph suggests clearly that Archbishop Constantini understood the point Fr. Ildephonse was making about the need for a monastery, but that he also realized that the permission for a monastery must come from the Bishop:

Our work according to the Apostolic Delegate is twofold: the erection of a monastery with a religious training school, and the erection of a university. The right to establish a university has been granted by Rome, but for the erection of a monastery and training school for candidates, a written petition to the bishop is required. We think it best to leave this to you.

Nonetheles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letter it is clear that for the Apostolic Delegate the university comes first in importance. “According to the words of the Apostolic Delegate our chief purpose is to erect a university, and every thing else is only accessory.”

Subsequent letters of Fr. Ildephonse frequently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Benedictines should begin with a college. In the letter of July 17 to Archabbot Aurelius, this question appears to be rather theoretical. But, in the next extant letter of Fr. Ildephonse to Archabbot Aurelius, dated August 20, 1924, there is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a college in Peking being handed over to the Benedictines:

The other day One [sic] of the Irish [Lazarist] Fathers paid us a visit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long conversation informed us that the school, a kind of a High School, which they have been conducting, will be discontinued [sic] as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 . . . He too mentioned that he is certain the Brothers asked to continue the school, will not accept the offer should they become aware of conditions extant. Hence the natural sequence of events will be according to him that the bishop will offer that school to us and this will be tantamount to allowing us build a college. . . he believes that the scholars attending that school now will be a good nucleu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he himself being willing if so necessary to wait for one or even two years with his departure for Ireland. Such an arrangement he was sure would work out well. Our men could meanwhile devote some time and energy for the acquisition of the language of the land. To me the project looks splendid though a number of points shall yet have to be investigated before I could give my unqualified statement. This investigation shall gradually be instituted and then communicated to you.

Furthermore, in this same letter it is also said that the Bishop is now hinting he might permit “a two or three years’ preparatory course for the university, should we [the Benedictines] not be ready to begin the university at once” (2).

The Irish priest who was the source of this information is probably Fr. Mullen, who was first mentioned in the letter of July 20 and who, in a later letter, is said to be planning to return to Ireland. The above quotation also shows that another reason for having a college, besides training Benedictine candidates, was that it could be a sour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third reason is that it would give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s a chance to learn Chinese before embarking on running a university. Fr. Ildephonse’s tentative enthusiasm for such a school comes through clearly too.

Less than two months later, however, another possibility of a college for the Benedictines to have developed. In his letter of October 8 to the Mercy Sisters at St. Xavier, Fr. Ildephonse writes:

. . . a splendid opportunity is proffered us in the school of Kaifeng, which the bishop of the city desires us to take in charge. My confrere [Fr. Placidus] and myself deem this a splendid opportunity of establishing ourselves and assuring all the future success of the university. Anxiously are we awaiting the word of acceptance from Father Archabbot. My confrere [sic] is even now teaching in that school, whilst I am living the hermit in this populous city of Peking watching the progress of events.

From this letter, Fr. Ildephonse appears to be completely in favor of taking over this school, which is named Pei Wen Catholic Academy, and he assumes Archabbot Aurelius will approve. How the Benedictines came in touch with this school is explained in *Mission to America* (289-90).

Shortly after writing to the Sisters, Fr. Ildephonse journeyed to Kaifeng himself and on October 16 cabled Archabbot Aurelius:

Immediate acceptance of Kaifeng school most important for success in Peking undertaking. . . . Wire me Kaifeng Catholic Mission.

In his return cable, Archabbot Aurelius instructed F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to return to Peking. He also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be going to Peking too.

In a long letter written on October 18, Archabbot Aurelius explains why the Benedictines cannot accept the school in Kaifeng at this time but he allows for the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He further states that Rome is now allowing five years in which to prepare for the university and adds that it took the Jesuits in Tokyo seven years to set up Sophia University.

This letter of course would take some time to reach Fr. Ildephonse, who was determined that accepting the school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On October 21, he again cabled Archabbot Aurelius:

. . . Kaifeng school must be taken immediately or opportunity lost because exceptional site may be purchased ratione belli gubernium indiget peccuniis kaifeng only logical place for permanent monastic establishment therefrom develop pending foundation

Archabbot Aurelius immediately replied:

Obviously we can not accept a site even for nothing, if it involves doing anything that may interfere with the work outlined by Rome, i.e. the University at Peking. Patience, Obedience!

For Archabbot Aurelius, it simply was not possible to take the school at this time for that was not what Rome had asked the Benedictines to do.

Warlords made it impossible for F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to return immediately to Peking as they had planned. On November 1, Fr. Ildephonse wrote at length to Archabbot Aurelius on the topic of accepting Pei Wen Catholic Academy and gave various reasons as to why it should be done:

As far as conditions are concerned for commencing at once with teaching some faculties in the university, let me merely add this one consideration. We have interviewed th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indemnity college, two Chinese presidents of universities [sic] in TinTsin [sic] and there also the Jesuit Fathers conducting a university, then a number of priests, both Europeans and Chinese, men rather prominent in Chinese educational circles, all were of one min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commence a university here without having some “feeder” for the same and without first gaining through the 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a lower school a good reputation. Even with that reputation it is well to be kept in mind that the professors teaching in any school must know the language of the land, if not all at least some who are in charge of discipline and these must not be Chinese unless they be member of our community; any contrary method will not only court, but bring on the gravest difficulties and shall expose us to the ridicule of the entire broad land.

should we not at once grasp the excellent proposition of establishing ourselves here in Kaifeng and then as the time and occasion ripens to think of establishing ourselves in Peking and begin with the university. Here with experienced teachers in charge our men may gain the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experience needed for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our school; here we are favored with the best opportunities of gaining candidates both for an incipient Scholasticate and the lay-brotherhood. Similar chances shall not be given us in the Peking diocese. . . . (1-2)

According to Fr. Ildephonse, the Benedictines, if they are to open a university in Peking, need first a college as a “feeder.” Next,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s must have the experience of running a college first if they are to be able to run a university. Thirdly, it would give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s a chance to learn the language. Finally, the school would help to get Benedictine candidates.

But, good monk that he was, having given his side of the issue under contention, Fr. Ildephonse concludes this letter:

Now Father Archabbot rest assured we wish to fulfill you wish and desires best we can and guided by reason and solid human advice fructified by prayer and acts of mortification. As soon as feasible we shall return to Peking, rent a house and await your arrival which we hope will be in the near future. (2)

This letter to Archabbot Aurelius would of course only arrive in early December.

In his letter of November 7 to Fr. Ildephonse, Archabbot Aurelius is clear that the university must come first: “Roma locuta, causa finita” (2). And, by now it should be clear to Fr. Ildephonse that the Archabbot will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Rome.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is letter from Archabbot Aurelius, however, Fr. Ildephonse, on November 28, 1924, again wrote to Archabbot Aurelius his views on this matter:

I think I may be brief in this writing and merely ask you a question that I should very much prefer to discuss with you personally but owing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preventing you at present from coming over I had better place it now. How do you represent to yourself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t Pek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there? Do you expect to take in Chinese boys and educate them for the Order? Or do you intend to send all the professors from abroad [sic]? If the former would not our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acceptance of this Pei Wen school here in Kaifeng be found favorable or what reasons could be brought against them?

It is clear to Fr. Ildephonse that unless Chinese Benedictines are trained, St. Vincent Archabbey and the American-Cassinese Congregation would have to provide all the Benedictines who will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in Peking, a proposition that he must have thought that neither St. Vincent nor the Congregation would be able to accept.

On December 7, Archabbot Aurelius responded to Fr. Ildephonse’s letter of November 1, in which he had presented a number of reasons why the school in Kaifeng should be accepted. Archabbot Aurelius now explains his position, stressing ever so forcefully that

Rome is the final arbiter and that there might be other possibilities:

I can never forget the absolute certainty with which good Bishop Tacomi insisted on 'yes' for a reply. In fact he ruled out 'No' entirely.

The enclosed pamphlet shows our position as to the Peking Foundation. We can not jeopardize its success. Whether the simultaneous acceptance of the Kaifeng proposition would even be compatible, Rome would have to decide before we could accept same. Meanwhile for training our men, etc. we can of course avail ourselves of the Kaifeng opportunity. But what about the Father Mullen's School in Peking itself, which was offered us? Furthermore, is it really certain that 'similar chance shall not be given us in the Peking diocese? How about the neighborhood of Peking?

Before receiving this letter, Fr. Ildephonse, on December 28, wrote to one of his confreres, who had written to him earlier. (This letter is simply addressed to "My Dear Confrere," and I have not yet been able to identify which one.) Fr. Ildephonse explains what he sees as a great misunderstanding developing between the Archabbot and himself:

In fact the last words from the Archabbot nearly knocked the bottom out of me; had I been on a boat I surely would have dropped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when he talks of 'sub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by the institution here at Kaifeng. We never meant any sort of substitution for the university but believed that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we should commence a college here, or rather take over this school here develop it into a college and so render it possible to accept native boys and train them to become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and priests. Such a school is to my mind absolutely needed, how else could we get candidates and train them for the order. The university can not and will not be started for some years but here we can busy at once and instead of interfering with the university this school should rather put it on a more solid basis as surely some of these boys so trained would go it and continue their studies. I for myself can not conceive [sic] a future community here without a college or training school for boys, who intend to become Benedictines and priests. But as these will be few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we then can take in outsiders as at St. V. and to the number desired. For with a good large building [sic] hundreds of boys will apply unless the propaganda now for the least three years going on against the foreigners and the foreign school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ill gain headway and a revolution be instituted, which at the present moment is advocated in different centers and also in this city. But such a case is extreme and no human mind can foresee

conditions depending upon the radical element in the country. We can not be heeding mutterings that may never realize. (1-2)

The word “substitution” that so upset Fr. Ildephonse appeared in the Archabbot’s letter of November 7, in which the Archabbot detailed his plans for a trip to Peking and Rome, and explained what he expected of F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 . . I am relying on you and on Father Placidus to aid in every possible manner to carry out to [the] work enjoined upon us by the Holy See. Only after the task has been found impossible, not merely difficult, but actually impossible, only then can we request substitution of a task that seems to us more readily possible and obviously more likely to prove successful.

It seems that the Archabbot was simply one step ahead of Fr. Ildephonse in formulating contingency plans, but this somehow eluded Fr. Ildephonse. By the time of the Archabbot’s arrival in Peking in February 1925, Fr. Ildephonse would have had all of the Archabbot’s letters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begin with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During this up-coming visit of the Archabbot, the decision would be confirmed not to accept the offer of the Bishop of Kaifeng, and plans would go ahead to build the university and monastery in Peking. But,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given this background that when the Benedictines leav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1933, those who wish to remain in China, including Fr. Ildephonse, decide to go to Kaifeng.

STUDENTS FO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Fr. Ildephonse used in arguing that a college should be established first was that it could be a “feeder” for students to the university once it is set up. The letters of 1924 contain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question. In the first letter to Archabbot Aurelius (July 17), the second point mentioned by whom I assume to be Bishop Fabrique arguing for a university instead of a college is: “A mree [sic, corrected in pencil to ‘mere’] college will not attract the Chinese students.” Later in this letter, it is stated that both Archbishop and Bishop are positive students will apply to the university “if good discipline and a thorough course are offered” (2). Furthermore, it is assumed that these students will include both Christians and “pagans.”

Then, in his letter to the Prior of St. Vincent on July 19, Fr. Ildephonse gives a much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question: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student possibly applying in the beginning to the university opinions widely differ, the bishop and his Fathers being rather sanguine in their expectations whilst Fr.Mullen, of the Irish province of Lazarists and well versed in educational matters expressed his misgivings, pointing out however how a proximate estimate could be obtained by asking the prominent catholic colleges in the land, how many students they could possibly send us. This Feeler we shall throw out in the near future. All interested parties do agree, that the standard set by the university must be of a high grade, equal if not superior to the five or six universities already existing in this section of the land. Only efficiency shall beget success. (2-3)

Here we see that Fr. Mullen appears to be very influential in forming Fr. Ildephonse's opinions. Most interesting, however, is the general agreement among all parties involved th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must be "equal if not superior" to those universities already in operation in Peking. This passage shows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aim to mak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first-rate. But, in this same letter, Fr. Ildephonse also shows that he was under no illusion as to the quality of the other universities:

Here I may yet mention that the standards extant in the various institutions are rather low, students not properly prepared presenting themselves for the university and being accepted. (3)

By November 1, Fr. Ildephonse has become less sure about getting students for the new university. He writes Archabbot Aurelius:

As to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hat would apply for admission to our university the apostolic delegate stands alone in his optimistic views, bishop Fabrique at one time remarked that we would rather have to pay students to come to the institution rather than expect them to pay. (2)

The comment of the Bishop is striking in so far as that it seems to reflect what Fr. Vincent Lebbe has described as the method eventually used by French missionaries in norther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Bishop Jarlin of paying for Chinese to become Christians (Levaux 99-104). The irony of the comment, however, probably escaped Fr. Ildephonse. Nonetheless, before the visit of Archabbot Aurelius to Peking, a second problem that seriously worried Fr. Ildephonse was from where the students for the new Catholic

university would come.

THE NATURE OF THE NEW UNIVERSITY

Given the argument that students will come to a university with a good course, it is worthwhile to see what these letters say about the kind of instruction was being planned to be given at the new university. The letter of July 17,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ity, indicates that Archbishop Constantini

insists that the University include also a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course. The advice of the bishop is to begin with his so-called “gymnasium major course”, together with one or the other of the following faculties: philosophy, literature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history.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also have a theological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wishes of Archbishop Constantini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major seminary in Peking run by the Bishop. In his letter of August 20 to Archabbot Aurelius, Fr. Ildephonse describes a visit from the Rector of the Major Seminary during which the Rector requested Benedictines to come and teach, supposedly because somehow it would allow degrees to be given to the seminarians. The letters of Fr. Ildephonse have no more on this topic so early on Archabbot Aurelius must have decided against such a proposal. The assignment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from Rome was for a university, not a seminary.

As already mentioned, Fr. Ildephonse had doubts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at Chinese universities. His concern is th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not follow suit. In his letter of July 19 to the Prior, Fr. Ildephonse writes:

Surely foolhardy it would be for us to fly the flag of a university over a mere college building, such an action would be resented by the ecclesiastical authorities here and much more so at Rome. (3)

This insistence on quality would b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pproach of many of those involv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Another matter that Fr. Ildephonse was already thinking about w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His preference is to use English:

As far as language is concerned it seems to be an established fact that Englis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the commercial language of the land. This being viewed with regret on part of Frenchmen and a full-hearted cooperation on their side would naturally be out of question. However the advantages offered young men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english [sic] would lead them to an institution where that language i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Letter of July 19: 3)

Such a policy would also allow American Benedictines to begin teaching upon their arrival in China. By November 1, however, in his letter to the Archabbot, Fr. Ildephonse has become convinced that some of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s who will teach must also know Chinese

. . . it is well to be kept in mind that the professors teaching in any school must know the language of the land, if not all at least some who are in charge of discipline and these must not be Chinese unless they be member of our community; any contrary method will not only court, but bring on the gravest difficulties and shall expose us to the ridicule of the entire broad land. (1)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too that Fr. Ildephonse ha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should not be in charge of discipline at the university unless they are Benedictines. He seems to have a very strong sense that this should be a Benedictine operation.

In general, however, Fr. Idlephonse did not speculate too much in his letter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ity . This was probably because in his August 15 letter to Fr. Ildephonse, Archabbot Aurelius wrote: “Stave off the outlining of the course until Dr. O’Toole arrives.” Fr. Ildephonse was only to start planning in this regard once Fr. Barry O’Toole had reached Peking. As it turned out, Fr. O’Toole arrived with Archabbot Aurelius in February of 1925.

SITE OF THE UNIVERSITY

One of the basic decisions that had to be made before much else could be done was the selection of a proper site for a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a closely related question, since the university was to be Benedictine run, was whether the monastery should be at the site of the university. Traditionally schools run by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are on the same property as the monastery. But monasteries usually require a large piece of property so another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ould be the cost for the property.

In the letter of July 17, F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write:

All sources giving advice agree that ground should be purchased as soon as the erection of a university has been decided upon. The reason given is that within the near future the value of real estate in and outside of the city will take an upward tendency. Furthermore the fear is expressed that the cost of labor will likewise rise.

From all sides the Benedictines are being told to move quickly in this regard. From the letter of July 20 to Fr. Barry O'Toole,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St. Vincent Chapter still has not made any final decision regarding taking on a university in Peking, since Fr. Ildephonse mentions that Fr. O'Tool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roposal now before the Chapter regarding Peking. The immediate purchase of property, therefore, can not be considered. Fr. Ildephonse then continues:

Meanwhile [until Chapter decision] we two shall look about for a favorable spot where the institution might be located, without of course taking definite action. For two sites we shall scour the country, one in the city or its immediate neighborhood, one in the country, where more land could be purchased so we might possess the advantages and conveniences of a farm.

Traditionally American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also had large farms so it should not be surprising that Fathers Ildephonse and Placidus were also looking for a possible site outside of Peking. This comment suggests that Fr. Ildephonse was suggesting to have the monastery and university in the same place. Furthermore, aware that in the future he must work closely with Fr. O'Toole, in this letter, Fr. Ildephonse asks him for his opinions about a site.

Archabbot Aurelius's letter of August 15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with the Apostolic Delegate in selecting a site and also indicates it might be best to have the monastery at a separate place: "Be guided by the Delegate's selection of site, but consider for monastery advisability of building elsewhere." On September 17, the Archabbot advises to hold off on the selection of a site unless the Delegate insists.

The final decision regarding a site will be made during the visit of Archabbot Aurelius to Peking and in immediate consultation with the Archbishop, and it will be a place, not far from the Cathedral, for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monastery.

FINANCES

The purchase of a site raises the question of finances. The first mention of finances is near the conclusion of the letter of July 17, where it is said:

He [Archbishop Constantini] also stated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the erection of a monastery would have to be financed by ourselves. For the erection of a University he promised the necessary assistance from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From this statement it is clear that St. Vincent would have to pay the costs connected with the “erection” of a monastery. But it is not so clear as to who must cover the expenses for the site if the monastery and university are at the same place. “Necessary assistance” too is rather vague in describing what can be counted on from Rome.

Financing the new university was not the direct responsibility of Fr. Ildephonse, but rather that of Archabbot Aurelius, and the Archabbot devoted much time to thinking about possible financial arrangements. In his letter of August 15, he writes to Fr. Ildephonse: “If the Prop. of Faith will pay for the new University Bldg. may pay also ground [that is, Propaganda of the Faith may also pay for the property].” Therefore, at this time, Archabbot Aurelius was hoping for substantial support from Propaganda for the new university, but as subsequent events will reveal, Archabbot Aurelius soon found himself the main person responsible for raising funds for the creation and running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Archabbot must have well realized that the project was too large for the Benedictines alone to finance. Fr. Ildephonse’s letter of November 28 is the first one to mention the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 which,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d provided funding for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other national schools. By 1922, it began to seem “likely that some of the income [from the Boxer funds] would go to mission institutions” (Lutz 233). Archabbot Aurelius must have instructed Fr. Ildephonse to contact the Commission, for Fr. Ildephonse writes: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I wished to send our Christmas greetings but hoped to state to you the time of meeting of the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 since however information is lacking and may not be forthcoming for some time I must delay no longer . . .

Then in the letter of December to the Prior of St. Vincent, Fr. Ildephonse explains:

Am sending you some clippings from a Shanghai paper relative to the funds at the disposal of the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 As these lines state the conditions quite well I refrain from adding anything. Kindly give the one copy to Father Archabbot with our best wishes and greetings . . .

Archabbot Aurelius left no door unopened in seeking funds for the university. And that Fr. Ildephonse was determined to do all the Archabbot requested can be seen in the letter of November 28 when Fr. Ildephonse describes the fighting among warlords that prevents his returning to Peking from Kaifeng:

The country however will be full of bandits as the soldiers dismissed from the army of those especially of the removed generals and governors will swarm over the land. Even now report of brigandage are increasing alarmingly. (2)

But he adds:

Allthis [sic] should not indeed keep me from trying to reach Peking had we definite news regarding the meetings of the Boxer indemnity Committee.

Even robbers and brigands would not stop Fr. Ildephonse in his quest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university.

A final possible source of funding for the university that Fr. Ildephonse refers to in his letters is Dr. Ying.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he investigated this possibility on his own or at the request of Archabbot Aurelius. But what he writes in his letter of November 18 shows that there is little hope of getti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Dr. Ying:

From Mr. Ying we can not expect any financial support as he has little, which was shown at the death of his wife when Mr. Mu helped him with some money for funeral expenses, as a professor he might be of valuable help.

Accordingly, before the arrival of Archabbot Aurelius in Peking there were no clear prospects of any funding from within China for the new university and only the possibility that Rome might be of assistance.

ROLE OF THE CATHOLIC CHINESE LAYMEN

The 1924 letters of Fr. Ildephonse have a fair number of references to advice given by the Apostolic Delegate, the Bishop, Fr. Mullen and others. He does not, however, mention much about the opinions and advice of Dr. Ying and other Chinese laymen who had initiated the proposal for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In his letter of July 20, however, Fr. Ildephonse does mention to Fr. Barry O'Toole that Messrs. Mu and Ying were at the station to meet them upon their arrival in Peking. He further explains to Fr. O'Toole: "We have conferred with Messrs. Mu and Ying at various times [;] they have made arrangements for study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o morrow the teacher shall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letter of August 20 to Archabbot Aurelius, Fr. Ildephonse mentions visiting Mr. Mu for relaxation. But before receiving this letter, in his letter of September 17, Archabbot Aurelius urges Fr. Ildephonse to "[c]ultivate the friendship of Messrs. Mu and Ying, and other Chinese nationals." By October 18, when apparently he still had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from Fr. Ildephonse about Ying or Mu, Archabbot Aurelius expresses his displeasure: "You never say a word about meeting our true old friends, Dr. Ying or Dr. Mu. Do you really never meet them?"

In his letter of November 1, Fr. Ildephonse responds to Archabbot Aurelius' letter of September 17 and explains his relationship with Dr. Ying and other Chinese:

We are fostering the best we can and know the friendship of nationals with whom we became acquainted, but let me state right here that thus far I fail to see any concrete advantage that has spring from such a friendship. On the contrary had we from the very entrance into this land of superstition not been guided by the advice of these men, the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would be further advanced. Particulars when we meet, as it would require too much time to explain in full with a chance of misunderstanding. (1)

Unfortunately, Fr. Ildephonse was unable at this time to develop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who had urged the founding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or, it seems, even with Chinese in general. Ironically, he seemed to get along better with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in Peking who might not have been fully behind the idea of the Benedictines establishing a university.

Then in his letter of November 28, Fr. Ildephonse seems to respond indirectly to the Archabbot's question of October 18 as to whether he has contact with Dr. Ying and others:

To me however it would seem imprudent to have our telegrams come through Mr. Mu. May I state in all due reverence and submission that the one letter sent to us through him in the beginning was opened and fully read as subsequent events taught. Father O’Gorman, a good friend of Mr. Mu advised us repeatedly not to trust too much in him as he is a pagan and may readily bring us into difficulties or financial losses.

But Fr. Ildephonse offers no such strong criticism of Dr. Ying. Rather, he notes:

[Since Dr. Ying is] [l]iving close to the Peitang I took leave of him before setting out for Kaifeng.

Finally, Fr. Ildephonse and matters, two other passages from Fr. Ildephonse’s letters for 1924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deserve attention. In his letter of October 8 to the Sisters of St. Xavier, Fr. Ildephonse reveals he has been carefully studying how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should be run in China, for he describes how meals for Chinese students should be arranged:

. . . the unanimous advice from all competent authorities is to have the students take care of their meals. The college or university management would offer to the student body its kitchen and they will then hire their cook and either entrust him with the necessary buying of the foodstuffs or what is more frequently the case do the purchasing themselves through a committee appointed from their ranks. . . . Wherever college or university authorities have ventured to supply the meals strikes were the result. (1-2)

The second striking passage, also in this letter to the Sisters, shows that the avoidance of student strikes is of special concern in Fr. Ildephonse’s thinking about running a university in China:

The other day I visited a university near Tientsin, a fine Chinese gentleman, the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ion and an American professor showed us the premises. In the course of conversation I was informed that the former gentleman was newly installed in his office as his predecessor had to be removed because of the strike of the students.

In conclusion, before the arrival of Archabbot Aurelius in Peking in February of 1924,

Fr. Ildephonse was considering a variety of problems, many of which had no obvious solution, and none of which he could resolved until the arrival of the Archabbot. If the university came first, where would the Chinese students come from and how could Chinese Benedictine be trained? If a college (i.e., high school) came first, how could the wishes of the Holy See be fulfilled? If there were interested Chinese students, and this was no guarantee of this, what kind of background could be expected of them, especially if English was to be the language of institution? Where should the university and monastery be located and should they be together? From where would the funding come? And, lastly, how could the Benedictines cooperate with the Chinese Catholic laymen who suggested the need of this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place?

The immediate value of Fr. Ildephonse's letters of 1924 for setting up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is that they gave Archabbot Aurelius a careful and thoughtful evaluation of the existing situation and circumstances. Though Archabbot Aurelius might not always agree with what Fr. Ildephonse suggested, his letters served well to identify the basic problems the Benedictines were facing if they were to set up a university in Peking. Ultimately, Fr. Idlephonse dutifully carried out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Archabbot in his letter of October 18:

Listen much, remain passive until a decision reaches. We can't rush at conclusions that may lead to serious entanglements.

WORKS CITED

Levaux, Leopold. *Le Pere Lebbe: Apotre de la Chine moderne (1877-1940)*. Bruxelles and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P, 1971

Oetgen, Jerome. *Mission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Saint Vincent Archabbey, The Fir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 2000.

ⁱ The holdings of the Archives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re described in full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rchie R. Crouch, Steven Agoratus, Arthur Emerson, and Debra E. Soled (Sharpe,1989)

北平輔仁大學舊檔管窺(1925-1952)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習賢德

一、前言：九三四卷校史檔案保存現況

北平輔仁大學在中國大陸絕跡，已經將屆半世紀，若非近十年來兩岸校友會定期接觸，密切交流，目前妥善保存在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的「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校史檔案」，恐怕也無從被前任校長楊敦和偶然發現至寶，為增補本校早期建校史料，增添了空前的樂觀展望。

其後，為籌印一九九九年輔大建校七十周年校慶紀念專刊，校方指派師生代表五人，專程拜會北師大主管部門，並承北師大特准通融，協助重點影印部份校史檔案，供編輯校史時比對、考證運用。

或許是因為陳垣老校長在輔大併入北師大時，順理成章的轉任為北師大校長，且一直做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廿一日，以九一歲高齡去世為止；因此，有關輔大在北平廿八年的全部檔案，相當完好的被妥藏在密室卷宗裡。輔大擁有的這份福氣，對其它同樣在大陸建校，且保有舊校區的大學而言，恐怕就未必同樣這麼幸運了。

大體而言，老輔仁的校史檔案分成兩個階段：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前者共分成七類，包括：總類二十三卷、人事類六十九卷、教學教務類五四四卷、政治類六十五卷、總務財務類二十二卷、附校類二十八卷、年刊同學錄類三十七卷；合計七八八卷。後者分為五類，包括：總類二十七卷、人事類二十五卷、教學教務類六十三卷、總務財務類二十四卷、附校類七卷，共計一四六卷。兩批合計為九三四卷。

若非曾經親自逐卷翻閱，絕對難以想像輔大建校歷程，幾乎做到了一步一腳印的都被保留的地步，或許這是因為援庵老校長身為史學泰斗，講究考據的習慣，形成「上有好者」的良性連鎖效應亦未可知，在繁浩的帙卷中，還偶有驚喜

的發現，例如，「輔仁社」在北平西郊香山成立時對外發布的「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簡章」，一直完好如初的保存在卷宗內(請見附錄 1.)；又如曾任本校董事、來臺後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於民國卅六年元月(請見附錄 11.)洽請陳校長支持蔣夢麟競選立法委員的信函；又如于斌主教赴輔大演講，向師生公告周知的大海報，也原封不動的被收進了卷宗。(請見附錄 10.)再如校方啟用的鈐記、印文等，亦皆在卷檔中留下鴻影。(請見附錄 8.)

筆者為一九七五年夏，自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第一屆畢業之青壯輩校友，直到一九八八年元月初，才第一次有機會親眼目睹老輔仁舊址的風采，彼時已是暮色四合的時刻，自什剎海附近慢步接近剛問到的校址，然後，在四周瀰漫著刺鼻煤炭煙味中，興奮莫名的像一條倦游歸來、終於找到真正出生地的鮭魚，那般歡欣、跳躍而貪婪的立刻鑽進母校謐靜的長廊。其後又是十年，筆者才又在北京師大發掘了母校珍貴校史檔案，這該是每位「輔大人」認祖歸宗的神聖家譜啊！

北平輔大雖然只在故都存續不及三十載，但因建校未久即適逢抗戰軍興，輔大獨力在北平與敵周旋，以血淚寫下可歌可泣的愛國抗敵佳話；二次大戰結束，國土重光匆匆三年，再次遭逢中原板蕩的劇變，眾多師生之間，容或曾有政治上相互歧異的抉擇，但亦皆如逝水東流，俱往矣。

對天主教而言，輔仁在中華大地的建立，畢竟先領受了來自梵蒂岡教廷的祝福，其次，美國賓州本篤會聖文森總會院總院長司泰萊率先挹注了可觀的開辦資金，直到他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二日病逝為止；輔大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主樓，即係本篤會斥資興建的。(請見附錄 2.3.4.)

為持續推動輔大建校發展，教廷復指派德國聖言會取代本篤會角色。一九三七年輔大以五十萬元買下了恭王府，校園種種規劃，至此乃初見規模；恭王府原係和坤故居，其內亭臺樓閣俱全，自鳥瞰平面圖查考建物分布，即可略窺堂奧，園中一處「流杯亭」更是傳統墨客騷人玩賞曲水流觴古制的風雅據點。(請見附錄 5.6.)

有關輔大神職人員的角色，檔案中德國聖言會雷冕神父(Rev. Father Rudolph Rahmann)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填寫的資料如下：聖言會(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開辦於一八七五年(民國紀元前卅七年)，經費及基金來源：由美、德、意、法、英等國捐募而來；佈道方法：辦理學校；牧師：外國人男性二十名、華人一名；信徒國別：英國五人、荷蘭一人、德國十四人、華人一人。(請見附錄 7.)

輔大校史這九三四卷檔案，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當代值得保留、並應再深入研究的教育史料。

二、恭王府傳奇：輔仁社孕育的故都名校

北平輔仁大學的締建，在中國大學教育史上雖不如北京大學，能自京師大學堂設立起即幾乎搶盡百年風騷，但是，正由於輔大有別於國立大學的辦學宗旨和特色，與歐美天主教會保持母子臍帶般關係的深厚淵源，而自始扮演了一種傳播真、善、美、聖，與促進中西文化匯通的教育精神，大量的外籍學者投入教學研究，讓師生互動極易建立一種寬宏而超然的視野；眾多各個領域的飽學宿儒，皆以循循善誘的方式，負責調教輔大學子最基本的學識，為學海初航的晚輩小生，補強待人處事的認知基礎。

曾自一九二八年起擔任輔大講師的臺靜農自承：「若按照現在大學教員任用條例，不經審查，沒有教學資歷，或者學位等等，絕不可能登上大學講臺的。可是六、七十年前舊北京文化背景，自有它的特異處，那裡有許多人，靠著微薄的薪俸以維持其生活，而將治學研究作為生命的寄託，理亂不聞，自得其樂，一旦被羅致到大學來，皆能有所貢獻。」他還指出：「這一新興的大學，主要教授多未向其它大學物色，而是從大學範圍以外羅致來的。因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結知的學人多，一旦有機會，也就他們推薦出來。」¹

對不曾造訪北平故都者，可能無法想像七十五年前輔仁校景風華，此處謹以一九四二年畢業於輔大西語系，二〇〇一年六月底不幸病逝美國加州的名作家張秀亞筆下的追憶，讓老輔仁的部份風采重現：

「我的母校——輔仁大學女院。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將之比擬為海洋，而我思慕它的心靈，宛如水的涓滴，時時刻刻歸向海洋！那校舍原是遜清恭親王府的府邸，朱紅的門、柱、琉璃瓦的屋頂，顯得如此的華貴莊嚴。當我那年於初秋放榜後，第一次踏進校門時，為那肅穆的氣象震懾住了——一道石階，又是一道石階，一座院宇，又一座院宇。那在風中飄拂的垂楊，織出了一片似煙似霧的翠帷，呵，我以一步踏入宋人的詞意中了：『庭院深深深幾許！』說不出的幽深，說不出的幽麗！

¹ 參見臺靜農〈輔仁舊事〉，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八期，1986年12月，頁15、17。

「我的母校輔仁，當年有如聖經中諾亞的方舟，載著一些好學、愛國的青年人與學者們，在時光之流中向前航行。使他們(她們)在狂風暴雨之中，有一個安全的庇護所，在這個巨大、華美的方舟之中，有戰士也有隱士，儘管他們生活的態度不同，但他們對真理、對國家熱愛的心理，則是一致的。離開古城已好多年了，……我也曾在復校後的輔仁教了十四年，……但我仍然忘不了昔日的母校。這幾天患重感冒，每天昏昏沉沉睡著，常常在睡夢中來到了古城母校的舊址，滿院的珍珠梅在地上洒了一地銀色的霜霰；黃葉在西風中瑟瑟作響；熟透的白果和核桃落了滿地，那般清香彷彿帶著濃濃的澀苦，瀰漫在空中，……醒來夕陽半窗，不勝惆悵！我只有拿起一本昔日的校刊，翻著那些發黃的篇頁上，我寫的那些零星的詩句，將自己又嵌在過去的學校生活中……。」²

凡是親自在這些如詩般情境中學習、生活、成長過，乃至只曾經步、屏息、凝神、低迴踏勘過老輔仁校區中的恭王府、天香庭院等古建物的人們，重讀秀亞女士遺作中的洗練佳句，一定會宛如重臨實境、幽遠之思再起；甚至不知不覺間，會掛上兩串潸然而下、感觸至深的清淚。

與陳老校長淵源深厚的劉迺蘇一九八五年為祝賀北京輔仁校友會成立曾賦有小詩，簡要記述輔仁一院：定阜大街主樓原址為前清濤貝勒府南院菜圃用地，此一主樓已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廿四日起，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至於二院則指原恭王府內之建物與庭臺樓閣，其短詩一為：「濤府昔年後圃園，玲瓏碧瓦起華軒。百千學子勤埋首，文物今朝重點看。」其二為：「天香庭院綠蔭繁，舊日王府兩助軒。以友輔仁文會友，傳說原是大觀園。」³ 有關恭王府是否就是章回小說《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專家學者已有考證，蓋曹雪芹死於乾隆廿九年(西元一七六四年)，他生前寫紅樓，是不可能以尚未出現的恭王府做為大觀園的藍本的；但園中保存完善的王府建築規制，無不令人嘆為觀止，另包括一座「流杯亭」，這是全中國僅存三處「曲水流觴亭」中的一座，確是難得一見的寶品。

如今各方湧入王府觀賞的遊客，幾乎都未被告知，如此精緻的園木勝地，竟

² 參見張秀亞〈母校常在我夢中〉，載於《輔仁友通訊》第四期，1986年1月，頁30~31。張氏另有一文論及此景，讀者可自行參考〈綠竹庭院可是瀟湘〉刊載於《白鴿·紫丁花》，臺北，九歌出版社，民國76年7月，頁180~186。

³ 參見迺蘇：〈祝賀輔仁校友會成立兼題輔仁一院、二院校址〉，載於《輔仁校友通訊》創刊號，1984年9月，頁7。

然是北平唯一的大學美術系和家政系，共享的教學及系務行政所在的骨董級豪華系館。

備受乾隆、嘉慶兩代皇帝寵信的權臣和珅，在北京共有三處住宅，第一個舊居在北京西直門內驢肉胡同，第二個和宅，便是在什剎海畔三座橋附近，是仿照乾隆打算自己退位當太上皇時才住的「寧壽宮」式樣和內部裝修，並按圓明園蓬島瓊臺之奢華能事所營建而成；因此，《清稗類鈔》、《舊京閒話》、《燕京貞明錄》等書才會將和氏豪宅聯想為就是《石頭記》榮國府裡的大觀園。

總的來說，恭王府只有三十景，比不上大觀園的四十景，但奕訢父子為園景題詞作序之取名，卻多仿自大觀園，兩者易為後人混淆，乃不足為奇矣。

第三處則和宅則係別墅，位於現今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取名「淑春園」。

和珅宅第的面積，要比現存之恭王府大些，原本西界至三轉橋，東界到甑子房胡同，北界至大翔鳳胡同，南界至今前海西街南側。全部範圍大致可分為左、中、右三路。

中路建築取和氏室名「嘉樂堂」，大門、二門、正殿後至今仍掛著這三字的匾額。右路的最後一個院落，有一精緻的垂花門，掛著慎郡王允禧所題寫的「天香庭院」匾額。正房是「錫香齋」原五間建築，「天香庭院」前的一座院落是和珅夾壁藏金的地方；正屋也是五間建築，名「葆光室」。

左路格局大體與右路相似，只是不如右路考究精細。在三路建物的最後，自西而東，還有一座四十多間、長約一五十米的二層後樓取名「壽椿樓」，樓後亦有後花園，亦分三路，和氏之妻即曾住此處。

中路入口處為一西洋式大門，今遊客均由此入園。迎面即為以太湖石搭疊成的假山、大水池和蝠形大廳。東路可見「流杯亭」，往後是一較大院落和寬敞的戲樓。西路是一個大水池，池中有島，島上建築名為「觀魚臺」。北面是一長小土山，山上有仿長城箭樓等建物，並有一名為「榆關」的城門。以上建物或係後來添建，但建物布局應仍以和氏居住時期為基礎則無疑。

和珅宅第後經數次輾轉，至咸豐年間轉為恭親王奕訢所有；光緒末年奕訢去世，恭王府乃由其子孫溥偉繼承，直至抗戰初期都由溥偉居住；一九三七年由於

經濟拮据，才把王府賣給輔仁大學。⁴

名作家彭歌對母校亦有一段溫馨的回憶：「從校門出來，過一條小橋，即恭王府，也就是我們的宿舍。……恭王府有一條街那麼長，南半邊是是輔大女生宿舍，……輔仁的校規比賈府還要嚴，我們從來沒有從那邊走動過。北邊的一半就是我們的區域。……恭王府占地三十畝，亭臺樓閣、湖池山石，應有盡有；幾百個學生能住在裡面，還有很大的自修室，地方當然不小。王府後面有一座土山，傍山而立有一間小閣，據說那是當年恭親王與他的智囊心腹們商量軍國大事的密室。我常常一清早來到那個小閣頂上去唸書。……北平冬日奇寒，清晨起來毛巾常凍成一條冰。我們的舍監林思廉神父十分重視空氣新鮮，夜晚巡查，要把窗子打開，有時一醒來被面上一層雪花。年級愈高，房間愈小，就可以在裡邊做一些不合規定的事情。拉胡琴、下棋，弄個小爐子炖肉下麵條，在火旁烤冰凍柿子，都是賈寶玉沒有享受過的樂趣。學生們的宿舍就像兵營一樣，任你戒律千條，我們總有自得其樂之道。如果恭王府是大觀園，那麼我在大觀園的日子不比賈寶玉少。但我至今還是不願相信，因為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要美得，也大得多；單是瀟湘館的翠竹森森，龍吟細細，就是景所無，何況那裡邊應該有位林黛玉。」⁵

三、以援庵史學精神奠基的學術堡壘

盧溝橋事變至珍珠港事變的四年間，輔大得以屹立於故都，弦歌不輟，賡續維持運作，一方面託庇於德、日兩國，本係軸心結盟之特殊國際形勢，一方面亦因校內的確有大量的國際人士擔任教職，敵偽當局准許輔大照常教學作息，實有助於維持其開明形象，絕非日人獨厚於天主教會之故。

根據校史檔案所載，民國卅一年度(珍珠港事變後)輔大日本籍及其它外籍教員多達五十四人，其國籍及全部名單如下：⁶

雷冕(德國，教授，校務長兼社會系主任)、豐浮露(德國，教授兼教務長)、嚴池(德國，教授兼理學院院長)、細井次郎(日本，教授、教務長、首席秘書、日文系主任)、渡邊善次(日本，副教授)、酒井梯(日本，講師)、川添達人(日本，教員)、美惠子(日本，女，教員)、真江廣治(日本，講師)、上田辰之助(日本，講師)、

⁴ 參見張行兮《貪汙之王：和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6月，頁186~191。

⁵ 參見彭歌〈我亦大觀園中客〉，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十五期，1993年6月，頁7~8。

⁶ 參見私立輔仁大學日籍及其他外籍教員一覽表(民國31年度)。

李士嘉(德國，教授兼教學組長)、歐思德(德國，教授兼物理組組長)、艾克(德國，教授)、安琪樂(德國，女，教授)、包敏(德國，教授)、葉德禮(德國，教授)、盧德思(德國，女，教授)、吳秉維(德國，女，教授)、吳保黎(德國，教授)、卜樂天(德國，教授)、郝岑(德國，教授)、馬德武(德國，教授)、裴德(德國，女，教授)、葛爾慈(德國，教授)、宋德剛(德國，名譽教授)、魏方濟(德國，教授)、葛永綏(德國，女，副教授)、傅潤琪(德國，副教授)、富施公(德國，講師)、韓克曼(德國，講師)、賀慕蘭(德國，女，講師)、郝德嘉(德國，女，講師)、羅度華(德國，講師)、白立鼎(德國，導師)、鮑伯(德國，教員)、蔡思容(德國，講師)、狄珂(德國，講師)、楊寧(德國，講師)、文納(德國，講師)、蔣達士(意國，教授)、黎白(美國，女，教授)、桑德厚(美國，教授)、梅猗娜(美國，女，教授)、費知本(美國，教授)、寇熙(美國，副教授)、何豐富(美國，副教授)、關維廉(美國，講師)、高美潔(美國，女，講師)、孟敦尼(美國，講師)、殷慕達(美國，女，教員)、卜美璐(美國，女，講師)、施美思(美國，教員)、胡魯士(荷蘭，教授)、施濤客(荷蘭，副教授)。

由上述名單可見，彼時輔大外籍教師實際掌權者均為日、德兩國人士，日本籍有七位、德國籍有三十二位、美籍有十二位、荷蘭籍有二位、意國籍有一位。校史檔中，亦保留了十分珍貴的細井次郎請辭函：細井自稱「小生」，請辭時之職銜為：教授兼日文學系主任、校務長首席秘書；校方收文日期是民國卅四年八月廿九日。(請見附錄 9.)

由於日人掌握了華北軍政大權，彼時來華年輕日人中，亦有至輔大旁聽者，例如，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時曾有名為小川平四郎的旁聽生至歷史系學習；一九七三年三月，小川平四郎成了日本派駐北京的第一任大使，一九八八年曾特別專程赴北京參加輔大六十周年校慶活動。

小川回憶在校生活時，還記得陳垣校長親自為他上過漢詩課，雖知他只是日籍旁聽生，但仍舊按一般生標準要求他試做漢詩，教學認真嚴格的態度，令他印象十分深刻。⁷

儘管淪陷區形勢險惡，但彼時陳垣校長仍為歷屆畢業年刊題詞，傳輸知識份子無論身處何種世代，均應保有的氣節。例如：

一九三八年題贈予畢業同學的勉詞是：「毋事浮囂失禮于人，毋徒顧目前，

⁷ 參見校友會辦公室：〈海內外校友歡聚一堂〉，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 10 期，1988 年 10 月，頁 1~2。

毋見利忘義，永保汝令名。」

一九四〇年題詞為：「子張向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一九四一年陳校長寫道：「品行第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身體第二(父母唯其疾之憂)，學問第三(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一九四三年題詞：「毋徒事佚游宴樂，是之謂輔仁。」

最令史學界欽服的，是陳校長竟能在日寇占領北平時，屏氣凝神完成一本《通鑑胡注表微》，按其一九五七年重印後記的自述，他執筆時「正當敵人統治著北平，同胞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歎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因此決心對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麼注通鑑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時間寫成《通鑑胡注表微》二十篇。」⁸

最膾炙人口的是民國卅一年四月，輔大舉行校友返校節運動會時，他引用《禮記·射義》中的話說：古代的運動會有三種人不能參加：「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令在場漢奸及不忠之輩十分難堪，亦同時藉此表達了他對逃跑將軍的極度蔑視。⁹

對日抗戰期間，輔仁不但成為各校師生的庇護所，還成為宣揚抗日精神的重鎮「華北文化教育協會」，很可惜的是，有關「華北文協」的檔案在抗戰勝利後竟已遍尋不得，令人扼腕之至。

根據葛信益的追述，該協會前身為成立於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不久，旨在發揚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不屈服於異族精神的「炎社」。彼時華北陷敵，民族危亡，輔仁師生雖不能上前線抗敵，但投入不與日人合作宣傳者頗多，並積極支援宋哲元部隊的抗日需求。至一九三九年春「炎社」事蹟為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得悉，便建議擴大改組，多多團結群眾，使輔仁成為抗日愛國基地。當年夏即改組為「華北文協」。

⁸ 參見王明澤：〈陳垣事蹟著作編年〉，收錄於：《紀念陳垣校長誕生一一〇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10月，頁508。

⁹ 同前註，頁504。

文協設委員會，由輔大師長沈兼士任主任委員，委員有張懷、董洗凡、英千里、徐待峰等，委員下設總幹事：郝德元、常惠、葛信益，幹事有葉德祿、孫碩、孫金銘等人，一二年內會員發展到好幾百人，並在開封、濟南太原等地設了分會，會員中輔仁校友佔大多數。

文協當時主要活動包括：一、宣傳抗日愛國，不與日本人合作，宣傳青年學生要忠誠愛國，教師要言傳身教，為人師表；二、遣送願意做抗戰日工作的輔仁助教及青年學生去後方，先後遣送過兩批；三、編輯出版《辛巳文錄》初集、續集，撰稿者三十餘人，都是當時忠貞愛國，學有成就的人士。此外，有些會員協助輔仁國民黨區黨部辦《時事簡報》，其中內容便包括由專人在夜裡偷聽到的重慶廣播電臺重要新聞記錄下來，交給專人刻成腊版，油印後秘密傳閱。此舉今日寇恨之入骨，四出偵察，非破獲不可。

一九四四年三月初至廿日，「華北文協」負責人及會員先後幾乎全部被捕，其中以廿日清晨三、四點鐘被捕的輔仁同仁最多，按目前唯一健在的文協委員牛繼昌的說法：當時輔大幾乎塌了半邊天，各學系不少課程無人講課，這就是轟動華北的對北平文教界的大逮捕案。僅北平一地即逮捕教員學生三百餘人，經審訊後同年六月大部份釋放其中被認定情節嚴重者二十六人。

葛信益便是遭敵偽特務跳牆破門而入，翻箱倒櫃，遍室搜查，再戴上手銬納入大卡車載走的。日本憲兵隊關押人犯的木房可容二至三人，棍棒打、皮鞭抽是常事，灌涼水則是一大災難，有時還用電刑摧殘中國人；拘留審訊了三個月後，有人被釋放了，有的被移到北新橋北炮局胡同原陸軍監獄。輔仁師長被判重刑者包括：英千里、董洗凡、張懷、英純良等十五年；趙光賢等十二年，左宗綸、湯有恩等四個月，每個人一入監便釘上一副腳鐐，有的重達七斤，睡覺時一轉身又冰涼、又硌腿。坐牢者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前一個月才獲保釋出獄。¹⁰

對日抗戰八年，輔仁在北平的奮鬥抗敵，終獲贏得國民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褒揚，中央鑒於本校八年艱苦支撐，維繫教育，對黨對國，均有貢獻，頗著勛勞，除明文嘉獎外，特准在淪陷期間，就讀輔仁大學及中國大學之學生學籍，一律予以承認。教育部復以司鐸書院師生忠藎可欽，特許併入輔大，各教士經甄試後均

¹⁰ 參見葛信益〈記華北文化教育協會〉，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四期，1986年1月，頁36-37。另見孫金銘〈華北文協委員牛繼昌〉，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20期，1998年8月，頁77。

承認其學籍。¹¹

依據國民政府民國卅五年五月頒發之〈褒揚抗戰忠烈條例〉，輔大呈送北平特別市黨部的受難教職員三十六人名冊如下：英千里(教授兼秘書長、西語系主任)、董洗凡(教授兼代文學院院長)、張 懷(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徐淦泉(教授兼代教育學院院長)、胡魯士(荷蘭籍，教授兼教務長)、伏開鵬(教授兼訓育課主任)、趙錫禹(教授)、陸懷寶(副教授)、趙衛邦(研究所)、喬明順(講師)、李桓(講師)、李諶(講師)、左宗綸(講師)、高嬰齊(講師)、趙光賢(講師)、莫純良(講師)、葉德祿(講師)、葛信益(講師)、祝福祥(講師)、歐陽湘(講師)、牛繼昌(講師)、左明徹(講師)、孫碩人(助教)、朱瑾章(女，助教)、鄭國柱(助教)、劉福洲(助教)、王文光(助教)、劉不凡(中學主任)、李鳳樓(體育教育)、李寶勳(訓育課長)、丁德勛(中學教員)、楊汝梅(中學教員)、仇金閣(中學教員)、孫金銘(學生)、秦 晉(學生)、吳師循(學生)。¹²如此長串遭敵偽拘捕迫害的名單，竟然就集中在一所私立大學裡，輔大教職員生愛國情操之高昂，無畏強梁侵逼之勇氣，在抗戰期間可謂各方表率。

輔大的國際色彩，提供了在學生頗多的自由空間和便利。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在輔大渡過四年的張禮回憶：「大學學習，一切都新鮮的，最使我滿意的是不必學日文，不必穿日本式大學生制服、戴四角方帽，不必聽日本人和偽官吏的訓話。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六年，一部份物理系學生組織了『物理樂園』，主要負責人是劉肇烈，這個組織雖然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不滿，可以在這裡談不滿的話，可以交流聽來的各種消息，日偽當然不許學生結社，我們的活動是秘密的。樂園還有一些學術活動，大家自己找有興趣的問題，……當時學校的教學鼓勵學生自己獨立學習，加上樂園的活動，使我在平時，特別是在假期中看了許多書，對鍛鍊自學能力，思考問題有很大好處。」¹³

其實學生們享有的自由和尊嚴，卻是陳校長用高度的正氣換來的。一九三八年五月當徐州陷落時，敵偽政府通令北平機關、學校都應掛國旗以示慶祝；當時輔大和輔仁附中都不掛旗，敵偽政府強令停課三天，並多次質問陳校長，他答說：「自己國土之喪失，只感到悲痛，要我們慶祝，辦不到！」敵人也曾多次用厚利

¹¹ 參見英千里〈私立輔仁大學〉，刊於《中華民國大學誌》(二)，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43年12月，頁370-371。

¹² 參見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校稿：〈校長陳垣函請北平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予本校教授董洗凡等三十六人證明文件以便呈部請褒揚〉，民國35年5月15日。

¹³ 參見張禮〈一些自傳性的資料〉，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三期，1985年9月，頁16。

請他出來做事，請他出任「東亞文化協議會」副會長，亦同樣遭到峻拒。八年之間，不掛日旗、不向日旗行禮、不用日文課本，單憑大無畏的精神，為師生們解決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難。¹⁴

正因為輔仁保住了民族正氣，所以很多青年基於愛國思想，不甘於去日偽控制的大學，又一時不能離開淪陷區，便紛紛投考輔大，即使連續落榜也要進輔大；日偽控制的學校不收費，輔仁學費明明較高，但就是做小生意、打零工湊學費也要入學。更重要的是，許多名校名師為此轉入輔仁者頗多，例如：張子高、袁翰青、曾昭倫、薩本鐵、薩本棟、李霽野、褚聖麟、徐獻瑜等，使得輔大更具號召力。

輔仁學生對外籍師長雖然十分尊敬，但一旦有人傷害了大家的自尊，還是十分勇敢的要求校方處理。根據王惠媛校友的回憶：「生物系三年級上有機化學時，德籍教授郝爾岑提問同學：鯊魚是雙子葉植物，還是單子葉植物，同學認為是侮辱，堅決不許他教下一級即將開始的有機化學課，於是去找系主任張漢民，同學們自己去請了北大進步教授袁翰青，從那年開始到畢業班的生物化學，就是本國教授劉恩職講授了。這件事說明輔仁雖是教會學校，但輔仁的學生都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對洋人是沒有奴顏媚骨的。」¹⁵

如果遇到自己人教得不符水準，輔大同學還是會基於受教權益，大膽的直接向校長反映意見，要求換人。

例如民國廿二年八月數學系學生劉漢民上書校長，請求改進該系結構，缺點包括：一、數學系缺乏教授；二、無負責人；三、課程標準過低有礙學生將來高深研究；四、課外功課乏指導教授；五、少數教授無責任心，如梁夢星先生雖學識宏博，學生得益甚淺；六、一星期鐘點過少，亦有礙學生上進。¹⁶

同年九月，物理系三年級全班再度集體上書校長，要求撤換教師梁夢星，理由是：「先生講授模糊，語音低漫，久為同學所苦，茲者受課已歷一周，聽講極感痛楚，雖復屏氣壹思，猶不能得解。伏維立雪以來，星霜兩易，朝唯夕誦，所獲殊稀，今值國且危亡，求知益急，梁師所課，尤屬重端，若即長此苟安，遺誤易淺，無已理合，呈請 鈞鑒，擬懇另易碩德，重聘聞師，以勵勤風，而維學業，

¹⁴ 參見劉迺蘇「陳援庵老師的教學、治學和及其他」，載於《紀念陳垣校長誕生 110 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年 10 月，頁 226。

¹⁵ 參見王惠媛〈我們民族自尊心〉，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四期，1986 年 1 月，頁 35。

¹⁶ 參見北平輔大檔案〈學生劉漢民條陳數學系改良各點乞採納呈文〉，民國 22 年 8 月 24 日。

不勝惶恐待命之至，仰祈查核訓示施行。」¹⁷簽名學生共有龐定浩等十二人，其中包括後來出任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院長的金祖年教授。

由此校檔案可以想見，陳校長要順利解決這些學生趕人風波，恐亦非易如反掌。其實，抗戰初期與大陸變色末期，輔大師生與中共地下黨間互動十分頻繁，校史政治類檔卷中，亦不乏陳老校長親冒鋒鏑，屢次營救被拘捕師生的事例，值得剖析，有興趣者可深入探討。

近半世紀以書家名世的老輔仁師長啟功，曾在其所著《啟功學藝錄》一書回憶老校長以自身表率與談言微中的方式，誘導後學的用心時寫道：「我們這些教國文的教員，當然絕大多數是陳老師的學生或後輩，他經常要我們去見他，……見面後並不考查讀什麼書，寫什麼文等等，總是在閒談中抓住一兩個小問題進行指點，指點的往往是因小見大，總有新鮮收穫，發現自己的不足。……我很不用功，看書少，筆懶，發現不了問題，老師在談話中遇到某些問題，也不盡關史學方面的，總是細緻地指出，……如果我們不問，並不往下說，……最可悔恨的是請教過的比放過的少得多！陳老師的客廳、書房及住室內，總掛些名人字畫，……我們去了，老師常指著某件字畫問：『這個人你知道嗎？』如果知道，並且還說出一些有關的問題，老師必大為高興，連帶引出關於這位學者套他的學問、著述種種評價和介紹。……老師常說，一篇論文或專著，做完了不要忙著發表。好比剛蒸出的饅頭，須要把熱氣放完了，才能去吃；蒸的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還常說，作品要給三類人看：一是水平高於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為這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¹⁸

以陳老這般地位的學界泰斗，對於一般程度的學生又是如何的態度呢？據一九三八年歷史系畢業的程華回憶：「我的畢業論文，就是陳先生指導的。照說陳先生的學術地位，在國際上是知名的，他又要接待國外的來訪學者，又要寫作，又要處理校務，還要上課，哪有功夫給我這初出茅蘆的人指導寫論文呢。可是陳先生甚至把我那論文上的每一個錯字也都改過。為了寫那篇畢業論文，我曾經三易其稿，陳先生每次都仔細改過，不放過任何細節。」¹⁹

一九四九年北平即將易手前夕，陳老並未接受國府安排搭機飛來臺北，相反

¹⁷ 參見北平輔大檔案〈物理系三年級學生龐定浩等請更換微分方程式高等微積分理論力學教授〉，民國22年9月30日。

¹⁸ 參見啟功《啟功學藝錄》，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1月，頁2-5。

¹⁹ 參見程華〈母校綦懷：寒窗夢憶〉，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九期，1987年10月，頁23。

的，他選擇了與最親信的愛徒柴德禮、劉迺蘇一同步行到西直門大街，站在馬路旁迎接解放軍入城。無論臺北方面包括胡適老友如何批判，陳老顯然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擇。如今陳老骨灰安厝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室，與中共中央元老級人物的骨灰共置一室，筆者兩年前由北京校友會張延祜學長介紹，有幸追隨陳老孫輩家屬一同前往祭拜，並繳納保管費；經家屬同意，由筆者保留了一張於一九九四年繳了一百三十一人民幣骨灰室管理費的收據，以為永久紀念。(請參見附錄 12.) 精通歷史考據的陳老如果仍然健在，相信必定對兩岸關係的消長，感喟良深。²⁰

北平輔大建校初期，令中外學界刮目相看的紀錄，還包括發行高水準的學術期刊，《華裔學誌》即為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

《華裔學誌》是年由輔大創刊的一份用外文出版的漢學雜誌，最早的主編是研究屈原文學著作而獲萊比錫大學漢學博士的聖言會德籍神父鮑潤生(Franz Xaver Biallas, 一八七三-一九三六)；一九三三年他來華主管校務工作，一面任教於社會系，一面積極展開漢學研究，彼時北平是歐洲研究漢學的黃金之地，尤其以輔大文科人才濟濟，中西學術文流活躍，鮑氏遂將原英文版輔大校刊(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停辦，改辦學術刊 Monumenta Serica(意為絲域的史跡)，專載漢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登一般性文章，此刊物中文名字由陳垣校長選定，華裔二字非如現今所指海外中國人的後代，裔字係指遠方的人民；《華裔學誌》就是中國人與遠方人民間文化關係的學術研究刊物，一年後鮑氏染斑疹傷寒不幸逝世，乃由德籍神父雷冕(Rudolf Rahmann SVD)繼任主編。其後又有著名漢學家福克斯(Walter Fuchs)、衛德明(Helmut Wilhelm)參加編務；中國學者陳垣、沈兼士、張星烺、英千里等均參與其事，至一九四八年底《華裔學誌》共出刊十三卷，每卷約六五〇頁，刊載中外論文一〇四篇、短文一〇二篇、書評一九三篇；於內容深湛、系統性強，此一刊物乃成全球漢學研究的珍貴財富。一九四九年後《華裔學誌》遷往日本東京、名古屋繼續發行；一九六三年再移往美國加州洛杉磯加大分校；一九七二年再遷往西德北部聖言會所辦的人類學研究所。²¹

²⁰ 參見劉迺蘇「陳援庵老師的教學、治學和及其他」，載於《紀念陳垣校長誕生 110 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年 10 月，頁 231。

²¹ 參見張至善〈《華裔學誌》慶祝刊五十周年〉，載於《輔仁大學校友通訊》第七期，1986 年 9 月，頁 2。

四、傑出校友人才輩出：由王光英兄妹談起

北平輔大自一九三一年開始有畢業生，首屆只有十一人畢業，至一九五二年被併入北師大前，共有大學部畢業生四千七百五十六人。另自一九四〇年開始有碩士二人取得學位，除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兩年無畢業生，歷來共有七十二人完成碩士學位。總計輔仁大學在臺灣省新莊市復校之前，共有四千八百二十八人在大陸時期畢業，先後投入各行各業，成為建設國家、報效社會的棟材。

北平輔大校友之傑出，絕非本篇短文所能交代整的一般人以為，陳垣校長是史學家，校友亦應以文史見長者居多。其實，在德國教授和美國教授的細心指導下，老輔仁在理工科和心理學方面，同樣領先群倫，口碑卓著。即以物理系為例，在文革之前的清華、北大、北師大、北醫、北工、北師院、天大、山大、南開、南工等院校中之物理系科的主任，教研室的主任都是輔仁校友，顯示彼時輔大的確在師資和設備條件上，都較它校為佳的事實。²²

如果恭王府是輔大校景的招牌，化學系畢業的王光英與取得物理系碩士的王光美兄妹二人，便是輔大校友中的王牌，因為一家兄妹一個其後成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一位則成了事業有成，鼎鼎大名的「紅色資本家」，現在還擔任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要職。年光英與仍在學的教育系學妹應伊利結婚，由於新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婚禮便教堂舉行。²³

光英和光美二人都在畢業後，被留下當過一個時期的助教；光美功課尤其突出。茲以民國卅一年九月十二日校方發布學業優良學生名單的公告上，光美學姐之大名赫然在目，且其受獎成績平均高達八九.二分，在全部受獎之女生中，僅次於一位經濟系梁姓學生。(請見附錄 13.14.)

北平輔大校友成就較傑出者，常是其它學校或相關領域不及培養的幹才，或其它部門根本無力取而代之的特殊人才。例如大儒朱熹的第二十五代孫朱家潛學長，至今仍是北平故宮倚重至今的超級研究員，是中共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裡擔任門類最多的一位；²⁴ 又如自一九四七年便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的史樹青，至今還會經常緊急受命趕往外地的古物發掘現場，故有「鑒定國寶的國寶」之美稱。²⁵

²² 此為筆者年夏拜訪北京輔大校友會，與周國正、祝錦泉、朱家潛、史樹青等學長深談時所得。

²³ 參見徐乃乾〈王光英在北平輔仁大學〉，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廿一期，1999年8月，頁109。

²⁴ 參見葛愛平訪朱家潛研究員，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十三期，1991年10月，頁49-52。

²⁵ 參見孫瑛鑒定鑒定國寶的國寶，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十四期，1992年9月，頁48-51。

此外，還有若干人雖僅在輔大肄業數年，但其後功成名就，逢人亦以曾經是輔仁學生為榮，例如，第一位採訪歐洲二戰戰場的名記者蕭乾，又如被尊為「中國交響樂之父」的李德倫，雖然都是輔園過客，但他們的成就同樣受到廣大輔仁師友們肯定、推崇。

二〇〇一年九月，臺北輔大校長李寧遠特別致贈「輔仁榮譽教授證書」給李德倫教授，由其女兒代表接受，即為海峽兩岸共同肯定李氏不凡成就的具體行動。²⁶

一九九九年臺北輔大慶祝建校七〇周年時，亦曾頒贈傑出校友獎給來臺參與盛會的王振稼、張延祐兩位北平輔大的老學長，以感謝他們多年來促進兩岸校友交流，所付出的辛勞和卓越貢獻。

五、結論：復校與兩岸合作的展望

輔仁大學臺灣校友會自一九五六年起開始成立運作，其最大功能與成就便是奇蹟似的促成了輔大在臺復校。輔大在前校長李振英任內，即有師生不斷往訪母校舊址，並多次面邀北京輔大校友會王光美會長訪問臺北；楊敦和校長任內參加北京方面的例行校慶活動時，亦曾面邀王學姐訪臺，(請見附錄 15.)但均因光美學姐近年身體違和，仍須仔細調養而未能成行，至為遺憾。²⁷

目前兩岸均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無論自何角度觀察，兩岸學歷相互採認、相關學程的互補，以及師生的教學交流互訪，均有極為可觀的拓展空間。

曾走訪北京舊校址者都會有一奇想，就是：如果輔大能在北京復校，那該多好！當然，全面復校阻力太大，此一想像狀況實現的可能性尚低；唯若將來臺北輔大能解決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安排全體新生一律在北京上課學習，大二之後才回臺北，那麼，輔大的招生動員能力一定有機會勇冠全臺！相對的，如果北京師大在遠距教學和尖端科技方面，能與我校合作互惠，那麼兩校極有可能在既有的互信基礎上，開出更新且廣的坦途。而北京師大代管了近半世紀的輔大校史檔

²⁶ 有關李德倫的成就介紹，請參見周國正〈分享中國交響樂之父：李德倫學長的榮譽〉，載於《輔仁校友通訊》第二十三期，2001年8月，頁139-144。

²⁷ 向王光美學姐請安是近年臺北輔大校友赴北京時的重要行程和禮儀。附錄十五.照片中主要人物，前排正中坐者為光美學姐、其左為輔大楊敦和校長、後排右一站立、著深色西服者為輔大現任長李寧遠。

案，正可為此新世紀的脈動，立下不朽的見證。

參考書目

(一) 文獻檔案

北平輔仁大學校史檔案(1925-1952)：總計 934 卷

☆1925 年至 1948 年：788 卷

包括七類：總類 23 卷、人事類 69 卷、教學教務類 544 卷、政治類 65 卷、總務財務類 22 卷、附校類 28 卷、年刊同學錄類 37 卷。

☆1949 年至 1952 年：146 卷

包括五類：總類 27 卷、人事類 25 卷、教學教務類 63 卷、總務財務類 24 卷、附校類 7 卷。

英千里：〈私立輔仁大學〉，刊於：《中華國大學誌》(二)，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 43 年 12 月。

北平輔仁大學編印(1929)：《輔仁大學》(校務簡介)。

北平輔仁大學編印(1948)：《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歷屆畢業生名冊》

第一屆(民國 19 年度)起至第十八屆(民國 36 年度)止。

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編(1982)：《輔仁大學簡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北京輔仁大學校會籌備委員會編印：《輔仁校友通訊》創刊號，1984 年 9 月 5 日。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印：《輔仁校友通訊》第 2 期，1985 年 2 月 1 日。

《輔仁校友通訊》第 3 期，1985 年 9 月 14 日。

《輔仁校友通訊》第 4 期，1986 年 1 月 10 日。

《輔仁校友通訊》第 5 期，1986 年 1 月 10 日。

《輔仁校友通訊》第 6 期，1986 年 6 月 20 日。

《輔仁校友通訊》第 7 期，1986 年 9 月 20 日。

《輔仁校友通訊》第 8 期，1986 年 12 月 20 日。

《輔仁校友通訊》第 9 期，1987 年 10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0 期，1988 年 10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1 期，1989 年 10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2 期，1990 年 10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3 期，1991 年 10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4 期，1992 年 9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5 期，1993 年 6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6 期，1994 年 6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7 期，1995 年 6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8 期，1996 年 8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19 期，1997 年 8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20 期，1998 年 8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21 期，1999 年 8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22 期，2000 年 8 月。

《輔仁校友通訊》第 23 期，2001 年 8 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編印(1999)：《輔仁大學七十周年校慶特刊》。

(二) 書 籍

張其昀等著(1954)：《中華民國大學誌》(一)、(二)，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張秀亞著(1957)：《湖上》，臺中，光啟出版社。

(1960)：《牧羊女》，臺中，光啟出版社。

(1970)：《書房一角》，臺中，光啟出版社。

(1973)：《天香庭院》，新店，先知出版社。

(1975)：《秀亞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公司。

(1978)：《人生小景》，臺北，水芙蓉出版社。

(1981)：《白鴿·紫丁花》，臺北，九歌出版社。

工農兵雜誌編委會編(1967)：《工農兵增刊：履歷表匯編》，北京，紅代會人大三紅工農兵雜誌社。

風雷戰鬥隊編繪(1967)：《漫畫專集第三集：痛打劉鄧》，太原，山西大學紅旗公社。

陳啟天著(1969)：《近代中國教育史》，臺北，中華書局。

北京師範大學編(1980)：《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委會《風雲錄》編輯組編(1985)：《風雲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邵夢蘭等編述(1986)：《國立復旦大學紀聞》，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1986)：《紀念劉少奇》，北京，文物出版社。

陳能治著(1990)：《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1927-193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熊明安著(1990)：《中華民國教育史》，重慶，重慶出版社。
- 燕大文史資編委會編(1990)：《燕大文史資料》(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迺蘇主編(1990)：《陳垣校長誕生 110 周年紀念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劉迺蘇著(1998)：《歷史文獻研究論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 110 周年籌委會編(1990)：《紀念陳垣校長誕生 110 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蔣志遠主編(1991)：《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民國廿三年)，臺北，宗青圖書公司。
- 嚴家其、高 皋著(1990)：《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 陳學恂主編(1994)：《中國教育史研究》(現代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史樹青著(1996)：《書畫鑒真》，北京，燕山出版社。
- 張行兮著(1996)：《貪污之王：和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龔書鐸主編(2000)：《勵耘學術承習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啟 功著(2000)：《啟功學藝錄》，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 陳方中編著(2001)：《于斌樞機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三) 期刊雜誌

- 方 豪(1971)：〈對日抗戰時期之陳援庵先生〉，傳記文學，第 19 卷第 4 期。
- 胡 適(1986)：〈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傳記文學，第 48 卷第 3 期。
- 關國火宣(1986)：〈輔仁大學最後一任校長陳垣〉，傳記文學，第 48 卷第 3 期。
- 何廣棧(1986)：〈從陳援庵先生之一通函牘談起〉，傳記文學，第 48 卷第 3 期。
- 朱文長(1986)：〈筆下的厚道：陷共與投共不同，為陳援庵師呼冤〉，傳記文學，第 49 卷第 3 期。
- 蘇東國(1986)：〈我也一談陳垣其人〉，傳記文學，第 49 卷第 3 期。
- 陳 煒(1986)：〈陳垣先生「陷共」前後之真實情況〉，傳記文學，第 49 卷第 3 期。
- 高 新、何 頻(1992)：〈劉少奇和他的六妻九子女〉，傳記文學，第 61 卷第 1 期。
- 王慧章(1993)：〈記王光英、王光美十一兄妹〉，傳記文學，第 63 卷第 3 期。
- 江 麗(1993)：〈劉少奇第一次拜訪岳家〉，傳記文學，第 63 卷第 3 期。
- (1999)：〈紅色資本家王光英〉，新華文摘，1999 年 7 月號
- 權延赤(1994)：〈王光美出獄之後〉，傳記文學，第 64 卷第 1 期。
- 曾慶瑛(2001)：〈祖父陳垣在文革的歲月〉，傳記文學，第 78 卷第 3 期。

附錄 1.

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簡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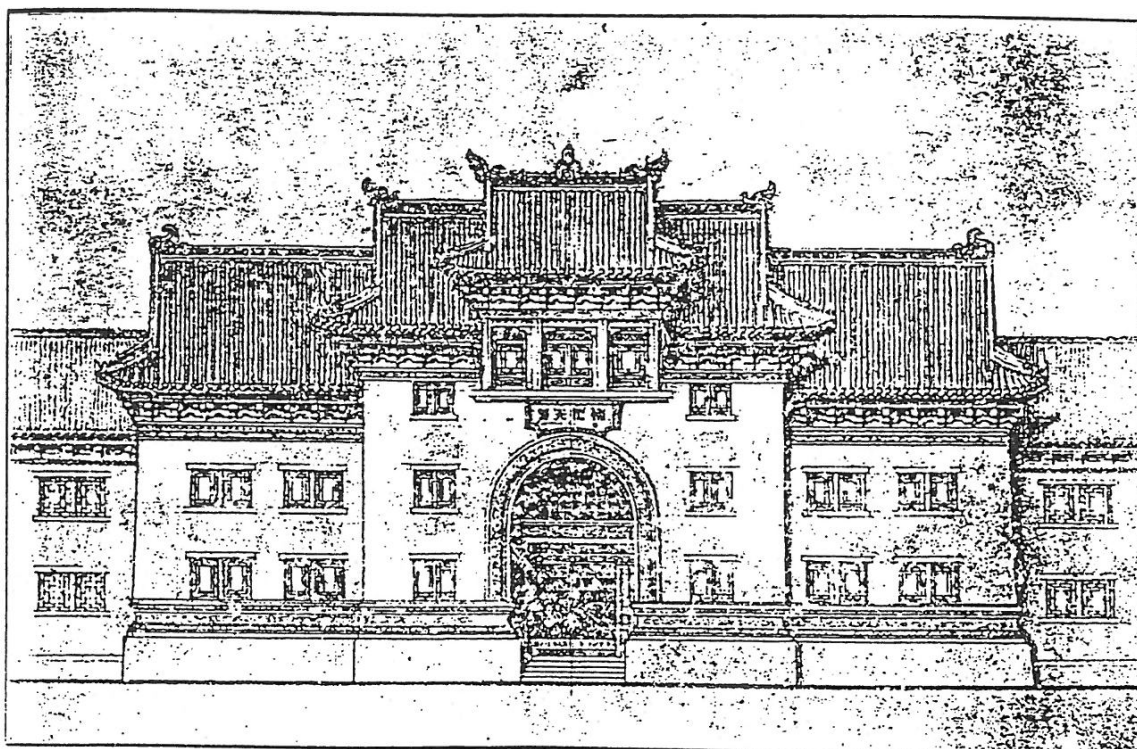
鄙人前因感於人才消乏、國學日就淪胥、乃於一九一三年、組織輔仁社於京西香山靜宜園、備古今書籍若干種、招弱冠青年若干人、日夕討論其中、分期作文演說、輸灌社會必需之常識、以爲將來酬世之用、其所發現考訂諸文、時於報紙披露、惜所來諸生、根柢太淺、又限於時期、故無甚優美造就、後因種種阻碍、未得擴充、遂爾中止、識者惜之、然十餘年來、鄙人之志願、耿耿未嘗一日去懷、今當美國本篤會、創立大學於北京、將來章程科目、力求美備、自不待言、然非按學級循序漸進之學生、則不得躡等而入、至一般寒素及逾歲之好學青年、仍不免有向隅之歎、鄙人因商之校長奧圖爾博士、於大學內另闢一部、爲國學專修科、中分國文歷史哲理三大綱、而總以輔翼道德、開拓識見、及接人應世必需之常識爲目的、今特將簡明章程八條錄下、有志青年、曷興乎來、

- 一 本科專事國學之研究、故取論語會友輔仁之義、名輔仁社、
- 二 入社之年齡、自十八以上至二十五以下爲合格、
- 三 入社程度、須能參閱書史、並能作二三百字通順文字者、
- 四 凡願入社者、請先來信報名、寫明姓名年歲籍貫、並將自作文一二篇附來、(萬不可托人代作及修改、倘至時不符、則徒勞往返)合格者、由本社去信知照、至入學時、須有各本處主教司鐸介紹函、始得收錄、
- 五 本學備有宿舍、及一切參考書籍、來學者每人每月止收茶飯費七元、一切學費房費皆不收取、惟紙筆被褥及零用之物、皆須自備、
- 六 本社以二年爲畢業期、普通學識粗具、能自修習、即給以證書、其中遇有天資明敏、品行端方、願爲深造者、可升入大學預科或本科、並優待免費、
- 七 凡學生有犯規則、屢戒不悛、及天資過鈍、難期造就者、得隨時令其退學、
- 八 來信報名、請直寄北京西城定府大街濤貝勒府舊邸內公教大學國學部收可也、開學日定於本年陽歷十月一日、路過遠者、遲至可以隨時收錄、

公教大學國學部主任英斂之謹訂

一九二五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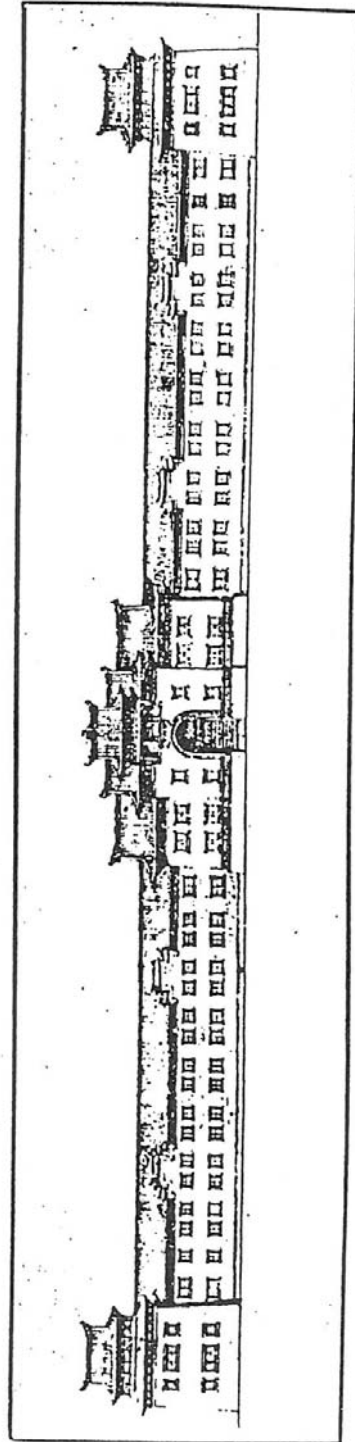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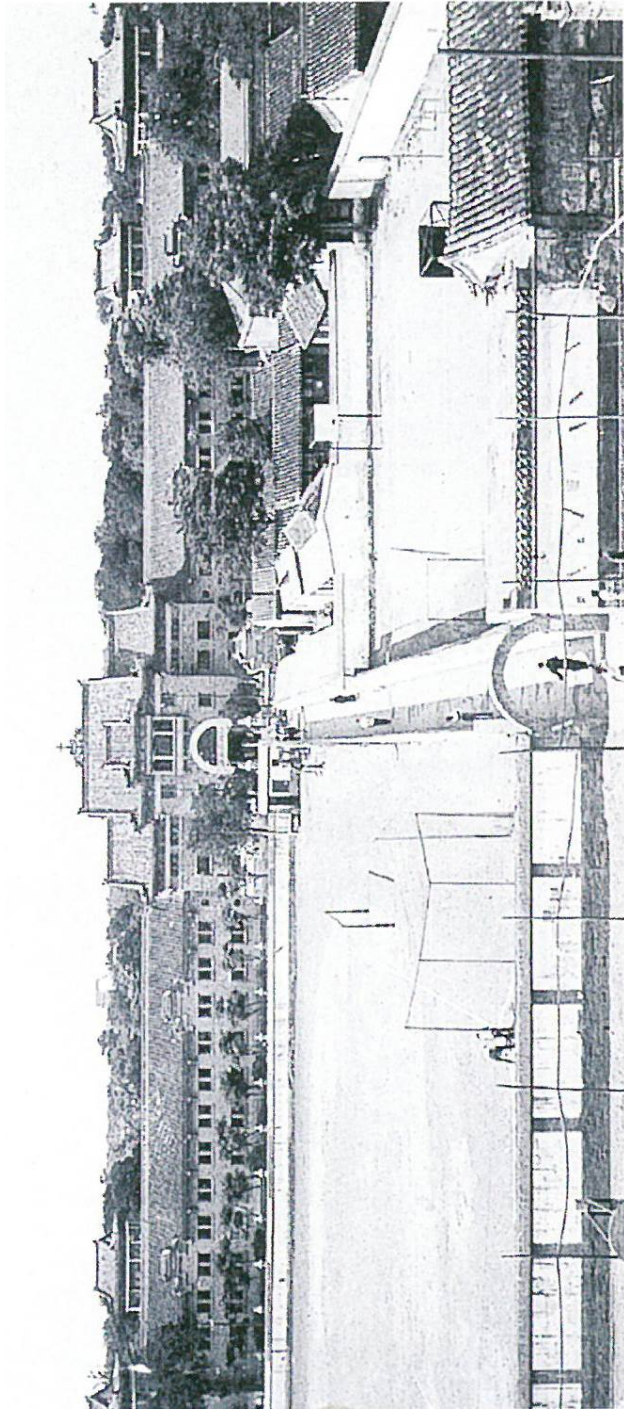
附錄 2.



新 建 築 校 舍 大 門



附錄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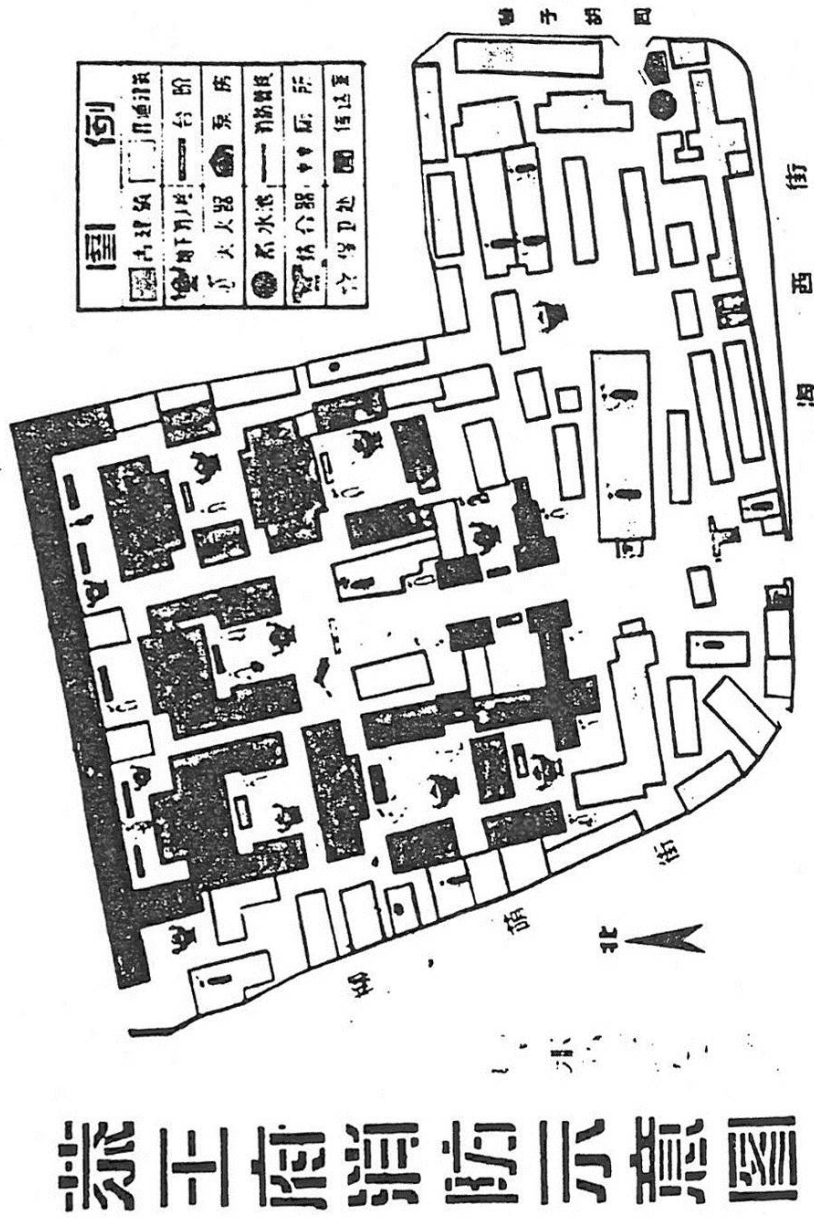


新 建 校 舍 正 面 圖

附錄 4



附錄 5.



附錄 6.



附錄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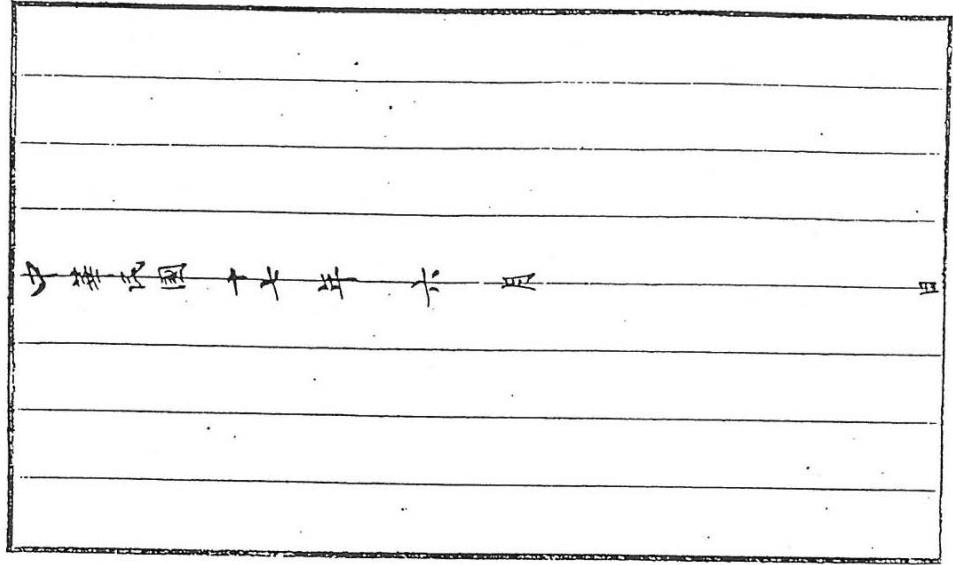
外國宗教團體及教會調查表				
二十八年四月一日				
名稱	洋文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中文 聖言會	
地址	內五區空庫大街 胡同一號 電話西局 196 號 396 號			
主腦人	姓名	國籍	性別	來京年月
	洋文 Rev. Father Rudolph 中文 雷曼冕	德國	男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開辦年月	中曆 此開北元前二十七年 月		西曆 1875 年	
經費及基金來源	由義、意、法、英等國捐募而來			
佈道方法	辦理學校			
本支部所在地及其大概	辦理輔仁大學			
牧師	外國人男 20	名	外國人女	
職員人數	華人男 1	名	華人女	
信徒人數	名			
信徒國別	外國人 英國 5 荷蘭 1 法國 1		名	華人 1 名
活動狀況	辦理學校			
備				
致				

附錄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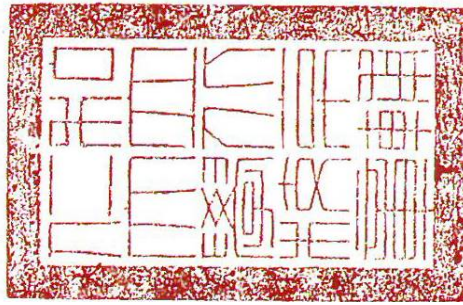
U

斗 稿 校學大仁輔平北立私 2/13/21

3



文
 私立
 北平
 仁輔
 大學
 校章



附錄 10.

布告

今日(星期五)下午六時
于斌大主教在本校
大禮堂對同學講話
希踴躍參加為幸此佈

一月
二十五日

附錄 11.

52

國立北京大學秘書處用箋

茲寄上為蔣夢麟先生競選立委

請予支持函壹百份，請轉致

貴校同仁為盼。此致

陳援菴先生

弟胡適敬上 一月十六日

電話四局 一〇九六號 一〇九八號
二六三六 〇四〇〇號

附錄 12.

北京市革命公墓 財甲 N4 No. 0021551
骨灰堂收款收据

交款人: _____ 日期: _____ 亡人: 陈恒 室 西一 址 49

收款项目	数量	单价				收款项目	数量	单价			
		万	千	百	元角分			万	千	百	元角分
骨灰寄存(年)											
骨灰墙寄存(年)											
骨灰证工本											
刻 字											
刻 槽											
石 板											
描 字											
烧 瓷 像											
党 旗											
香 币											
骨 灰 罩											
绢 花											
合 计 (大写)		五 千 零 百 零 拾 零 元 零 角 零 分						7131.00			

加盖公章有效: _____ 收款人: _____

(二) 收款收据交交款人



附錄 13.

3R8U
稿 校 務 長 校 學 大 仁 輔 京 北 立 私

文 字 第 () 號	文 佈 告	送 達	類 別	附 件
事 佈 告 三 十 年 度 各 班 得 分 最 高 者 照 學 則 第 五 十 二 條 規 定 經 教 務 會 議 決 定 應 給 予 獎 章				
由 Announcement announcing 65 students obtained the highest grade in their classes, and awarded prizes.				
院 長	校 務 長	校 務 長	校 務 長	校 務 長
擬 稿 員	文 牘 課 課 長	課 課 長	系 主 任	發 行 處 課 課 長
來 文 字 第 號	檔 案 字 第 號	九 月 十 一 日 時 封 發	九 月 十 一 日 時 蓋 印	九 月 十 一 日 時 校 對
		九 月 十 一 日 時 繕 寫	九 月 十 一 日 時 歸 檔	九 月 十 一 日 時 呈 閱
		九 月 十 一 日 時 擬 稿	九 月 十 一 日 時 收 到	

女 熊 振 翔	數 三 魏 執 權	女 譙 毓 琮	物 一 李 育 浩	女 王 樹 芬
物 一 鄭 世 文	物 三 魏 用 灝	女 王 光 美	化 一 譚 曾 振	化 二 吳 惟 修
女 譚 全 錦	化 三 張 實	女 趙 忠 勤	生 一 韓 漢 章	生 三 丁 修 珠
女 江 徵 鶴	女 楊 日 強	女 潘 友 昌	女 白 家 蘭	教 三 馬 士 光
女 齊 白 江	心 一 鄭 志 鳴	心 三 郭 溢 恩	美 一 張 金 壽	女 梁 啟 蓮
家 一 李 美 珍	家 三 陳 美 蘭	家 三 王 瑛	史 所 一 謝 斯 駿	物 一 佟 盛 勳
物 二 王 濟 文	生 一 吳 慶 貴	文 史 一 杜 而 末	日 一 張 愨	日 三 張 若 望

中 華 民 國 九 月 十 二 日

附錄 14.

WOMEN'S SECTION 三十年代各院系得分最高女生一覽

NAMELIST OF STUDENTS WHO OBTAINED THE HIGHEST GRADES IN THEIR RESPECTIVE CLASSES 1941--1942

系級	Name	姓名	成績	備考
Dept. Yr.			Grade	Remarks
Chin. I. 國一	Shih Hsien Chih.	史獻芝	83	
Chin. II. 國二	Chang Ch'un Hua.	張春華	83.6	
Chin. III. 國三	Chang Yüeh Ming.	張月明	83.3	
W. L. I. 西一	Wu Ju Ho.	吳汝猷	83.8	
W. L. II. 西二	Wang Wen Chia.	王文佳	85	(S)
W. L. III. 西三	Mao Yi.	茅漪	86.3	(S)
Hist. I. 史一	Ch'en Kuei Ying.	陳桂英	81.0	
Hist. II. 史二	Wu Ch'uan Chang.	吳傳璋	83.1	
Hist. III. 史三	Lan Wen Ho.	藍文和	81.1	
Soc. I. 社一	Liu Yü Hua.	劉毓華	86.3	(S)
Soc. II. 社二	Chao Ju Hui.	趙汝慧	79.9	Below 80 不及
Soc. III. 社三	Tsao Yi Sun.	曹怡孫	78.9	Below 80 不及
Eco. I. 經一	Lü Shu Mei.	呂淑美	87.4	(S)
Eco. II. 經二	Chou Li Ya.	周麗亞	82.5	
Econ. III. 經三	Liang Ching Ho.	梁敬荷	90.8	(S)
Math. I. 數一	Ho Yü Nan.	赫郁南	76.9	Below 80 不及
Math. II. 數二	Hsüing Chen Hsiang.	蘇振翔	85.7	(S)
Math. III. 數三	Chiao Yü Shen.	譙毓琛	82.4	
Phys. I. 物一	Wang Shu Fen.	王樹芬	83.4	
Phys. III. 物三	Wang Kuang Mei.	王光美	89.2	(S)
Chem. I. 化一	Ch'en Ch'ung Te.	陳瓊德	77.6	Below 80 不及
Chem. II. 化二	T'an Chin Yüing.	譚金鏞	80.6	
Chem. III. 化三	Chao Chung Ch'in.	趙忠勤	84.6	
Educ. I. 教一	Yang Jih Ch'iang.	楊日強	80.6	
Educ. II. 教二	Pai Chia Lan.	白家蘭	79.6	Below 80 不及
Educ. III. 教三	Ch'i Pai Chiang.	齊白江	79.3	Below 80 不及
F. A. I. 美一	Chang Mi Ling.	張米玲	77.7	Below 80 不及
F. A. II. 美二	Liang Ching Lien.	梁敬蓮	82.2	
H. E. I. 家一	Li Mei Chen.	李美珍	80.3	
H. E. II. 家二	Ch'em Mei Lan.	陳美蘭	83.9	
H. E. III. 家三	Wang Ying.	王瑛	82.9	

附錄 15.



附 錄

我國大學校院校史室管理現況—以輔仁大學校史室為例

輔仁大學校史室 主任

吳瑞珠

一、前言

輔仁大學的創辦追溯歷史可前推至一九二五年¹的北京。民國初年，基督教積極在華籌設大學，天主教教友亦感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新知脈動接軌的迫切需求，而有上書羅馬教廷來華創辦公教²大學之舉，一九二五年始以英斂之³創辦之「輔仁社」作為大學設置的基礎。

輔仁大學因於中西文化交融之校風，又逢社會變遷與國家命運交纏連結而別具特色。至一九五二年中共教育部以院系調整名義將本校大部分併入北京師範大學為止，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歷史，正式入學的學生共有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人，並躋身為北京四大名校⁴之列。一九六一年由於來台校友們的努力，終得以復校，並開始招收哲學研究所學生八名，至一九六三年購置新莊校地正式參加大學聯招而有最初的四百餘名大學部學生，至此，於焉展開輔仁第二階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

¹ 本校創校年代，因採標準有異，認定自有不同，歸納言有如下四個年代：(1) 1929年—國民政府正式核准立案(2) 1927年—以單一學院准予試辦，「輔仁大學」之名始立(3) 1925年—北京公教大學在教廷支持下成立，以附屬「輔仁社」之名招生。(4) 1913年—輔仁社初社之年，該社成立背景與輔大淵源極深。長久以來，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以1927年為輔仁創辦年代，而在台灣復校後，此間又以1929年為據，兩年之差距造成北京及台北兩地師生困擾。本室於八十九年間針對本項問題，經蒐羅各項文件、資料、紀錄、出版品及學術研究報告，論文彙集成冊，並邀集歷史學者、修會代表及資深校友提供意見，並取得共識，以一九二五年為本校創辦之始，北京校友會亦正式同意採取該年代為輔仁創辦年代。

² 「公教」(Catholic)一詞來自希臘文，包括兩部分：Kata (按照)，holou (全體)，原來西方名詞譯為「公教」爾後在中國則譯為「天主教」。目前按1999年世界天主教大學名錄，全世界共有五十所直屬羅馬教廷教育部之Catholic University。

³ 英斂之(1867—1926)正黃旗旗人，1888年信奉天主教，1902年辦天津大公報，與馬相伯為忘年之交，兩人均認為要促進公教在社會上地位，必須在中國開辦高等學府，於是兩人就合撰「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但未立即反應，英斂之遂先行於其居處—北京西山靜宜園中成立輔仁社。(參考陳方中教授：湯若望與英斂之宗教思想的聯繫，1992)

⁴ 時稱北京四大名校，為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燕京大學及輔仁大學。

面對輔仁這兩階段逾七十餘年的歷史，掌理校史的校史室正式設立於一九七〇年，由時任董事會秘書龔士榮教授（一九四四年畢業於北京輔仁歷史系）兼任主任職務，並以復校以來秘書室重要公函（含教育部、教育廳之復校規章、公文、羅馬教廷教育部文件及董事會重要記錄等等）及具有歷史意義之非文件類物品保存為主要工作。至一九八七年由當時之校長羅光總主教手書〈校史室簡章〉，校史室業務始有明文依據。⁵

按當時之業務內涵觀之，與檔案室之功能實有明確區分。輔仁於一九八七年間曾設置「檔案室」，然因人力、空間問題而暫予停辦，目前輔仁公函以統登後，交各處室院系等單位辦理並保存方式處理。筆者認為校史室與檔案室業務的分野在於檔案室應以文件之收發、管理及保管借調為主，而校史室則應對具有縱深及保存價值的歷史資料加以蒐集、編目、保存及研究甚或出版和展覽做為重心。

限於筆者之經驗，本篇報告將以輔仁校史室的概況、校史業務的規劃與執行暨業務內涵為討論焦點，而不涉及檔案室之問題討論。祈望各位專家學者給予指正及批評。

二、概況

按「校史」兩字，給人直接印象就是「學校歷史」，而校史室就是一個了解或收集學校歷史的單位，基本上學校當局並不會也不必要特別注意，只要完成資料收集的任務，並在慶典或特殊日子中為師生或社會大眾提供學校歷史上重要的人、事、物記錄的功能即可。因此在人力、空間和資料檔案的內涵上絕對是有限和龐雜的。有這層客觀認知後或許接下來我們可以用比較平和的心境和想像空間去面對校史室的規劃和管理的各項問題。

（一）輔仁校史室定位問題

⁵ 該簡章共六條，條文如下：

- 一、依照本校組織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條，本大學設置校史館，以收藏有關本校之歷史資料。
- 二、凡有關本校成立、復校及增加院系所之公文，俱交本室收藏。
凡有關本校與他校締結姊妹校或簽訂合作協議之證書及協議書俱交本室收藏。
其他有關本校歷史之資料，亦交本室收藏。
- 三、本室編寫所藏史料目錄。
- 四、本室置本校大事紀，按月記錄本校重要事件。
- 五、本室設校史陳列館，陳列有價值之史料供大眾參觀。
- 六、本簡章由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亦同。

一般言，早期的學校歷史文件資料大部分均會留存於董事會、秘書處（室）、教務處或一些研究發展單位，因為這些單位在實際業務需求上都與學校歷史有些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輔仁校史室於一九七〇年設置，在此之前本校並沒有一個專屬的單位掌理校史事宜。該室初設之時，僅將復校文件和物品做了初步的彙整，於初期的發展和各項規劃案中擇要保存了一些相關的信件、紀錄和照片，但都以堆積方式留存。至一九八七年依據「輔仁大學校史室簡章」，校史室有了較明確的工作內涵，亦拓增了資料收藏的內容。

（二）校史室資料內涵（詳見附錄一）

延續前期留存的復校文件和物品，及早期院系所增設之公文外，為了編撰本校〈大事紀要〉，有了收存各種會議記錄、照片及簡報的動作，並加以編目登錄，開始有了初步系統的整理。

（三）規劃前期之思考

筆者於五年前接掌校史工作，面對前述之情況，首當其衝的問題即是如何在有限的人力中更加系統的將之整理建檔，另一方面，則是如何對歷史業務重新詮釋並賦予現代意義，以為進一步省思的基礎。在心態上，筆者保持尊重前人之努力過程，無論在其收集整理的方法上和計畫願景上均盡可能持續執行，以免發生中斷，或因主觀認定的問題，以致產生事倍功半的情勢，而這也是從事校史工作的一個個人倫理的堅持。在實際工作中，筆者認為要使「校史」產生與現實環境的結合，並具有意義和價值，必須綜觀現實環境的需求，並與重要事件結合才能達到。因此如何宣示校史工作的重要性，必須在本身收集政策的明確性，保存知識的專業性，和建檔工作的流暢上充實著手。

三、規劃與執行

（一）規劃的原則與契機

固然校史工作具有靜態的本質，但面臨人力的有限性，必須與現實環境做結合時，則需跳出原有框架和印象。如前所述，輔仁的創辦原就與時代命脈相聯結，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會處所展現的辦學宗旨與目標已可顯現其端倪，因此當本校在校訂必修的「大學入門」課程開設之初，校史室即擔負課程之一：「輔仁校史簡介」，積極扮演使校史與辦學宗旨目標前後呼應，讓師生體會出輔仁的獨特性及歷史的價值的角色。其次在學校重大事件中，將校史室原有計畫與之結合亦可產生相互加乘的效果。例如，在本校創辦七十週年慶的校刊編輯計畫中，

配合委員會運作，以本室原有之文件圖片為基礎，重而進行全盤整理，新增及系統化的工作，不但使委員會較易完成階段性任務，而校史室亦利用這個機會完成多年堆積資料的整理工作，並進而促成「校史陳列室」改館工程的實現。其次，則是在蒐羅學校重要關鍵人物的資料時的配合實例。輔仁自創辦迄今共有七位校長，其中在台復校第一任校長于斌樞機主教，基於諸多原因，一直未有完整紀錄，此為校史工作上最大缺憾，一九九七年教會層峰指示本校須於樞機誕生百年（公元二〇〇一）時有所呈現。事實上這項工作困難度非常高，也不是一個兩人編制的校史室所可承擔，但也基於這種客觀情勢，使校史工作得以在輔仁師生中得到肯定，也使前兩任主掌校史主管同仁的計畫得以接續。

（二）執行的步驟與方法

總的來說，校史工作本來就需耗日費時的進行，在進程中需要同仁耐心和毅力，才得以推進。在這種過程中尤其需要層峰及同仁的了解與支持。了解的部分，在於靜態工作如何以動態活動展現使一般人能因參與而了解。支持的部分，則須在冗長的過程中，有階段性的表現，使大家感受到「等待」的值得。

在執行校史工作時，最實際的方法，就是在「做中學」以及在「做中推廣」的概念。以輔仁校史室工作為例，每一項業務均在進行中完成，而完成後又有更進階的另一項關連性工作需要開展。例如，以復校首任校長于斌樞機主教的傳記籌備工作為例，本室在傳記出版前完成大部分照片整理並出版《畫傳》，而《傳記》出版的同時，亦出版其《言論集》、《詩集》、《光碟》，在此同時，我們更完成歷任校長資料收集的範例，並奠定了日後進行的方針。再以一九九九年出版之創校七十週年《輔緣》特刊為例，如前所述校史室乘機完成整理，新增及系統化的工作，除了運用這批資料進行陳列室改館工程，亦初步完成校史網站的架設，更重要的還接續了北京時期歷史文件的收集和核對，及與北京輔仁校友會校史編撰的合作。在本校特殊的創辦背景中同時推動，各創辦修會在撰述「輔仁」的研究上也正積極進行。在這連串的進程中下一步驟即是一九六一年後在台「復校史」的撰擬準備工作的開展，以往的圖像、資料及口述記錄均將在該階段得到充分的運用。

校史行政工作的確千頭萬緒，在這團紊亂中，除了願景外，與層峰的理念配合，實在決定了每一階段工作進行的順暢與否。有幸，自筆者接掌該項工作以來均得到兩任校長的重視，尤其是現任校長李寧遠博士，雖出身醫學卻喜讀歷史，

重視人文，在輔仁面臨整合及競爭壓力的同時，在他的理念中，輔仁的歷史和其孕育的校風是本校最豐富而珍貴的資產，也因如此，校史工作的執行有了較順暢的可能性。

四、校史工作的內涵

學校歷史資料的蒐集、保存、研究、出版及展示，我們可以視為校史工作的內涵（見附錄二）。就實務而言，它牽涉到多層面的專業和知識，就理論上來說，也唯有如此才能發揮校史在協助教學和配合學校發展上的全面功能。茲將輔仁校史室就各項工作內涵陳述如下：

◆文件物品徵集

基本上如果各單位檔案文件能順次收集，並依規管理，校史室的工作能較為完備。惟目前校內並無統一之保存檔案單位，因此校史室在蒐集學校具有保存意義的公文或記錄實有較大的難度。但是因為本室負有編輯〈大事紀要〉的任務，至少在事件記錄上能有較精確的掌握。

在會議記錄的收集上，已有的電子檔案，解決了不少空間的問題，惟本室仍採兩者並存的方式。至於其他印刷資料，出版品及照片已有常規流程進入本室蒐集行列中。

◆典藏與保存

登錄工作在校史室中佔了極重要的部分，登錄主要使文件入室後能得到合理的維護，並供將來有效的活用。本室基於人力及財力關係，目前仍採書寫登錄方式，電子登錄檢索及網頁製作的配合，則已完成前期準備工作須待另一階段經費之核可。至於保存工作上，對嚴重損害的紙品文件採取掃描存檔以供查閱，原件則以 RP 方式維護，手稿文件則以無酸夾分隔存檔，會議記錄按學期裝訂，印刷品、出版品採開架直立保存，照片則採底片、照片分裝，按年代或事件列冊備用。錄影帶、VCD、錄音帶則置防潮櫃等等。從事校史工作，保存知識的涉獵是重要的基礎，而多參與講習訓練並充實相關資訊並時時請教實務專家為不二法門。

◆學術與研究

從事校史工作即包括大量的文書資訊的處理工作，但最重要的核心應是相關研究的進行。因為大批的文件、資訊如僅是收集保存而缺乏研究統整的步驟，基本上終歸是一堆資訊並沒有辦法產生意義和價值，亦無法讓現在的人與過往產出

關連，更遑論延續精神或借鑑了。因此本室在進行是項工作時採取橫向聯結的方式，與校內相關所系教授及研究中心配合，不論是口述影音製作、文字撰寫或軼聞軼事的採集，翻譯工作進行或各項資料收集及座談會的舉行，都是促使本校校史各個面向呈顯並益增完善的途徑。本校近期四十週年慶結束後，下一階段即應是復校史撰擬計畫的啟始，預計這個計畫的推動，可以凝聚校內創辦單位的共識和了解，也可使師生在復校的歷程中體認先人輝煌的事蹟和理想，以產生傳承的使命感。

◆ 出版與展示

早在一九八七年本校復校第二任羅校長在〈校史簡章〉中即指示出版「所藏史料目錄」及設置「校史陳列室」陳列有價值的史料供大眾參觀以便了解學校。

本校校史陳列室位於行政大樓「野聲樓」的四樓，與辦公室比鄰，並與「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形成一個 L 型的展示空間，兩館同時於一九八八年開館。展示物品計分三大類：歷史事件照片，歷任董事長、校長照片暨建築物照片環繞三個牆面，校內大事及傑出校友照片則圍成中圈據於展示館上層，歷史文件依牆順次排列，展示櫃下層則置校史資料及紀念品，該空間兼具展示及保存兩項功能。

至一九九九年，筆者為因應「大學入門」課程的需求，經與教師們舉辦多次討論後，又因編撰七十週年特刊各項資料之整理和條件中有改館之計畫，本項計畫僅以半年的時間完成，限於經費，甚為簡單。執行期間我們幸運地碰到了一群年輕有理想的設計公司，在不斷討論和協調中，完成我們稱為「第一階段」的展示工程，希望不久我們即能完成「第二階段」的理想展示空間。

本校校史陳列室僅三十坪，在有限空間中分六個主題「精神篇」、「對話篇」、「歲月篇」、「翼風篇」、「網絡篇」和「偶拾篇」分別將本校各面向及特色做扼要的展示和說明。以現今的展示方式需要有口述導覽人員，而在第二階段完成後，則可以發揮全面展示、詢問、回應的自助功能。

談到出版工作，除了每學年的《大事紀要》外，一九九九年出版之《于斌樞機畫傳》，二〇〇〇年出版本校董事長《狄剛總主教文集》、終身講座《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二〇〇一年則與臺灣商務館合作出版《于斌樞機傳》，校史系列叢書之《于斌樞機言論續集》、《野聲詩集》、《野聲》等等，其他有關本校歷史翻譯著作《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 1923—1933》亦將於近期出版，預計明年將有本校第三任校長《李振英神父口述史》，《聖神婢女會與輔仁大學》

之出版。以上所列林林總總，大部分是與學校相關單位及教授合作下完成，雖然協調及編務工作沈重，基本上卻可顯示以出版帶動研究，再由研究而帶動系統整理文件檔案的互動及時效性。

結語

從事校史工作將近五年，在各種機會和場合結識許多同質工作同仁，有些問題是大家共同面對的，例如人力的不足，財力的缺乏，雜多紊亂的資料等等，現在又加上「數位化時代」的壓力，使同仁們永遠都在跟時間賽跑，如何化問題為助力並面對問題，將數位時代檔案管理的技術轉入工作環境成為管理上有效的工具，實在當前重要的問題，至於在導入及應用技術之前全盤省思和規劃又為是否成功的環節。

校史工作絕非一蹴可及，也是一個需要集體關心和參與的工作，輔仁大學在面臨整合的今天，對於校史室的定位有各種不同聲音，或許不久的將來，它將與其他同質性的單位結合起來，擔負起使命與特色的核心工作，但不論如何，筆者相信，歷史是人特有的活動方式，人的歷史展開於空間與時間內，如果有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則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人如何在多重限制中，經由明智創造出嶄新局面的努力，校史的確見證了這個事實，也處處產現當代的新意。

輔仁創辦于一九二五？！

校史室

此次本室前往北京除與李校長一行會合，參加北京輔仁校友會恢復活動十六週年校友返校活動暨紀念陳垣校長誕生一百二〇週年慶祝活動外，主要任務有四：

- (一) 核對查證北京輔仁大學一九二五～一九五二年間檔案目錄保存狀況。
- (二) 轉達「創校年代釋疑座談會」共識，徵詢北京輔仁校友會具體意見。
- (三) 研議輔仁大學校史資料收集彙編，推動合作事宜。
- (四) 為「本篤會一九二三～一九三三傳教史」有關輔仁創校史引用資料核對。

關於創校年代一統的想法，係李寧遠校長二月就任以來，為積極規劃全校整合工作，以提昇本校競爭力之際，要求同仁首先需對學校歷史發展及精神掌握以做為各項革新重要依據及基礎之要求，所產生之疑義及釋疑之工作。

對輔仁師生而言，去年學校剛熱烈慶祝創校七十週年活動，但在北京的校友早於一九九七年已慶祝過七十年校慶了，這兩年的差別，實因本校之創辦涉及教會行政傳統，創辦修會特殊性，暨廿世紀初葉中國歷史之變動更迭，這些歷史因緣和背景，導致本校創辦年代有不同之認定標準實為可理解的狀況。

為釐清各種歷史源由暨狀況，特指示校史室先蒐集各項文件資料、記錄、出版品、學術研究報告暨論文，經彙整後，邀集歷史學家，修會代表、資深校友於八月底舉辦座談會並達成初步決議，即「本校創辦于一九二五年，英名：Founded 1925」。此次本室赴北京知北京輔仁校友會已將此項問題交「校史研究組」研議，小組組長徐乃乾副會長及副組長林智源學長均認為「可考慮」，為慎重起見將於近期提校友會理事會通過後呈王光美會長以正式文件表達意見。

「輔仁大學」充滿人文精神暨悠久歷史的背景，為在臺灣新興大學中望塵莫及的特色，為取得社會大眾認同，兩岸如能取得一致看法，對將來之發展必大有助益。（發表於《益世評論》第 265 期）

天主教輔仁大學的歷史與今日願景之整合

校史室

本校明（二〇〇一）年即為在台復校四十年，屆時對於「輔仁精神」之討論研究以為本校各項革新的重要基礎和依據，實有借重各項校史資料之彙整和提供。為了能事先對校史有較精準之掌握，應將分佈於北師大、美國本篤會院及台灣輔仁大學之校史作統一之彙編。本室目前已應用原有收集之文件、雜誌、函件、論文資料以了解校史之梗概及資料之分佈情況，並概分八個工作階段分別擬定蒐集方針及內容，期望於明年十二月校慶前研討會中有正式之資料彙編出版，以供各界參考。

此八階段分別為：

第一階段 1919～1923

「輔仁社」之創辦及中國之教育環境研究

第二階段 1923～1932

本篤會創校和營運之研究

第三階段 1933～1950

聖言會接辦和時代背景之影響

第四階段 1950～1952

中共教育部院系調整之法令暨原則與輔仁院系調整之分佈研究

第五階段 1952～1956

校友師生之活動情況

第六階段 1956～1961

在台復校之籌備階段

第七階段 1961～2000

復校後之發展

第八階段 2001～

本校之願景

本室對第一、二階段之收集，策重於與北京輔仁校友會，北師大和本篤會之合作，本篤會目前同意由本室翻譯出版「聖文森教區 1923—1932 年傳教史」第六、七章部分，即因應此計畫之初步工作。此次至北京訪問校友會知「校史研究組」成立並積極展開工作，以配合北師大百年校慶之舉，同時又可配合本室此兩階段之資料收集工作。

第三階段 1933~1950 年聖言會接掌後之資料保存概在德國奧古斯丁，（張至善教授訪問過）但沒有人整理，也無編寫計畫，在台灣輔仁方面，曾與柏殿宏神父，薛保綸神父請教，亦證實沒有人撰寫和研究之事實。目前本室嘗試與客居芝加哥九十六高齡，時任訓育主任的聖言會會士伏開鵬神父聯繫，希有資料可尋。

對於第四階段 1950—1952 中共院系調整之原則，例如「輔仁」為何大部分院系均併入北師大的問題。校史研究小組徐乃乾老師將在撰述上清晰交代，而現在王振稼、張延祐副會長兩位都躬逢其時，對其原因知之甚詳，可速與之安排訪談保存佐證。

第五階段校友會活動部分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指 1952 至 1956 來到台灣之校友情況，另則指 1984 年大陸校友會恢復活動之情形。

大陸校友會自改革開放後政策寬鬆了，思想亦逐漸轉變，國務院頒佈「社團法」後，北京輔仁校友會依法取得登記又因王光美會長的領導，使校友會活動得以順次開展。校友會自 1984 恢復活動後，陸續出版了「輔仁大學校友叢書之一——風雲錄」，「校友名錄」，「通訊錄」，「校史資料革命史部分」，「輔仁校友通訊」等等，收集了許多寶貴的歷史檔案為匯編校史準備了良好的基礎。

在台校友會係 1956 年後約七百餘校友到了台灣後成立的。校友遍於台北、台中、台南，這些流落異鄉的同學時有聚會，此段歷史應速與在美之范繁學長合作紀錄。

第六、七階段工作之建議：

按北師大撰寫校史計畫之經驗，可借重已有之組織與人員（如輔仁校友會負責北師大前身，即北京輔仁部分）再以原有之校史架構加以補充，並列專案經費由專人執行。

在台復校史部分，實際應有困難，主要因為年代太近，因此爭議性亦高，北京部分則可避開類似困擾。建議儘可能收集各角度資料匯編以供將來撰寫參考。

「燕京大學校史」共一百二十萬字已出版，為一系統撰寫之歷史，「北京大學英烈史」亦正籌寫中，盱衡目前之潮流，對自己學校歷史的回顧和保存實為一趨勢亦為規劃發展之利器，輔仁二〇〇一年之願景實可賴此輝煌的歷史足跡，做為再出發之堅實基礎。（發表於〈益世評論〉第 266 期）

輔仁大學 1950—1952 院系調整原則小檔案

校史室

自一九四九年解放後，大陸全面學習蘇聯，包括教育制度採單科制大學為主，例如石油學院、礦業學院、農林學院、師範學院之設立皆是這種制度的具體實例。對於綜合性大學採取淘汰的作法，因此撤銷所有私立大學，甚至中、小學亦遭過同樣命運，這就如經濟上不允許個體經濟而設立合作社完全一樣，改革開放後，教會辦的學校則限制更嚴格，甚至全面勒令停辦。

撤銷私立學校併入國立大學的原則據當時的通報了解，燕京併入北大，輔仁併入師大，清華成為單一工科大学，這種單一學院的政策，使輔仁原先非常強的經濟系不得不併入人大。其中「會計」一科當時是執全國牛耳的科系，中國有一說「南潘北趙」南潘指上海潘旭倫，其所著會計學一直用了幾十年，北趙則指本校之趙錫禹。合併後趙錫禹教授亦到了人民大學，也奠定了目前人民大學經濟專業會計科的卓越地位。

當時單一培養中學教師體系的北京師範大學吸收了北京、燕京、中國等大學教育系。本校農學系五〇年併入農業大學，五二年撤離北京，家政系撤銷，此乃不重視民生之結果。近年開放後前二任中共國家教育部部長就曾提出北師大應恢復家政系之呼籲，實感到社會國家在提高素質教育的同時家政教育的急迫性。輔仁西語系包括英語及德語，院系調整時，將高年級學生及年資較長之教師併入北大，低年級之學生和年資淺之教師則改學俄語而成為俄語系。

近年來各大學又逐漸朝綜合性大學發展，以北師大的情況言，40%為師範專業，而其他 60%科系則非師範專業，尤其自一九八九年自費就學不負責就業的政策擬定後，經濟學院也成立了，可見又是另一個趨勢了。（發表於《益世評論》第 267 期）

艾德豐斯·布蘭史泰特一九二四年北京信件：關於設立天主教大學於北京之計劃
 The 1924 Peking Letters of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regarding Plans to
 Establish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作者

康士林 (Nicholas Koss, O.S.B.)

天主教輔仁大學

譯者：張 琰

天主教輔仁大學是由美國聖文生修院的本篤會修士應梵諦崗之請在二零年代中期於北平創立，當時修院總院長為司泰萊 (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O.S.B., 1877-1930)。去年，天主教美國傳媒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出版了一本聖文生修道院院史，書名是《傳教到美國：美國第一座本篤會修院聖文生總會院院史》 (Mission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St. Vincent Archabbey, The Fir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書中第六章〈中國任務 (1918-1930)〉敘述天主教輔仁大學的創立，第七章〈挫折與審判〉則描述本篤會士在一九三三年迫不得已將這所大學交給聖言會的情況。

一九二四年，司泰萊總院長指派五十四歲的聖文生總會院前副院長艾德豐斯·布蘭斯泰 (Fr. 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前往北京考察設立大學事宜。艾德豐斯與另一位本篤會士普拉西度·拉騰柏格 (Fr. Placidus Rattenberger, O.S.B.) 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八日抵達北京，立刻展開確定創設一所天主教大學可能性的重要工作。不久，艾德豐斯就開始寫信回聖文生。這些信當中有許多是寄給斯泰萊總院長，一方面告訴他北京的情況，一方面也請他指示該如何進行。艾德豐斯平均每兩個星期寫一封信回聖文生總會院。聖文生總會院的檔案室收藏了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寫的九封信。

這些信件主要是寫給聖文生總會院院長司泰萊的。Mission to America 一書中詳盡的敘述了司泰萊擔任總院長的任期中種種，以及掌理輔仁大學創校事宜的角色。在艾德豐斯信件檔案中，也有五封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二四年間寫給艾德豐斯的五封信的副本。司泰萊總院長的這些信只供參照，用來幫助我們了解艾德豐斯信件的內容。司泰萊總院長許多和輔仁大學有關的信件，仍待詳細的研究。司泰萊總院長和艾德豐斯兩人關係中一項有趣的因素是，年輕的司泰萊修士在擔任林安德總院長 (Archabbot Leander) 的副院長時是艾德豐斯的屬下。而當司泰萊在一九一八年選上「助理總院長」以後，反而成為長他七歲的艾德豐斯的上級。

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中寫的其他信函，有寫給聖文生總會院副院長、寫給本篤會同修、寫給聖查威爾慈善修女學院 (Mercy Sisters of St. Xavier Academy) 以及奧圖爾神父 (Fr. Barry O'Toole)。本篤會院的副院長 (the prior) 是由會院院長指派，負責協助院長管理會院。聖查威爾學院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女子高中，由「匹茲堡慈善修女會」管理，距離聖文生總會院很近。奧圖爾神父是一位主教區神父，在聖文生總會院教書，在一次北京之行途中，他首度向美國本篤會提議在

該地經營學校的可能性。不久後他就被任命為北京這所天主教大學的第一任校督，而這時候他正完成在美國寫的一本書。

在司泰萊總院長於一九二五年二月造訪北京之前，艾德豐斯一九二四年的這些信已經提供他許多關於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的事情。因此本人將在本篇論文中研究這些信件，了解這方面的內容，尤其關於以下問題：是否應該先設立一所學院（即高中）、學生從何而來、教授課程、學校地點、資金的籌措，以及中國天主教教友的角色。這些信件中也有些關於中國天主教會和中國政局的評論，以及對於身為本篤會士的艾德豐斯以五十四歲高齡被派往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中工作，如何處理週遭情況的評論。不過這些內容將是另一篇研究的題材。

在聖文生檔案中，艾德豐斯寫的信並未包含所有他從北京寫的信件，這一點，從現存信件中提及的某些信不在檔案中就可以看出。例如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的信中提到他在八月一日寫的信，該封信就不在檔案中。而後，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一封司泰萊總院長寫給艾德豐斯的信裡，也提到艾德豐斯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九日寫的一封信，不過這封信也不在檔案中。

從北京寄信到聖文生總會院，通常需時一個月或六星期。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的信中提到艾德豐斯七月三十一日的信在九月十六日才寄到。之後，聖文生的副院長也會在艾德豐斯寄來的信上寫下收信日期。因此，在艾德豐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的信上，就有「二五年十一月六日閱」的註記。毋庸待言，信件往返所需的時間不時會為偶而需要總院長即刻答覆的艾德豐斯造成問題。於是在有些情況下，會以電報加速聯繫。在艾德豐斯的信件檔案裡也保存了一些這類的電報。最後，我們應該記住，艾德豐斯的第一語言是德語而不是英語。聖文生總會院在一八四六年創設於巴伐利亞。司泰萊總院長是首位非出生於德國的總院長。艾德豐斯有些信是用德文寫的，尤其是寫給他同修的信，不過他大多數的信件是以英文寫就。

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位神父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八日星期二抵達北京。七月十七日，兩人合寫了一封信給司泰萊總院長。這封信「簡短的說明普遍的狀況，以及權威人士對於我們事業的印象」。這項「事業」是設立一所天主教大學。「權威人士」是一九二三年抵達北京的中國第一位宗座代表剛恆毅（Archbishop Celso Constantini）、華北退休的宗座待牧夏林主教（Stanislaus F. Jarlin, C.M.），以及下林主教的助理主教法卜禮主教（Bishop Fabrique）。

這次會面他們是以拉丁文和法國籍的神職人員交談。從之後艾德豐斯的信上（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可以知道：「...這些人（北塘的法籍傳教士）當中無一能說英文...而後我們很快也注意到西塞羅的風格並不時興，而英格曼（拉丁文法書的作者）的規則也多被違犯，但是並無大礙，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有些神父、事實上是大多數這些神父，拉丁文都說得十分流利。」與剛恆毅主教面談時或許也是使用拉丁文，因為日後艾德豐斯成為這位主教的英語會話老師。

七月十七日的信尾提到，「宗座代表切盼本篤會士接受這項殊榮以及厚愛（在北京創立一所天主教大學）」，由此可見艾德豐斯與普拉西度兩位會士的北京行屬

於探測性質。顯然在這一點上，本篤會士尙未有定論。因此這封信是第一份給總院長的現場報告，提供總院長及聖文生會院會議作最後決定的資料。

這封信的第二段描述他們初次與剛恆毅主教「會面」的情形。根據隨後的一封信（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該次會面是在七月九日星期三。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人寫道：宗座代表「強調這件任務的艱難及重要。他也強調我們一切行事都必須懷有慈悲和和睦。」兩位本篤會士接著以一種類似旁白的語氣寫道，「這項勸告的重要性」在他們以後拜訪主教們和其他人時可以看得出。在首次拜訪剛恆毅主教的描述末尾，他們寫道：「他尤其一再交代我們要經常請教主教、接受建議、不要答應任何事，在深思熟慮後才作出結論。」

第二段的內容間接呈現了兩位本篤會士到達中國時非常複雜的教會情況。本篤會是羅馬天主教會結構中一支不具義務的宗教教派。因此，他們一般會應主教之請在主教區內運作，不過他們做的事卻不是由主教所決定，只有在進行教區活動時需要主教的允許。本篤會會院院長都嚴格遵守這種狀況，但是，不具義務的教派和主教都要聽命於教宗。聖文生總會院的本篤會士之所以來到中國，是奉了教宗之命，而教宗顯然是回應中國天主教文人的請願。夏林主教並沒有要求本篤會士到北京，不過他一定也深知這是教宗的「希望」。因此，當剛恆毅主教告訴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我們一切行事都必須懷有慈悲和和睦」時，他針對的就是這種複雜的教會情況。

■ 先成立學院（即高中）

在七月十七日信上第三段，艾德豐斯與普拉西度二人描述了他們初次與「主教」會面的情形。由於夏林主教已經退休，我認為此處的「主教」，係指助理主教法卜禮。

主教以強烈的語氣提到我們文件中提及的「大學」。他再次表示反對設立學院（高中），但是願意開設兩年的大學預備課程。他稱這種預備課程為「大學預科主要課程」。而他反對僅只設立學院（高中）的理由如下：一、北京已有學院；二、僅僅（原文有誤，以鉛筆改正）一所學院，無法吸引中國學生；三、羅馬文件要求設立一所大學。

隨這段文字產生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與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有關，這個問題在艾德豐斯神父以後的信件中也經常討論到，那就是：本篤會士能不能在設立大學之前先成立一所「學院」？在這封信及其後信件中，「學院」的意義指的是美國人所稱的「高中」。在強調要設立一所大學而不是學院之際，主教沒有提及但是艾德豐斯在頗後面的一封信裡說到的一件事，就是主教本身正籌畫這麼一所學校。不過主教當然有權利在他的轄區中設立他想要的學校。

我至今尚未找到艾德豐斯離開聖文生之前接受何等指示的相關紀錄，不過在他描述他們與剛恆毅主教初次見面情形的七月二十日的信件中，倒是暗示了他接受的指示是先設立學院（高中）：「自然討論了我們來此的目的，當他（剛恆毅主教）只提到教廷要求我們創立一所大學時，我們心中不免起了一些疑慮，因為我們的理想頂多是建立一所學院。」我們也應該記住一點，美國本篤會士這時候並沒有經營任何大學，只有高中和學院。此外，聖文生率先開始而美國加西尼聯會其他修院繼續下去的傳統是，先設立高中，再成立學院，此處學院指的是四年的高級文科課程。聖文生在這時候除了一所學院和神學院外，還有一所高中，教授發願要成為本篤會士的學生及一般「俗世」學生。

想要從學院開始，除了是美國本篤會士設立學校的通常方式外，另一個理由是，學院也可以用來作為本篤會士人選的訓練之用，聖文生就是這樣做，讓普通學生和本篤會士人選一起上課。因此，七月十七日信第四段是這麼開始的：「在七月十四日一次面談中，艾德豐斯神父直接詢問宗座代表，可不可以為可能成為神職人選的男孩或青年開設學科課程。」從隨後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艾德豐斯對這一點的興趣來自他知道一件事，即本篤會士要終能成功的經營一所大學，就必須有中國籍的本篤會士協助經營。

第五段清楚地顯示剛恆毅主教了解艾德豐斯所說的需要修院的話，不過他也明白，建立一所修院的許可權是在主教手裡：

根據宗座代表所說，我們的工作是雙重的：成立一所有宗教訓練學校的修院，以及成立一座大學。羅馬已經賦予我們成立大學的權利，但是若要設立一所修院和會士人選的訓練學校，就需要一份呈主教的書面請願書。此事我們認為最好交由您決定。

然而在這封信結尾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對宗座代表來說，大學的重要性在先。「根據宗座代表所說，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成立一所大學，其他事情都是附帶的。」

艾德豐斯隨後的幾封信也都提到本篤會士應不應該先設學校的問題。七月十七日寄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中，這個問題還顯得相當理論性，但是在現存的下一封艾德豐斯寫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中，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的信，就出現了將一所北京的學院轉交給本篤會士的可能性：

前幾天愛爾蘭（拉薩路）神父之一來看我們，而在我們長時間的談話中告訴我們，他們一直在經營的這所類似高中的學校即將關閉（原文有誤）...他也提到，被要求繼續經營這學校的修士們如果知道現況，將不會答應，因此根據他的看法，事情很自然的發展就是主教會把學校給我們經營，這就相當於讓我們建造一所學院。...他相信現在主持該校的學者們將會是良好的核心份子，可有進一步的發展，他本人雖然要前往愛爾蘭，但是也願意在必要情況下等待一或兩年。他深信這樣的安排會有

很好的結果。而我們的人員也可以在同時投注時間和精力在此地語文的學習上。在我看來，這個計劃十分理想，不過有不少地方還需要調查之後我才能提出完整的報告。這項調查將會逐漸開始進行，並通報您。

同一封信上還說，主教現在在暗示，「如果我們（本篤會士）還沒有準備立刻成立大學的話」，他或許可以准許開設「二至三年的預備課程」。(2)

這項消息來源的愛爾蘭神父可能是穆倫神父（Fr. Mullen）。他首次被提及，是在七月二十日信中，在後來一封信中他正計劃返回愛爾蘭。上述引述也顯示，設立一所學院，除了要訓練本篤會士的人選之外，另一個理由是可以成為大學的學生來源。第三個原因是可以給美國本篤會士一個機會，在開始經營一所大學前學習中文。艾德豐斯神父對於這麼一所學校的熱切，道理非常明白。

然而，不到兩個月之後，本篤會士成立學院的另一項可能性也發展出來。艾德豐斯在十月八日寫給聖查威爾慈善修女會的信中寫道：

...我們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就是開封的學校，開封的主教希望我們掌管。我和我的同修（普拉西度神父）認為這是建立自己並且確保未來大學成功的絕佳機會。我們急切的等候總院長首肯的消息。我的同修（原文有誤）現在甚至都在該所學校授課了，而我大隱在這座人口稠密的北京市，觀察事情的進展。

在這封信中，艾德豐斯似乎完全贊成接手這所名為「佩文天主教學院」的學校，並且也認為司泰萊總院長會同意。本篤會士如何和這所學校接觸，在 *Mission to America* (289-90) 一書中有說明。

寫信給修女會後不久，艾德豐斯本人前往開封，並在十月十六日發電報給司泰萊總院長：

即刻接收開封學校對北京事業之成功至為重要...回電開封天主教會。

司泰萊總院長在回電中指示艾德豐斯與普拉西度返回北京。他並且宣佈他也將前往北京。

在十月十八日的一封長信上，司泰萊總院長說明本篤會士何以不能在這時候接掌開封那所學校的原因，不過他不排除未來接掌的可能性。他更進一步說羅馬現在給他們五年時間準備成立大學，而耶穌會則花了七年時間在東京成立索非亞大學。

這封信當然費了一些時間才寄到艾德豐斯手上，而後者已經認定接下這所學校是正確的事。十月二十一日他再度去電司泰萊總院長：

...開封的學校必須立刻接受，否則機會稍縱即逝，因為絕佳的地點...

may be purchased ratione belli gubernium indiget peccuniis kaifeng only
logical place for permanent monastic establishment therefrom develop
pending foundation

司泰萊總院長立刻回信：

如果我們做出任何可能妨礙羅馬交代之工作—亦即北京建立大學—的事情，顯然即使不費分文，我們也不能接受一塊地。要有耐心，服從！

對司泰萊總院長而言，在這時候接下這所學校，根本不可能，因為羅馬並沒有要本篤會士們做這件事。

軍閥使得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人無法如原計劃立刻返回北京。十一月一日艾德豐斯寫了一封詳盡的信給司泰萊總院長，談到接受佩文天主教學院，並且提出理由：

至於立刻開始教導大學中一些教職員的事，我在此僅只加上這麼一項考慮：我們會晤過 American indemnity college 的校長、兩所位在天津（原文有誤）的大學（原文有誤）校長，還有管理一所大學的耶穌會神父們，以及許多神職人員，有歐洲人也有中國人，而這些人都是在中國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這些人一致認為，如果沒有某種學生來源的「供應者」，又沒有先從成功管理一所低階學校獲得良好名聲，要設立大學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了好名聲，我們也最好記住，教任何學校的教授都必須知曉當地語言，即使不是全體教授，至少負責學科的老師要是，而這些人也不能是中國人，除非他們是我們教區的一員。任何相反的方法將不只招惹、甚至還會產生最嚴重的問題，也會使我們受到全國的嘲諷。
...我們不是應該立刻把握這絕佳提議，使我們先在開封立足，待時間和時機成熟，再立足北京，開始著手大學之事嗎？此地在有經驗的教師負責下，我們的人員可以獲得管理學校所需的語言及經驗。此地我們可以享有最佳機會，得到初期學習教士及教友的可能人選。而在北京教區我們就沒有類似的機會...（1-2）

根據艾德豐斯的看法，本篤會士如果想在北創一所大學，就必須先建一所學院作為學生來源的「供應者」。其次，美國本篤會士如果想要經營一所大學，必須先有經營大學的經驗。第三，這可以給美國本篤會士一個學習語文的機會。最後，這所學校還可以幫助募集本篤會士的可能人選。

不過，身為一個謹守本分的會士，艾德豐斯對這項爭論提出他的看法之後，在信的結尾這麼寫道：

請總院長放心，我們會盡力完成您的願望，接受理性和祈禱與苦修產生的清明忠告的引導。一俟可行，我們即將返回北京，租妥房舍，恭候您的到來，希望您將在不久後抵達。(2)

這封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當然是到十二月初才寄到。

在十一月七日寄給艾德豐斯的信上，司泰萊總院長明白表示大學必須先設立：“Roma locuta, causa finita” (2)。而到這時候，艾德豐斯應該也清楚總院長會遵照羅馬的命令。

然而，司泰萊總院長這封信尚未寄到，艾德豐斯就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再度去信院長，說出他對這件事的看法：

這封信會很簡短，我只請問一個問題。我本想當面與您談這個問題，但是因為目前政局不穩，您無法前來，因此我最好現在請教您。您對北京這所大學的未來有何願景？您希望招收中國男孩，教育他們日後為教會服務嗎？或者您希望教授全由海外（原文有誤）派來？如果是前者，那麼我們建議接收開封此地佩文中學不是很有用嗎？不然有什麼反對的理由？

艾德豐斯很清楚，除非訓練出中國籍的本篤會士，否則聖文生總會院和美國加西尼聯會就必須提供在北京這所大學教書的所有人員，而他必然認為聖文生和加西尼聯會都不會接受這項提議。

十二月七日司泰萊總院長回覆艾德豐斯十一月一日的信，這封信上他舉出該接受開封學校的種種理由。司泰萊總院長說明他的立場，極力強調羅馬才是最終的決定者，而事情或許會有其他可能：

我永遠也忘不了塔可米主教堅持要求「是」的答覆時的滿滿信心，事實上它是完全拒絕「否」的答覆。

隨信附上的小冊說明了我們對於北京基礎的立場。我們不可以危及它的成功。不論接納開封的提議合不合適，也必須由羅馬先我們決定。至於訓練我們人員等的問題，我們當然可以利用開封這個機會...但是穆倫神父說要給我們的在北京的學校怎樣？此外，你確定「在北京教區我們就沒有類似的機會」嗎？那北京附近呢？

收到這封信以前，艾德豐斯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同修，此人先前曾經寫信給他。（這封信開頭稱謂只寫「我親愛的同修弟兄」，我尚未查出此人是誰）艾德豐斯在信裡說明他發現他和總院長之間產生了重大的誤會：

事實上，總院長信上最後的話簡直讓我氣結。如果我在一艘船上，聽到他說用開封這裡的學校作為大學的「替換」，我一定會栽到海底。我們

從沒有說要找大學的替代物，只是相信在既有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先在這裡成立一所學院，或者就接收這所學校，將它發展成學院，使它可能招收本地男孩，訓練他們成為老師和教授和神父。依我的想法，這樣一所學校是絕對必要的，否則我們要怎樣找到人選，訓練他們進教會？大學幾年內還不可能開課，但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立刻忙碌起來，而這所學校不但不會妨礙大學，反而會使大學有更穩固的基礎，因為接受訓練的男孩當中一定有一些會繼續進修學業。若是這裡沒有為想成為本篤會士和神父的男孩設立的學院或是訓練學校，我無法想像（原文有誤）未來這裡會有教區。但是由於這樣的人會很少，尤其是開始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先收外界人士若干，就像在聖文生那樣。有了大型的建築（原文有誤），會有數以百計的男孩前來申請，除非現在宣傳的仇視外國人和外國學校的行動雷厲風行起來，又爆發目前在各地倡議的革命。但是這是一種極端的情況，況且沒有一個人能夠預見隨局勢演變的情況。我們不能太在意那些可能永遠也不會成真的不安。（1-2）

讓艾德豐斯如此氣憤的「替代物」一詞出現在總院長十一月七日的信中。總院長在這封信中詳述他前往北京和羅馬之行的計劃並且說明他對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人的期望：

...我仰賴你和普拉西度神父盡可能進行教廷交代我們的工作。除非我們發現這件任務不只是困難，更是確確實實的不可能，那時候我們才可以要求替換成一個在我們看來比較可能而且顯然也比較容易成功的任務。

總院長似乎只是比艾德豐斯早一步擬定應變的計劃，但是艾德豐斯卻沒有察覺。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總院長抵達北京之前，艾德豐斯已經讓總院長所有的信都關注在先設立學院或是大學的問題上了。在總院長這次的來訪期間，回絕開封主教提議的決定將會確定，在北京建大學和修院的計劃也將開始進行。不過，在這種背景下，本篤會士於一九三三年離開輔仁大學時，希望留在中國的會士們—包括艾德豐斯—會決定前往開封，這一點就不足為奇了。

天主教大學的學生

艾德豐斯主張要先設立學院的一個理由是，它可以作為大學設立後學生來源的「供應者」。一九二四年的信件中有更多關於這個問題的資料。在給司泰萊總院長的第一封信（七月十七日）中，我推斷是法卜禮主教的一個人所提出主張先設大學而非學院的理由中的第二點是：「僅只（原文有誤，以鉛筆更正）是學院，無法吸引中國學生。」信的后文也說，總主教和主教都肯定學生會申請進入

這所大學，「只要大學能提供良好的學科和齊全的課程」(2) 此外，他們也猜測學生中會有基督徒和「異教徒」。

而後，在七月十九日寄給聖文生副院長的信中，艾德豐斯對這個問題提出更詳盡的分析：

針對最初會申請進入這所大學的學生數目，各方意見分歧，主教和他的神父們預期十分樂觀，而熟知教育事務的穆倫神父卻表達他的疑慮，不過他說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大略的估計，就是詢問此地重要的天主教學院，問他們能派給我們多少學生。我們很快就可以拋開這種探測方法。各方都同意一點，那就是這所大學的標準要設得高，即使不能高過這一區現有的五、六所大學，至少也要相同。只有優秀才能成功。(2-3)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出來，穆倫神父對於艾德豐斯意見的形成似乎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不過最有趣的是，各方面都一致同意，這所天主教大學必須是「即使不能高過這一區現有的五、六所大學，至少也要相同」。從這段文字可以知道，本篤會士一開始就有將這所天主教大學辦成一流學校的目標。但是在這同一封信上也可以看出，艾德豐斯對於其他大學的品質不抱幻想：

我不妨在此一提，許多學校現今的標準相當低，學生對於進入大學的準備並不充分。(3)

到了十一月一日，艾德豐斯對於新大學招生問題已經變得沒那麼有把握了。他寫信給司泰萊總院長：

至於可能申請進入我們大學的學生數目，只有宗座代表抱持樂觀的看法。法卜禮主教甚至一度說，我們寧願出錢給學生來上學，也不要他們出錢。(2)

主教這句話很驚人，因為它似乎反映出雷鳴遠神父 (Fr. Vincent Lebbe) 曾經說過的事：華北的法國籍傳教士在夏林主教領導下付錢給中國人去信基督教 (Levaux 99-104)。艾德豐斯可能沒有察覺這話的諷刺意味。不過，在司泰萊總院長前往北京之前，令艾德豐斯大為擔憂的第二個問題是，這所新的天主教大學學生要從哪裡來？

新大學的性質

根據學生願意到有良好課程的大學就讀的理由，這些信件所述新大學計劃授

課的內容倒是值得一看。七月十七日的信件提到這所大學的性質，信上指出剛恆毅總主教

堅持大學裡要包括神學和哲學課程。主教的建議是先從他所謂的「大學預科主要課程」開始，並且加上下列科目中任選一科：哲學、中文與英文、歷史。

剛恆毅總主教希望這所大學裡也設神學課程，這或許和主教在北京管理大神學院遇到的問題有關。在八月二十日寫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中，艾德豐斯描述了大神學院的校監來訪的情形。在那次拜訪中，校監要求本篤會士前去授課，可能是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讓神學院學生獲得學位。艾德豐斯的信中對這個話題不再提起，因此司泰萊總院長一定很早就回絕了這種提議。因為羅馬交派聖文生總會院的任務是成立一所大學，而不是神學院。

我們在前面也提過，艾德豐斯對於中國大學生的水準有疑問。他關切的是不要讓這所天主教大學也步上後塵。在七月十九日寫給副院長的信中，艾德豐斯寫道：

若是我們在僅只是學院的建築上升起大學的旗幟，這必然是件莽撞的事。這樣的行為會招致此地教會當局的反感，羅馬方面反應更甚。(3)

這種對質的堅持，是與設立這所天主教大學有關人員行事的特點。

艾德豐斯考慮的另一件事是授課使用的語言。他偏向於使用英語：

至於語言，英語在這片土地上日益成為商用語文，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在法國人看來是頗為遺憾的，因此希望他們會全新全意的合作，自然是絕無可能。不過透過英文（原文有誤）這種知識可以得到的好處，會引導青年進入一所以英文作為講課語言的學校。（七月十九日信：3）

這樣的政策也使得美國本篤會士甫抵中國後就可以授課。不過，到了十一月一日，在寫給總院長的信上，艾德豐斯也相信日後前來教書的某些本篤會士必須也要通曉中文才行。

...我們最好記住，教任何學校的教授都必須知曉當地語言，即使不是全體教授，至少負責學科的老師要是，而這些人也不能是中國人，除非他們是我們教區的一員。任何相反的方法將不只招惹、甚至還會產生最嚴重的問題，也會使我們受到全國的嘲諷。(1)

艾德豐斯會作出這所大學不應該由中國人負責學科工作，除非他們是本篤會士的

結論，是一件有趣的事。他似乎強烈的認為這是一件本篤會的任務。

不過，一般來說，艾德豐斯在他的信上並沒有對大學的性質多作思考。這或許是因為司泰萊總院長在八月十五日寄給他的信上說：「不要先提出課程大要，但待奧圖爾博士抵達。」艾德豐斯是在奧圖爾神父抵達北京後才開始計劃這方面的事。奧圖爾神父和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到達。

大學地點

著手許多事情之前，必須先作出一項基本的決定，就是為天主教大學擇定一個適當的地點。由於這所大學將由本篤會經營，所以還有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修院應不應該和大學在同一個地方。傳統上，凡是本篤會修院經營的學校，都是和修院在同一塊地上。但是修院通常都需要有大片土地，因此另一項重要考慮就是土地的費用。

在七月十七日的信上，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人寫道：

提供意見的各方都同意，只要成立大學這件事決定了，就應該立刻購買土地。原因是不要多久市內和市外房地產價格都會有上揚的趨勢，此外，他們也都表達了對工資也會上漲的憂懼。

各方面都要求本篤會士在這方面動作加快。不過從七月二十日寄給奧圖爾神父的信上卻可以明白看出，聖文生會院會議對於在北京建大學仍然沒有定論，因為艾德豐斯提到，奧圖爾神父現在應該比會院會議先知道關於北京的提議。因此現在無法考慮立刻購買土地。接著，艾德豐斯繼續寫道：

（在會院會議決定之前）這段期間，我們兩人將會尋覓一處適合學校所在的地點，當然目前我們不會採取確切的行動。我們會前去尋找兩處地點，一是在城裡或近郊，一是在鄉下，後者可以購買較多土地，我們或許可以擁有農場的好處和方便。

傳統上美國本篤會修院也都有廣闊的農場，因此艾德豐斯和普拉西度兩位神父也道北京市外尋找可能地點，這就不令人吃驚了。這番話暗示艾德豐斯建議讓大學和修院位在同一地點。此外，艾德豐斯深知未來必須與奧圖爾神父密切合作，所以在這封信上還向他請教關於地點的意見。

司泰萊總院長八月十五日的信上強調配合宗座代表選擇校地的重要性，也指出修院最好是在單獨的地方：「遵從代表所選的地點，但是請考慮修院建在他處的合理性。」九月十七日，總院長勸告暫不選擇地點，除非代表堅持。關於校地的最後決定，是在司泰萊總院長北京之行中和總主教協商後達成，這塊地離大教

堂不遠，將容大學和修院兩個地方。

財源

購買校地就會帶來籌措財源的問題。頭一次提到籌款是在七月十七日信近結尾處，信上說：

他（剛恆毅總主教）也說建造修院的費用必須由我們自己籌措。至於設立大學，他答應傳信部會有必要的協助。

從這番話中可以明白看出，和修院設立有關的費用，聖文生都必須支付，但是如果修院和大學在同一個地方，這塊地的費用由誰支付，就沒有那麼明白了。要說可以仰仗羅馬什麼地方，「必要的協助」也太含糊。

為這所新大學籌措費用並不是艾德豐斯的直接責任，而是司泰萊總院長的，後者也花費許多時間考慮可能的籌款安排。在八月十五的信上，他告訴艾德豐斯：「如果傳信部會為新大學的建築出錢，他們也會為校地出錢。」因此，司泰萊總院長這時候是希望獲得傳信部的實質支持，但是從事情的後續發展可以看出，司泰萊總院長很快就發現，自己成為為一所天主教大學的創設和經營籌措款項的主要人物。

總院長必然很清楚，這項計劃太過龐大，本篤會士無法獨力籌款。艾德豐斯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上首次提到「庚子賠款委員會」。庚子賠款的錢透過美國幫助清華及其他國立大學的創立。到一九二二年，「有些（庚子賠款基金）收入似乎會捐贈教會機構組織」（Lutz 233）。司泰萊總院長必定指示艾德豐斯與庚子賠款委員會接觸，因為艾德豐斯寫道：

過去幾天我本想寄上聖誕節的問候，原本希望能順便向您報告與庚子賠款委員會會面的情形，然而因為消息缺乏，也許一時間還不能會面，我也不能再延誤....

而後在十二月，艾德豐斯寫給聖文生副院長的信中解釋道：

寄上上海報紙關於庚子賠款委員會處理基金的簡報若干。由於這些文字描述得相當清楚，我就不再加上任何說明。請將一份簡報交給總院長，並致上我們的祝福與問候...

司泰萊總院長用盡一切方法為這所大學籌措費用。而艾德豐斯也決意要作到總院長要求他的全部事情。這一點可以從他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中看出。信中艾德豐

斯描述軍閥之間的戰爭使他無法從開封回到北京的情形：

然而鄉下到處都會有土匪，因為從軍隊退下來的軍人和被免職的將軍及省長的手下，會充斥在各處。即使現在那些搶劫的報導也越來越嚇人。
(2)

不過他又加上一句：

只要我們有關於與庚子賠款委員會見面的確定消息，這些（原文有誤）都不會阻止我回北京的心。

在尋求對大學的財務支持時，就連土匪強盜也阻止不了。

艾德豐斯在信上提到籌措大學費用的最後一個可能來源是英博士。我們不清楚他是自己主動要調查這種可能性，或是應司泰萊總院長之請。不過從他在十一月十八日信中所寫的內容可以看出，要從英博士那裡獲得財務支援，希望並不大：

我們不能指望從英先生處得到財力支援，因為他沒有什麼錢，從他妻子過世還要穆（Mu）先生支助喪葬費用就可以看出，不過作為教授，他倒是能有珍貴的協助。

因此在司泰萊總院長抵達北京以前，從中國境內籌措這所大學的費用，並沒有清楚的前景，只有羅馬或許能提供協助的可能性。

中國天主教友的角色

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所寫的信中經常提到宗座代表、主教、穆倫神父和其他人給予的建議，然而對於首先倡議在北京創立一所天主教大學的英博士和其他中國籍教友，他提到的並不多。不過艾德豐斯在七月二十日的信上倒是有向奧圖爾神父提到，他們到達北京時，穆和英兩位先生在車站迎接他們。他進一步向奧圖爾神父解釋：「我們和穆及英兩位先生商議數次，他們已經安排好學中文之事，明天中文老師就要來上第一堂課。」

在八月二十日給司泰萊總院長的信上，艾德豐斯提到到穆先生家裡去玩。但是在收到這封信之前司泰萊總院長在九月十七日的信上力勸艾德豐斯「去培養與穆、英及其他中國人的友誼」。到十月十八日，司泰萊總院長眼看艾德豐斯仍然沒有告知多少關於英與穆兩人的消息，於是他在信中表達了不悅：「你對於與我們真正老朋友—英博士和穆博士—會面的事情隻字未提，你是不是其實根本沒有見過他們？」

艾德豐斯在十一月一日信中回覆司泰萊總院長九月十七日的信，並且說明了和英博士及其他中國人的關係：

我們正在培養與我們熟識的中國人的友誼，但是容我在此聲明，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出這種友誼所產生的任何具體好處。相反的，若是我們甫進到這片迷信充斥之地時不被這些人的勸告牽著走，我們的語言知識會更深入。尤其是和他們會面之時，因為那要花費太多時間去詳細解釋，還有可能產生誤會。(1)

不幸，艾德豐斯在這時候卻不能和鼓吹創立天主教大學的中國人發展正面關係，甚至可能連與一般的中國人都不能友善交往。諷刺的是，他似乎和北京的法國傳教士處得很好，只是這些人對於本篤會要創設大學並不是完全支持。

然後，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中，艾德豐斯似乎間接回答了總院長十月十八日信上問他有沒有和英博士及其他人接觸的問題：

然而對我而言，我們的電報透過穆先生發送，似乎是欠思量之事。容我以適度的尊敬和謙遜陳述，最初你我透過他傳送的信中，有一封被打開而且全都看過了。穆先生一位好朋友歐葛曼神父，就一再勸我不要太信任他，因為他是異教徒，很可能隨時會帶給我們問題，或是造成我們財務損失。

不過艾德豐斯對於英博士就沒有這麼強烈的批評，他反而這麼寫到：

(由於英博士)住處離北塘很近，我去開封前還前去道別。

不論艾德豐斯和當時的問題如何，艾德豐斯一九二四年的信件中兩段關於在北京建大學的話終於值得注意了。在十月八日寫給聖查威爾慈善修女學院的信中，艾德豐斯說他一直仔細研究在中國要怎樣經營一所教育機構，因為他描述了中國學生伙食該如何安排的情形：

...所有權威人士一致的意見是讓學生自己負責伙食。學院或大學的管理部門將廚房交給學生團體，由學生去聘請廚師，然後不是託付廚師作必要的採買工作，就是常見的由學生推派的委員會自行採買...不管是哪個學院或是大學，校方若是膽敢供應伙食，最後的結果就是罷課。(2)

第二段驚人的話也是出現在給修女們的信上。這段話顯示，在艾德豐斯對在中國經營大學的思考中，避免學生罷課是他格外關心的事：

前些天我去參觀天津附近一所大學，一位溫文的中國紳士、大學校長和一位美國教授帶我們參觀學校。在交談中我才聽說前面那位紳士是新到職的，因為他的前任爲了學生罷課而被革職。

總而言之，在司泰萊總院長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底北京之前，艾德豐斯正在考量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中有許多並沒有明顯的解決之道，而所有的問題在總院長抵達前他都不能去解決。比方說，如果要先設立大學，中國學生要從何而來，而中國籍的本篤會是要如何訓練？如果學院（即高中）先成立，如何達成教廷的願望？如果有中國學生有興趣入學—這件事不能保證—他期望他們有什麼樣的背景，尤其在這所學校要用英語教課的情形下？大學和修院該設在哪裡，二者應該在一起嗎？建校費用要從何而來？最後，本篤會士要如何和催生這所大學的中國天主教友合作？

艾德豐斯在一九二四年的信件對於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最直接的價值，是讓司泰萊總院長對現況作出謹慎而周全的評估。雖然司泰萊總院長不見得總是贊同艾德豐斯的建議，但他的信卻忠實的指出如果本篤會士要在北京創立一所大學會面臨何種根本的問題。終於，艾德豐斯盡責的執行了總院長十月十八日信件中的指示：

多多傾聽，作出決定前切莫輕舉妄動。我們不可以驟下結論，使自己身受牽連。

WORKS CITED

Levaux, Leopold. *Le Pere Lebbe: Apotre de la Chine moderne (1877-1940)*. Bruxelles and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P, 1971

Oetgen, Jerome. *Mission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Saint Vincent Archabbey, The Fir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 2000.

與 會 學 者

孔思曾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游銘鈞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
王振稼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	程宗明	河北輔仁大學校友會
吳堅凌	耶穌會單位發展委員會	黃俊傑	輔仁大學副校長
呂慈涵	聖言會單位發展委員會	黃湘陽	輔仁大學主任秘書
李安達	太原輔仁大學校友會	雷俊玲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周國正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	劉美惠	中國聖職單位發展委員會
林智源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	鄭寶彩	耶穌會單位發展委員會
邵台新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墨 朗	輔仁大學教授
施麗蘭	台中育仁小學校長	蕭坤霓	耶穌會單位發展委員會
柯博識	輔仁大學教授	戴晉新	輔仁大學歷史系主任
胡 贄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	薛丹妮	耶穌會單位發展委員會
康士林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薛保綸	輔仁大學教授
張延祐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	魏思齊	聖言會單位發展委員會主任
張振東	輔仁大學教授	嚴任吉	耶穌會單位發展委員會主任
莊尚武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龔士榮	輔仁大學終身講座教授
郭忠驥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		以上按筆畫順序排列
陳方中	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主任	工作人員	
陳宗舜	輔仁大學教授	吳瑞珠	輔仁大學校史室主任
陳福濱	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	賴玟忻	輔仁大學校史室
		黃靖蘭	輔仁大學校史室
		潘美香	輔仁大學校史室



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四十週年--于斌樞機主教百歲誕辰紀念